

〈論陳維崧倚聲填詞的創作動機〉
Discussion On Chen Wei Song's Motiva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of Ci-poetry

李日康

哲學碩士學位課程

香港教育學院

二零一五

ProQuest Number: 1018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INFORMATION TO ALL USERS

The quality of this reproduction is dependent upon the quality of the copy submitted.

In the unlikely event that the author did not send a complete manuscript and there are missing pages, these will be noted. Also, if material had to be removed, a note will indicate the deletion.



ProQuest 10181995

Published by ProQuest LLC (2016). Copyright of the Dissertation is held by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work is protected against unauthorized copying under Title 17, United States Code
Microform Edition © ProQuest LLC.

ProQuest LLC.
789 East Eisenhower Parkway
P.O. Box 1346
Ann Arbor, MI 48106 - 1346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only.
Not for publica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論陳維崧倚聲填詞的創作動機〉

李日康

哲學碩士學位課程

香港教育學院

07/2015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only.
Not for publica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聲明

本人李日康為本論文之單一作者，除文中標注之引用及參考外，其他均為本人著作。本人謹按照香港教育學院之學術誠信、版權及剽竊指引完成論文。本論文是本人於香港教育學院修讀哲學碩士學位課程其間完成的論文，論文從未在其他學院發表作為考取文憑、學位，或其他學歷之用。

[李日康]

[JUL 2015]



提要

清代號稱詞學復興之世，詞人、詞派、詞學現象特多，陳維崧正是清初其中一位重要的詞家。學界長久以來都將陳維崧定位為詞人，是陽羨詞派的代表詞家，事實上，他身兼詩人、駢文家。我們在肯定陳維崧在詞學上獲得最大成就的同時，不應忽略他在其他文體所呈現的面向，以及提供的線索，詩與詞向來並行並論，這些面向和線索往往能加深對其人及其詞的研究與理解。本研究旨在從文本性的分析著手，主要以內緣角度切入，解決陳維崧研究一個基本而重要的問題：陳維崧倚聲填詞的創作動機。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傾向把外緣歷史因素作為資料和背景的鋪墊，而文本性和內緣性分析則往往在論述中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種研究方法是希望強調作家在創作上的主體性與獨特性，而非受歷史環境制約下的共性，重新發掘陳維崧及其詞學的其他面向，建構其更為立體的形象。

本研究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緒論、第五章結論以及參考書目外，正文部份共三章：第二章以陳維崧癸丑至丙辰「棄詩弗作」這一以詩為討論題目，但重心同時關涉其詞的文學事件作切入點，分析事件的原因，以及由此反映在相應時間中左右陳維崧作詩或作詞的文學內部因素；第三章重點分析陳維崧詩詞作品中，屢屢出現的「恨」的意涵，以及他怎樣透過與他人作品的對話，來回應詮釋傳統，呈現主體性；第四章透過重新解讀陳維崧的詞論〈詞選序〉，探討陳維崧的創作理論中詩與詞的界別與融通，以及〈詞選序〉所指作詞存詞的目的。

關鍵詞：

陳維崧、詞、主體性、詮釋傳統

Abstract

Qing dynasty is defined as the revival age of ci-poetry while plenty of ci-literati, schools of ci and phenomenon in ci-poetry were emerging since late-Ming. Chen WeiSo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i-literati in early Qing. Scholars mainly focus on his status of ci-literati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Yangxian-ci(陽羨詞派) while Chen also created shi(詩) and pian-wen(駢文) concurrently and had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both shi, ci and pian-wen. There is a critical tradition in the comparison and discussion of ci-poetry accompanied with shi. Studying shi and other literary form of Chen provides clues and different ways of interpretations that help us re-examine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en and his ci-poetry while we affirm that Chen obtained the greatest accomplishment in ci's area than shi and pian-wen. This thesis tries to answer a basic and important question of Chen WeiSong study, which is the mental motive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 of ci through an in-depth textual analysis. About the methodology designed in the thesis, in-depth textual analysis always occupies the critical role in the discussion while thos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re inclined a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ecause this thesis aims at emphasizing on the uniqueness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Chen rather the generality under the early Qing's society. Finally, there will be purports to reveal some hidden aspects of Chen's ci and conducts a round exposition of Chen.

The present thesis contains six chapters. Apart from Chapter 1:Introduction, which provid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Chen WeiSong and define key concepts, Chapter 5:Conclusion, which sums up and suggests possible ways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Chapter 6: The bibliography, Chapter 2 discusses the event of "Abandonment of

Shi from 1673-1676”(棄詩弗作) which was a phenomenon that discussed issue of shi-poetry but also related to ci-poetry. This Chapt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reasons of “Abandonment of Shi from 1673-1676” then criticizes the pull-push energy which influences Chen’s ci creation in related period of time.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content of the phrase of “Hen”(恨) which appeared in Chen’s shi and ci repeatedly and analyzes how Chen responded to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through the conversations between other author’s ci, and finally to present the subjectivity of Chen’s ci. Chapter 4 through re-interpreting an important article of Chen’s ci-theory, “Preface of Ci-Xuan”(〈詞選序〉), discusses the scope between the two genre, shi and ci, and any integration in between under Chen’s critics. Furthermore, Chen WeiSong promoted the creation and collection of ci in “Preface of Ci-Xuan”.

Keywords

Chen WeiSong, Ci, Subjectivity, Hermeneutic Tradition

謝辭

首先，要感謝恩師鄭吉雄教授。師從鄭老師前，學生對文學研究可謂一知半解，經常自以為對明清文學的發展脈絡有一定把握，但其實認識粗淺，鄭老師始終不嫌學生愚魯，兩年來耳提面命，由論文題目、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到論述方法、書寫策略，乃至發現問題、鑽研學問的態度，老師都嚴謹而細心地指導。如果這份論文有任何錯漏，實在是學生學藝未精，相反，如果論文中有任何或有建樹之處，都是鄭老師指導有方之功。鄭老師著作甚豐，研究成果優秀，他的言教身教影響了學生學術研究的路向，在此衷心感謝。

另外，也要感謝陳國球教授和白雲開博士在百忙中抽空，就研究方法、研究框架賜予指正，兩位老師的意見精闢細緻，學生受用不少。而研究院同事在行政程序上也予以極大幫忙，使各程序清晰、簡便，減省我不少氣力。

李日康

二零一五年七月

目錄

聲明	ii
提要	iii
謝辭	vi
目錄	v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陳維崧生平略述與研究回顧	2
第二節——研究方法	18
第三節——研究範疇及研究價值	22
第四節——章節說明	24
第二章：試論陳維崧癸丑至丙辰「棄詩弗作」的原因	28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29
第二節——戊申至壬子(1668年-1672年)	
陳維崧棄詩前夕的自我審視與對詩歌的態度	31
第三節——重讀〈和荔棠韻十二首〉	44
第四節——「棄詩弗作」原因的重新理解	50
第五節——結語	53
第三章：「僕本恨人」——陳維崧詩詞中「恨」的意涵及其主體性	55
第一節——陳維崧作品中三種「恨」的意涵	57
第二節——「僕本恨人」的書寫傳統與詮釋面向	61
第三節——僕本恨人、公皆健卒—對話中的自我詮釋	66
第四節——詩詞之別：「僕本恨人」在詩中的缺席	76
第五節——結語：恨人亦有可悲處	79



第四章：「經」、「史」、「詩」、「詞」的分途與融通——	
從陳維崧〈詞選序〉論其推尊詞體的根據	85
第一節——〈詞選序〉的論述脈絡	87
第二節——「詞一史」與「詩一經」：兩種不同的文學理論傾向	91
第三節——比興寄託：「經」、「史」、「詩」、「詞」的融通樞紐	99
第四節——結語	103
第五章：結論	105
參考書目	109



第一章

緒論

一位作家為甚麼這樣創作？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甚至無聊的問題，有人或會訴之於靈感繆思，以為不可解。但其實這提問可以說是一切書寫行動、詮釋問題的根源，不論是文學創作，還是論文書寫，我們之所以會選擇以某種體裁、某種方式來表達，本身就已經代表了我們的判斷取捨。反過來說，理解和研究一位作家為甚麼選擇某種書寫體裁和如何呈現某種書寫態度，其實也就是研究他創作生命的動機、審美觀、生命關懷。

總的而言，在唐宋以前，文學的體裁種類相對少，但時移勢易，文運遞變，體裁的種類越來越多：詩、賦、散文、詞、曲、小說等等，這裡尚且不包括相同體裁中的各種變體。體裁文類的選擇這個問題，就顯得更為複雜，也更為重要，尤其是當一位作家同時掌握多種體裁文類的書寫語言和技法的時候。

本研究的對象清代的陳維崧便是這樣的一位人物，他同時是詩、詞、駢賦的高手，但他的形象，不論是他自己主動呈現，或是後世所認知，往往是一位倚聲填詞的詞人，同時，在各種體裁中，他也能確是以詞取得最大的成就。這就呼應了一開始時所提出的問題：陳維崧為甚麼這樣地書寫？這表達了他怎麼樣的判斷和取捨？而要回答這個原始的問題，又會衍生其他層面，不同的問題：就自覺意識而言，要證明陳維崧是有意識地選擇專力倚聲填詞而非隨意搖擺於不同體裁；就自我詮釋而言，陳維崧自己是怎樣以論述語言表達文類的差異；就作品本身而言，選擇專力填詞時，要說明作品具體如何表現；要指出這種選擇與他作品中核



心價值的關係；要回應這如何建立陳維崧的自我詮釋和形象。

在中國的書寫和論述傳統中，治亂興衰這種歷史外緣的因素，經常成為研究背景和動機問題時，主要的切入角度，不少陳維崧的研究，都是採取這種基調。具體的研究回顧將在下文展開，這裡想指出，採取這種歷史外緣方法來解釋陳維崧專力填詞的背景，可能有一定的缺憾。基本上，明清易代之際，擁有與陳維崧相類背景和經歷的，實在比比皆是，單純以社會歷史資料作外緣分析，是無法解釋為甚麼在云云失意文人中，會出了一個陳維崧，還有他最具成就最能與他人作區別的詞作。因此，在研究題目的定位上，相對於強調作家如何被動地被客觀環境制約，本研究更傾向探討作家的內在創作動機和主動以詞與他人互動的動機。

第一節——陳維崧生平略述與研究回顧

陳維崧是我們熟識的研究領域，但在這熟識的領域中，卻有不少富有價值的內容未獲展開，值得繼續挖掘。在制訂研究的具體框架前，有必要先簡介陳維崧的生平以及作出研究回顧。

陳維崧生平略述

陳維崧(1625年-1682年)，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生於明末天啓五年。祖父陳于廷(1566年-1635年)，陳于廷生平可見於《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二》。陳于廷是東林中堅，為人貞烈重節，《明史》讚其「端亮有守」，¹屬當時清流。于廷生五子：貞貽(1590年-1619年)、貞裕(1595年-1675年)、貞達(1602年-1644年)、貞慧(1605年-1656年)、貞白(1633年-?)。陳維崧父陳貞慧，與冒襄(1611年

¹ 張廷玉等撰：《明史(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8月)，頁6562。

-1694 年)、侯方域(1618 年-1654 年)、方以智(1611 年-1671 年)合稱四公子，是明季復社的代表人物，同樣以氣節著稱於世，早年與吳應箕(1594 年-1645 年)合撰《留都防亂揭》，討阮大鍼(1587 年-1646 年)禍國害民之罪狀，因此陷於牢獄，幾逢厄災，後得友人營救而幸免於難，明亡後自絕於鄉村，不入城市。

陳維崧幼時家道未衰，家中曾聘多位經師、名士為其啓蒙，包括陳子龍(1608 年-1647 年)、吳應箕。陳維崧十來歲已有文名，稱詩里中，又經常隨祖、父遠行，拜謁名士。陳維崧明亡後棄諸生名，父母死後，兄弟諸人被人目為俎上肉，於是不得不離鄉背井，各自打算，例如其弟陳宗石(1643 年-?)則入贅商丘。順治十四年，陳維崧三十三歲，八月於南京見冒襄，訂水繪園讀書之約。順治十五年十一月正式赴如皋投靠冒襄，並開始在冒家度過生命中極重要的八年，在這八年，陳維崧遇上影響其一生的王士禎(1634 年-1711 年)。順治十七年(1660)，是時，陳維崧應試失敗落榜，心灰意冷，適逢王士禎主理揚州詞壇，陳維崧從遊甚歡，於是朝夕倚聲填詞，他對詞的真正體認也是由這時開始建立。直到康熙三年，陳維崧四十歲，他因兩試不第，失意地離開如皋，冒襄堅留不果。陳維崧當時有闖練之心，他北上經揚州，訪王士禎，王氏極阻其北遊，於是陳維崧暫且擱置北上。是年年末，陳維崧接到家書言妻女凍餒，於是他重返宜興。以後由康熙四年到康熙八年間，陳維崧多遊走於如皋、揚州、宜興、商丘、鎮江等地，或宴遊、或修禊、或過訪友人，或遊歷山水。直到康熙九年，陳維崧四十六歲，春日赴河南史逸裘(生卒未詳，順治乙未 1655 年進士)之幕，隨後幾年他的生活範圍也大抵在中州一帶。由康熙十一年初夏還鄉開始，至康熙十七年應博學鴻辭科上京，這六、七年間陳維崧經歷了喪子、摯友逝世，他已經萌生息交絕遊，填詞餘生的念頭，可惜陳維崧被逼應詔上京應博鴻科，又即使他以《璇璣玉衡賦》得第十名，授翰林院檢討，但入京後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每況越下，益貧，又遭同曹嘲弄，但陳維崧始終以史局未竣不敢請歸。康熙廿一年，患頭痛，積病四十餘日，五月五自

知不起，托弟維岳(1635 年-?)死後為其刊行作品，五月七日卒，死前猶不忘創作，雙手作推敲狀，以此結束這一代詞宗的一生。

研究回顧

本篇研究回顧既希望從歷時的發展順序中，整理出不同時期論述的開拓與對話，又誠盼能免於冗贅，不受制於時間的線性前進，因此在論述安排上，會一路簡介民國以降陳維崧研究的發展，概括重要的論點，引介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會在行文中間，以及最尾部份，以研究成果為支持的論據，歸納出歷來陳維崧研究的研究方法與面向。

前言：兩組重要清人評論

陳維崧在世時，作品已流傳四海，當中以詞及駢文最勝，先有吳偉業(1609 年-1672 年)盛讚他與吳兆騫(1631 年-1684 年)、彭師度(1624 年-?)為江左三鳳凰，²後又與黃永(1621 年-?)、董以寧(1629 年-1669 年)、鄒祗謨(1627 年-1670 年)有毗陵四子之稱譽。³陳維崧與朱彝尊(1629 年-1709 年)相知相交，在詞壇分庭伉儷。不論身前身後，清代大型詞選集少有不收錄陳維崧詞作，而且收錄數量頗多，例如《今詞苑》收 17 首、《古今詞選》收 87 首、《古今詞匯三編》收 13 首、《精選國朝詩餘》收 7 首等，都是平均數以上，甚至位居三甲。清代雖有揚朱抑陳之說，⁴但總觀當時語境，不無浙派中人自高宗派師法之嫌，再者，所謂揚朱抑陳，並非完全貶抑之意，而只是相比之下，時人(或受浙派影響之人)好朱勝於好陳。事實

²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陳其年先生事略》、《碑傳集》中蔣京祁所撰〈迦陵先生外傳〉、《賭棋山莊詞話》等文獻均有記載吳偉業視陳維崧為江左三鳳凰之一的說法。

³ 徐鉉撰：《本事詩·卷十》，載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九四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641。

⁴ 見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云：「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為巨擘，後人每好揚朱而抑陳，以為竹垞獨得南宋真脉。嗚呼！彼豈真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笑也。」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六)》(台北：廣文書局，1980 年 9 月)，頁 3862。

上，清代不少詞人、詞評家，也留意到陳維崧詞的重要性，以及肯定他在詞史演進中的影響力，當中最具代表性莫過於譚獻(1832年-1901年)與陳廷焯(1853年-1892年)。譚獻《復堂詞話》中云：

錫鬯、其年行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到。嘉慶以前爲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⁵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

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道，填詞之富，古今無兩。只是一發無餘，不及稼軒之渾厚沈鬱，然在國初諸老中，不得不推爲大手筆。⁶

迦陵詞沈雄俊爽，論其氣魄，古今無敵手。若能加以渾厚沈鬱，便可突過蘇辛，獨步千古，惜哉！⁷

蹈揚湖海，一發無餘，是其年短處，然其長處亦在此。蓋偏至之詣至於絕後空前，亦令人望而卻走，其年亦人杰矣哉！⁸

其年詞極壯浪，所少者沈鬱。余最愛其〈月華清〉後半闕，云：「如今光景難尋。似晴絲偏脆，水烟終化。碧浪朱欄，愁殺隔江如畫。將半帙、南國香詞，做一夕、西窗閑話。吟寫。被淚痕占滿，銀箋桃帕。」淋漓飛舞中仍不失爲雅正，於宋人中逼近美成。⁹

⁵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六)》(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9月)，頁4033。

⁶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六)》，頁3862。

⁷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六)》，頁3862。

⁸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六)》，頁3863。

其年諸短調，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是何神勇！如〈點絳脣〉云：「悲風吼。臨洺驛口。黃葉中原走。」；〈醉太平〉云：「估船運租。江樓醉呼。西風流落丹徒。想劉家寄奴。」；〈好事近〉云：「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清平樂〉云：「不見長洲苑裏，年年落盡宮槐。」平叙中峰巒忽起，力量最雄板橋心。余輩極力騰蹕，終不能望其項背。¹⁰

作家及評論者眾多，以上之所以選取譚獻及陳廷焯兩家，固然反映陳維崧在清代，已經以其詞作為清詞中興作出重要貢獻，以及展現了他豐碩的創作實績，更重要的是，以上兩位評論家的論點往往為民國，以至今日學者所反復引用、討論，昭示了陳維崧研究的四個重要方向，當中的重要概念對後世研究有極重要的指導作用，包括：一、「陳維崧—陽羨詞派」與「朱彝尊—浙西詞派」的對照關係與評騭取態；二、陳維崧詞作中蘇辛詞風的承傳與轉化；三、陳維崧詞的短處：不夠沉鬱深厚，粗疏時近於叫囂；四、陳維崧詞的強處：一發無餘，氣魄過人。從中我們發現了日後研究的淵源脈絡，以及相承轉化的源頭，第一、二點傾向外緣性的、詞史的問題，第三、四點傾向內緣性的、關於詞體本身的問題。此四者為民國到 80 年代的陳維崧研究定下主調。

一、民國時期陳維崧研究的特點

進入民國，學者除了以傳統的詞話、點評、論詞絕句等維繫古典文學批評的傳統，更吸收了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與體式，除了深得詞心的感性體悟，學術論著、文學史、詞史的編撰使到古典文學的研究更為專業。在 20-40 年代間，有數

⁹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六)》，頁 3863-3864。

¹⁰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六)》，頁 3864。

本重要的詞史著作面世，包括王易(1889年-1956年)《詞曲史》(1926)、劉毓盤(1836年-1927年)《詞史》(1926)、吳梅(1884年-1939年)《詞學通論》(1932)、龍榆生(1902年-1966年)《中國韻文史》(1935)；[日]澤田總清(1892年-?)《中國韻文史》(1937)。¹¹在這些著作中，詞學家雖各有取捨，但都有討論陳維崧的篇幅，例如王易《詞曲史·振衰第九》言及：「及浙西陽羨二派興，風氣為之一變。浙西主醇雅，陽羨主豪宕，并稍近于聲律，蓋由北宋而進窺南宋矣。¹²」，「陽羨一派，當以陳維崧為首……大致以蘇辛為宗，偏尚才氣，然時失于粗，乃近二劉。¹³」而吳梅則認為陳維崧既有精細纖巧之作，又有壯語，能幾合蘇辛周姜於一家，是情與辭皆勝，骨與韻都高之作。¹⁴龍榆生則將陳維崧與王士禎等，都目為一時之秀，各自有篇幅討論，在討論的段落中，龍榆生有四個重點：一、陳其年作詞極多，絕勝古今；二、筆下小令竟能突破傳統，化小令之柔弱纖細為瀟灑雄放，開古今之奇；三、將陳其年長調詞作比擬為詩中之元祐體，以為「蹤筆所之，雄傑排寡，不復為含蓄」；四、陳其年詞反映了易代之際的社會思想，表現了關心民瘼的面向。¹⁵澤田總清則最簡單，主要是引介生平，評語為「他的詩(按：將詞視為廣義的詩)，曲折高華，有風致，各體都優。¹⁶」

不論諸家取態如何，陳維崧也是清詞史上的大名家、大手筆，這是不能抹殺的。在此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諸作中，眾評論家或多或少，或正面或側面地，將陳維崧與朱彝尊作為一對照。王易固然有如上文提及的陽羨浙西並論，

¹¹ 據林玫儀編：《詞學論著總目(1901-1992)》資料，劉毓盤《詞史》最先於《東北大學週刊》刊登，由1926年10月始，刊登期數為1、2、7、8、31、32、34、36、37、38、40、41、42、44、46，後分別由不同出版社單行出版，後文徵引之版本為劉毓盤：《詞史》(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5月)；王易《詞曲史》最先在1926年於《學衡》第57期，1-45頁刊登，後分別由不同出版社單行出版，後文徵引之版本為王易著：《民國學術經典文庫：詞曲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吳梅《詞學通論》最先於193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文徵引之版本為王雲五主編，吳梅著：《詞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年2月)

¹² 王易著：《民國學術經典文庫：詞曲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頁392。

¹³ 王易著：《民國學術經典文庫：詞曲史》，頁400。

¹⁴ 王雲五主編，吳梅著：《詞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年2月)，頁161-163。

¹⁵ 龍榆生著：《中國韻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5月)，頁209-210。

¹⁶ 澤田總清著，王鶴儀譯：《中國韻文史(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頁507。

吳梅在論述上也有類似安排，比較《詞學通論》中兩者的篇幅，陳維崧部份主要是評論抑陳揚朱之說，而吳梅則就自己的看法提出意見，以為陳詞除蘇辛一派的壯語，事實上也有婉麗閑雅之作，其得南宋真脈，未必亞於朱彝尊。而吳梅討論朱彝尊，除簡介生平、點評詞作，較為不同的是由朱氏詞作牽引到托體尊體的問題，由托體的問題又歸結到「近人懾於陳朱之名，以為國朝冠冕，不知陳朱雖弁冕一朝，究其所詣，尚未絕倫，有志於古者，當宜取法乎上也。」的結論，可謂不偏頗於陳朱兩派宗風之間，持評甚中。¹⁷

另外龍、劉、澤田三家，似乎在行文中已經透露了他們對陳維崧的評價。日人澤田對陳維崧的評語最為簡短，然論朱彝尊的篇幅就比論陳維崧的要多上一倍，而且論陳維崧時只評價其詞作，論朱彝尊則兼論其文學主張；¹⁸劉毓盤稱呼陳維崧為「陽羨陳維崧迦陵詞¹⁹」，未有標出「陽羨派」或「陽羨詞」之名目，但言朱彝尊，則言《浙西六家詞》，以為其為清詞之一變，又視朱氏《詞綜》有功於詞風，²⁰而且劉氏大概是以浙常二派的轉化與生成來把握清代詞史的流變，朱陳之重要性與地位高下，不言自喻；²¹又龍榆生《中國韻文史》雖稱陳維崧為一時之秀，²²但龍氏論浙常二派，則言「浙常二派，又各開法門，遞主詞壇，風靡一世²³」，「一時」與「一世」，兩兩相對，已經明顯地包含了朱彝尊高於陳維崧的意思。這階段的研究反映了對「朱彝尊—浙西詞派」研究的起步先於「陳維崧—陽羨詞派」，評價也稍高。浙西稱派，不論評鹭如何，大概也是成立的，然而，討論陳維崧，則更多是目為一時俊傑，未有言及其對詞史演進的參與與付出，主要傾向以專家詩詞式的方式，單獨討論他。

¹⁷ 王雲五主編，吳梅著：《詞學通論》，頁 161-164。

¹⁸ 澤田總清著，王鶴儀譯：《中國韻文史(下)》，頁 505。

¹⁹ 劉毓盤：《詞史》(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 5 月)，頁 201。

²⁰ 劉毓盤：《詞史》，頁 200。

²¹ 劉毓盤：《詞史》，頁 200-211。

²² 龍榆生著：《中國韻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 5 月)，頁 206。

²³ 龍榆生著：《中國韻文史》，頁 205。

二、五十至七十年代陳維崧研究的特點

邁向 50-70 年代，清詞研究則冷落下來，60 年代中期開始，因為政治關係，大陸的清詞研究完全停頓，進入空白期，相較之下，港台沒有受到政局左右，在這段期間仍發表了相關的討論與著作。

賀光中《論清詞》(1958)一書分為「上編—通論」，以及「下編—專論」，兩部份中，陳維崧也佔有不少篇幅。「上編—通論」除秉承一貫思路，言陳維崧偏尚才氣，特宗蘇辛外，最重要的是賀氏言及詞派，在承認陽羨派的前提下，有特別的見解：

其年則不以派名，而宗之者不少。儻就其別於浙派者而言，則固足以領導袖壇，不言派而派自成，亦猶蘇黃並稱，呂本中尊黃為江西詩派之祖，蘇則無人稱之為派，而實則本支百世，卓然自成一宗也。²⁴

又言：

宗之者則吳綺、曹武亮、萬樹、楊藝燦、洪吉亮、黃景仁、史承謙等……
力矯其弊而稍變其格局者，則吳翊鳳以高朗見稱之枚庵詞也。²⁵

賀氏論點之特別有二。首先，賀氏所謂「不言派而派自成」，提示了陽羨派以至陳維崧可能是以一種有別於浙、常二派的生成方式來建構出一個有影響力的詞學流派。其二，賀氏歸納之陽羨派成員，有別於一般共識，例如現時論陽羨詞人，有任繩隄(1621 年-?)、史惟圓(生卒未詳)而賀氏無之，賀氏言吳綺(1619 年-1694

²⁴ 賀光中著：《論清詞》(新加坡：東方學會，1958 年 3 月)，頁 31。

²⁵ 賀光中著：《論清詞》，頁 32。

年)、洪亮吉(1746年-1809年)又往往不同於今人。賀氏之觀點或許有所偏差，例如以上第二點就忽略了清詞流派的地域性要素，對詞風的把握也可能不夠準確，但部份看法，特別是上文提及「不言派而派自成」的流派形態，就頗有啟發性，可以往更深處挖掘，例如清詞流派呈現如何不同的型態？同為詞派，但陽羨、浙、常三派的內部結構可有不同？流派領軍人物的自覺開創與偶然生發的特殊關係等。可惜的是賀氏未有詳論，也沒有後續的著作繼續發揮。

吳宏一(1943年-)教授的碩士論文〈常州派詞學研究〉(1970)中，在〈常州派的時代背景〉一節，他明確表示立場，認為陽羨不成派，而應該視為常州派之前身，因為一來陽羨本屬常州府，二來陳維崧的詞風與張惠言(1761年-1802年)兄弟風格相近，三是他舉出趙懷玉(1747年-1823年)「吾家咫尺隣陽羨，喜迦陵填詞舊例」佐證。²⁶雖然如此，但吳氏始終尊重前人舊稱，也出於方便討論，稱呼以陳維崧為宗主的陽羨詞人群作陽羨派。他又分析了陽羨派的衰落原因，他認為陽羨派文學理論薄弱，不足以支持，又後繼無人，只有陳維崧輩的創作實績，加上偏尚才氣實在難於師法傳承，因此康熙朝民心漸趨安定，流風不合後，陽羨派就沒落了。²⁷吳教授的論點極富批判性，當然，也有可以斟酌處，例如吳教授視陽羨為常派前身，依從相同思路，為何不可以視常州派是利用陽羨派早年文化資源與成果底下而轉化成的陽羨後續呢？當然，這種質疑是過於挑剔，反而會令人覺得是玩弄文字。〈常州派詞學研究〉中最重要有關陽羨的論述，是展現了有別於傳統的新見解，立場明確而富辯證精神。

而若論評論之嚴謹，則數鄭騫(1906年-1991年)教授，鄭教授〈成府談詞〉中有「納蘭成德 朱彝尊 陳維崧」條目，鄭教授評語：

若夫其年之粗獷叫囂，則詞中之天魔夜叉也。予嘗以庾子山詠懷詩二

²⁶ 吳宏一著：《常州派詞學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0年6月)，頁24-26。

²⁷ 同上。

句評之曰：「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壬寅秋舊意而別有發揮者，原文排版另開新行，比正文低一格：）評其年處，語氣雖稍過，意見則今昔無大異。²⁸

針對陳維崧詞一發無餘，沉厚不足類於叫囂之病，以為完全破壞詞體之審美體驗，持論之嚴格，實在少見。

1962年，錢仲聯(1908年-2003年)於《江海學刊》(南京)的2月號發表了〈論陳維崧的湖海樓詞〉，這篇陳維崧的專論文章往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詞學研究論文集(1949-1979年)》先後再發表，又收入錢氏《夢苕庵清代文學論文集》及《夢苕齋論集》之中，可見錢氏對該文之重視。事實上，〈論陳維崧的湖海樓詞〉對於陳維崧研究有重要的里程碑地位，是研究陳維崧不可忽略的篇章。

錢氏立論選取了以外緣角度切入，他強調明末清初江蘇文人尤有名望，又有創作實績，很大程度是因為身處易代之際這一歷史場境。陳維崧負節氣，具修養的家庭環境，以及他下半生侘傺流離的遭遇，深深影響着他。「文學作品是他們鬥爭的武器之一，愛國思想成為他們作品的共同主題，同時，有的作品也勾勒了較為廣闊的人生畫面，反映了這一代的社會現實。」²⁹

錢氏大致認同清人對陳維崧的評騭，但他指出在各種複雜不統一的論述之中，大家都忽視了陳維崧及其《湖海樓詞》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這

²⁸ 鄭騫教授於〈成府談詞〉的前言提及撰述緣起：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予任教北平燕京大學，講授之餘，試撰詞話若干條……二十二年壬寅之秋，全部錄出，用備省覽。謄寫之際，每有見解異於往昔，或仍舊意而別有發揮者，輒低一格附識於各條之後。鄭教授對陳維崧之評點，先寫成於1940，然後又有補充於1962，故繫此條於此。〈成府談詞〉，錄入鄭騫著：《景午叢編(上)》(台北：中華書局，1972年1月)，是處徵引頁數為249、263、264。

²⁹ 錢仲聯著：《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山東：齊魯書社，1983年9月)，頁64。

就是詩史精神，錢氏認為陳維崧把香山樂府的精神從詩歌移植到詞這一體裁之上，錢氏形容這是詞史的一大創舉，應該大書特書。³⁰

錢氏舉出〈賀新郎·縉夫詞〉(戰艦排江口)及〈南鄉子·江南雜咏〉(戶派門攤)來說明陳維崧透過詞作反映新朝統治者搜括民脂，致使妻子離別，獨宿牛車的慘況。又舉〈賀新郎·五人之墓〉說明陳維崧以詞憑弔抗暴志士。錢氏形容「正是這些詞作，盡管為數不是太多，卻是《湖海樓詞》中最光輝的部份」。其次，錢氏以〈洞仙歌·途次曹縣〉、〈賀新郎·感事〉嘲弄降將劉澤清、馬逢知，又以〈喜遷鶯·咏滇茶〉悼桂王殉國，說明陳維崧始終沒有走上吟花弄月的花草一脈，他選擇以憑弔追憶的心情來眷懷故國，沒有忘記南明王朝的覆亡史實。當然，除了書寫現實的面向，錢氏也讀出了陳維崧詞中的悲歌慷慨，心雄膽正卻又淒涼落寞的個人心景。至於藝術特徵方面，錢氏則認為主要有二。第一是剛健骨力與清麗藻彩結合，也體現了陳維崧宗尚蘇辛同時兼有周姜的一面；第二是擴大了語言的領域，有以文為詞、有問答體、有學辛稼軒體。³¹

總的而言，50-70 年代的陳維崧研究既有繼承，也有開創。錢仲聯〈論陳維崧的湖海樓詞〉雖然作者錢氏認為自己提出了前人所忽略的一點，但事實上論述的方法與格局，也是承繼前人而來，他主要是把陳維崧放置到歷史背景中，在肯定歷史事實的前提下，以外緣的方法切入，主要以社會現實與知人論世來評論陳維崧詞的內容思想與藝術特點。錢氏的貢獻在於清楚地展現了陳維崧的處境與詞風，基本上可以說是為日後陳維崧的研究打好基礎。相較之下，賀光中、吳宏一的論點就有其新見，有其創獲，雖然論證過程的仔細程度仍可斟酌，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價值，因為他們開展了一定程度的問題意識，已經有向理論深度邁進，以及發掘宏觀研究清代詞學流變的苗頭。可惜的是，60 年代中期開始，因為大陸

³⁰ 錢仲聯著：《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頁 67。

³¹ 錢仲聯著：《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頁 67-76。

學者研究的幾近完全停頓，港台學者在相關議題上始終在「量」之上落後，而大陸的斷裂也使到雖有新見乍現，卻形成不了整體討論的氣候。而假如我們再往上回顧，就更會發現，除了極少的篇章，例如錢仲聯〈論陳維崧的湖海樓詞〉，可以將陳維崧視為一個獨立對象來研究，更多的是在文學史中、浙常二派的討論中附帶論及陳維崧或陽羨詞派，這除了再次證明陳維崧研究的起步落後，更指出了在當時的視野中，陳維崧這位一代詞宗得不到與其身份、實績相稱的重視。

三、八十至九十年代，以至近期的研究狀況

根據林玫儀主編的《詞學論著總目(1901-1992)》，進入 80 年代，陳維崧研究在「量」之上有了飛躍性增長，單就「總論其詞」的文章，就有孫克寬〈陳迦陵詩詞小論〉(1980)、鄭孟彤〈論陳維崧的詞〉(1981)、周旻〈論陳維崧的詞〉(1984)、李文鍾〈胸中雲夢琢月手——略窺陳維崧詞作的思想和藝術〉(1985)、馬祖熙〈論迦陵詞——紀念陳維崧逝世三百周年〉(1985)、[日]清水茂〈陳維崧之詞〉(1985)、萬雲駿〈陳維崧詞的特點是甚麼〉(1986)、丁惠英〈陳維崧詞淺析〉(1987)、黃天驥〈陳維崧的湖海樓詞〉(1989)，共 9 篇，此外尚有陸續出版的陳維崧資料、詞作評介等作品。³²不可不提的，還有 1983 年嚴迪昌(1936 年-2003 年)在第一次全國詞學討論會發表的〈清代陽羨詞派論綱〉，以及 1984 年發表的〈論陽羨詞派〉，可見在「量」之上完全是創造了一個氣氛熱烈的討論平台，而當中不少文章在質素上也達到陳維崧研究中，一線的水平。

嚴迪昌的《陽羨詞派研究》是以他的論文〈論陽羨詞派〉及《清詞史》相關部份為基礎，從中增益開拓出來的。全書共七章，第一章追述陽羨一地的人文氛圍；第二章解析陽羨詞派所處的時代背景及承繼自蘇軾與蔣捷的歷史淵源；第三

³² 林玫儀主編：《詞學論著總目(1901-1992)》(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 6 月)，頁 1542-1544。

章展示了詞派的構成與盛衰；第四章闡釋了陽羨詞派的詞學觀及理論深度；第五章總論陽羨派的創作成就；第六及第七章分別以詞宗陳維崧及諸陽羨詞人為論述對象。³³

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本身就是一流的學術著作，對清詞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他對陳維崧研究的建樹主要有三點：一、以充份而大量的理據論證陽羨派的成立，同時將以陳維崧為首的一眾詞人納入「流派」論述之中，再從此出發將陳維崧等放置在整個詞史上考察；二、除了宗尚蘇辛一脈，更提出蔣捷對陽羨詞人，包括陳維崧的影響；三、肯定了陳維崧以詞存經存史的詞學觀，提升了理論深度，補充了陳維崧作為一詞派宗主的貢獻。嚴氏的貢獻除了研究成果本身，還包含了切入角度、方法論上的意義，他在知人論世的前提下，把陳維崧納入詞史、流派史的批評角度之中，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

九十年代至今，陳維崧研究的相關材料持續出版，年譜方面，有丁惠英的〈陳維崧先生年譜〉(1991)、陸勇強《陳維崧年譜》(2006)、馬祖熙《陳維崧年譜》(2007)、周絢隆《陳維崧年譜》(2012)。專篇論文有丁惠英〈湖海樓詞的風格〉(1992)、周絢隆〈論迦陵詞以文為詞的傾向——兼評陳維崧革新詞體的得失〉(2002)、〈論陳維崧以詩為詞的創作特徵及其意義〉(2002)、承劍芬〈陳維崧的師友交游與其詞風分期〉(2012)、〈試論陳維崧的性格二重性與詞作的複式變調〉(2012)、李睿〈論陳維崧詞在清代的接受〉(2012)。尚有大量論文，在此不一一細列，只選取能反映陳維崧不同面向的論著，以展示陳維崧研究經過八十年代質、量的高峰後，九十年至千禧後呈現眾聲紛雜，論述角度與研究方法越趨多元繁榮的局面。而陳維崧研究仍然是不少專家所關心的對象，例如《清詞名家論集》有陳邦炎(1920年-)撰〈評介陳維崧及其詞論詞作〉(1996)。陳氏依然是結合知人論世角度來考察

³³ 嚴迪昌著：《陽羨詞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2月)

陳維崧，陳邦炎認為陳維崧的悲劇性在於他才絕一世而始終被困屋場，而陳邦炎更認為陳維崧詞論中存經存史之說，是清代諸尊體說中最具說服力的一支，原因是陳維崧指出了文學的價值並不在於體式本身，乃是取決於作品內涵與作者的取材運思，將詞體根本地從豔詞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相對朱彝尊、張惠言分別以尚清空騷雅，以及依托詩體，來得徹底，也更富理論的高度，³⁴陳邦炎對陳維崧的理解可謂深得詞心。而詩詞專家葉嘉瑩(1924 年-)教授雖然一直以來的清詞研究重點也傾向浙、常二派以及王國維詞學，但葉教授演講集《清代名家詞選講》仍有陳維崧的專講，³⁵直到 2014 年，葉教授仍有〈陳維崧詞講稿之一從雲間到陽羨詞風的轉變〉³⁶發表，可見時至今日，陳維崧在詞學、詞史、詞論的地位與研究價值，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所一致認同的。

九十年代至今，雖然相關著作量甚豐，也開始有研究者意識到陳維崧研究應該有所開拓，但總的來說，似乎還未形成某一特定的取態與論述的主流。但這不是說近年的研究並不可取，相反，承着前人的步伐，在肯定前人貢獻下，近年學者更能觸類旁通，各有轉化。例如邢蕊杰曾發表包括其博士論文〈清代陽羨文化家族文學活動研究〉(2008)在內的數篇論文，如〈清代陽羨文化家族聯姻與詞文學集群生成〉(2012)、〈清代陽羨姻婭家族文學生態探論〉(2012)，當中他從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以及清代詞學的地域姻親特性中，轉化出「文化家族」的概念，用以分析陽羨詞人群，當中〈清代陽羨文化家族文學活動研究〉第六章更是以陳維崧為代表的毫村陳氏為研究個案。

而學者也陸續開始留意陳維崧這一代詞宗的形象是如何進入接受的視野，也就是說，是陳維崧接受史的問題，當中論文包括李睿〈論陳維崧詞在清代的接受〉

³⁴ 陳邦炎、葉嘉瑩撰：《清詞名家論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 年 12 月)，頁 31-78。

³⁵ 葉嘉瑩著：《清代名家詞選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64-79。

³⁶ 葉嘉瑩著：〈陳維崧詞講稿之一從雲間到陽羨詞風的轉變〉，《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14年3月)，頁5-10。

(2012)，以及張宏生教授的〈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2013)，當中以張教授的論文最能達至理論的深度，張教授的結論是：第一，雍乾時期是陳維崧接受史的重要時期，人們對其基本的創作趨向和風格特色都有一定的認識，但仍未有共識，而這個時期與陳維崧去世的時間相去未遠，評論中夾雜了不少感情的因素；第二，陳維崧的詞史說雖然在雍乾詞壇未有理論上的直接回應，但卻以詞的創作來的體現，我們不妨將之視為與後來周濟、謝章铤「詞史」理論溝通的橋樑；第三，雍乾時期，仍有不少批評家將陳維崧視為浙西詞派的一員，這固然反映了陳維崧詞的豐富多元，也反映雍乾詞壇希望出現強勢的風格。³⁷

〈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的貢獻在於將今日已成凝固概念的「陳維崧形象」先解構，然後還原於歷史事實，重現「陳維崧形象」的建構過程以及真實面貌，同時又能將陳維崧的接受史放置在整個雍乾詞壇中考察，可謂能出入於詞史。張教授主理《全清詞》的編輯工作，掌握大量文獻材料，在清詞研究上著作甚豐，其《清代詞學的建構》中就有不少篇幅牽涉陳維崧，如第一章「政治內涵的深度和廣度」中，就有討論陳維崧反映明清易代、關心民瘼的詞作，³⁸又如第六章「清詞流派的發展狀況及其文化特性」，自然有不少篇幅討論陳維崧的詞風、階段性發展及影響。³⁹

總結：陳維崧研究呈現的三種研究角度與面向

就以上資料而言，我們可以總結出陳維崧研究呈體了三種主要的研究角度和面向。各種角度之間並不是一刀切劃分，當中或許有所混和與參照。

³⁷ 張宏生：〈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7 號(2013 年 7 月)，頁 205-221。

³⁸ 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7 月)，頁 1-31。

³⁹ 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頁 140-163。

第一種，是以知人論世的外緣歷史視角，由陳維崧的家世、生平切入以解析陳維崧的詞作，代表專家為錢仲聯、陳邦炎兩位。因着生逢易代，陳維崧祖、父輩皆為清流，而他自己畢生在流浪天涯的同時，結交着大量在明清易代光譜上流動的文人，因此，這種建基在正確史實上的切入方法，就有其必要性，而在這切入方法下推出的結論，主要是指出陳維崧在題材上的社會現實意義，實錄了明清易代的時代精神，既有關懷民瘼，批評血腥鎮壓，也有傾訴國運傾頹，懷古弔勝，黍離之悲的體現，而風格上則由此神交古人，以蘇、辛為主，而兼有婉約。這第一種切入方法及其得出的成果，基本上是量、質都佳，是陳維崧研究的最大成果，其家世、交流的個別細節尚可加深挖掘，但具體框架已經有正確的認識，而其風格主蘇辛，而兼及婉約，幾近可成定說。

第二種研究角度，是把握清代詞學的地域性以及姻親特性，將陳維崧放置到流派的研究視野，以及以一代詞宗的身份去考察他的生平及作品。代表人物為嚴迪昌的《陽羨詞派研究》。清明兩代文人好結社，好唱和，文社特多，而文社當中又有一大部份是因着地緣相近，或為同里姻親而結成的，陳維崧及陽羨詞派正是其中佳例。透過這種切入角度，學者多以陳維崧為中心，向外放射擴散，聯繫其他陽羨派內詞人的生平、詞作，對陽羨詞派的宗風特徵有一定的把握。同時，又有另一種取徑，是以陳、朱對照，透過互相參照而確立陳維崧的定位。可是，基於一些客觀因素，致使某些研究部份仍未完善，例如早年個別陽羨詞人因涉海通案、奏銷案，使到得以保存的資料較少，徐喈鳳(1622年-1689年)正是當中例子，又例如相較浙西、常州，陽羨派的研究起步較晚，部份學者甚至曾經認為陽羨派理論薄弱，不足以支持作為流派的面目。根據清人視野、陽羨諸詞人的詞作、詞論，筆者始終相信陽羨詞派是成立的，而且是清代重要的文學流派，問題是應該加深思考：陳維崧在流派更替中擔當了甚麼的角色？陽羨詞派及詞人，相較浙常二派，呈現了怎樣與別不同的流派形態？陳維崧又在多大程度有流派史的自

覺？

第三種切入角度，傾向內緣，主要是研究陳維崧詞作的各種體裁、各種體式，當中較有成果又有共識的項目，是指出陳維崧小令詞作開古今新奇面目，以小令之體式突破婉約溫柔的前設，使小令也能體現出瀟灑雄放之氣，又如長調之一發無餘，既是其佳處，也是其短處，不少研究者也指出陳維崧的沉鬱不足，這也是大家的基本共識。其他偶有發揮的研究成果例如有陳維崧以文為詞、陳維崧衍詞造句的特色等。這些都開展了富廣度的而多元的方式和面向，而往後的研究大概可以往深度挖掘，出入於詞史，將由內緣微觀方法切入，而歸結到歷史的大背景之中。

第二節——研究方法

總括而言，陳維崧是清代詞學研究中的一大板塊，這是前人的共識，也有一定高度的研究成果，但相較朱彝尊的研究，陳維崧的研究又稍微顯得起步較遲，數量不足，此其一；主流陳維崧研究以外緣研究方法切入，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任何陳維崧研究都必須考慮和注意到的。但是如何自外緣方法出發而又能呈現出對陳維崧主體意識、自我詮釋的關注，以及對詞體本身有內緣性的發微，這是筆者更為關心，也認為是可以發展的路徑。簡而言之就是研究如何能自外緣轉出內緣，透過兩種視角之間的互相對話，在宏觀微觀之間互為發揮，此其二；論述陳維崧繼承蘇辛詞風的部份，大體已有共識，甚至幾近可成定說，往後的研究如果仍然使用完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相同的詞作和文獻材料，就會顯得陳陳相因，我們應在尊敬前人成果、運用前人資源的情況下，作出轉化，引進合理又有所啟發的新研究方法，例如轉向關注在陳維崧近千七首詞作中，呈現其他風格的詞作，此其三；而在眾多範疇之中，陳維崧的詞論



研究以及其在陽羨詞人中定位問題的部份，是顯得稍微薄弱，原因是曾經有好一段時間，大家都把注意力全投放在浙常二派及其詞論之中，未能發掘陳維崧詞論的理論深度，事實上除了〈詞選序〉一文外，陳維崧仍有不少理論文章，甚至可以組成一理論流，此其四。

問題的提出

在尊重前人成果的前提下，其實尚有不少關於陳維崧研究的問題可以補充和追問下去：

其一，傳統「知人論世」式的文學史研究方法，把作家放置在社會政治的人倫關係網中考察，作家是其中一員，作家因應種種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而作出反應，這強調了環境決定論的力量，但文學研究之所以有部份不同於史學研究，正正是因為我們除了關係客觀歷史、環境的影響，也關心文學主體性⁴⁰的問題。在

⁴⁰ 主體性，就哲學層面而言，當物體與物體產生作用，發出、施行的一方即「主體」，接受該作用的稱作「客體」。而「主體性」，據法國哲學家艾倫巴迪歐《主體理論》《世界的邏輯》等著作中的分析，每個人都有其客觀物理的存在方式，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產生主體性，主體性是當我們宣稱自己能切入、關涉於事件之中，作出思考判斷，並向自己所深信的真實邁進，即便宣告主體性能產生。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亦強調人的自我覺醒，富有改變現實世界的意願，當中實現了個人意志。當然，在後現代的哲學思潮中，不少理論家提出「作者之死」，理論家開始思考究竟有沒有主體性的存在，抑或主體性不過是在各自表述中，不斷遊移與滑動的一種相對的視野或論述。尤其是在文學的領域的論述中，絕對的主體性更是難以名狀。但在此仍提出主體性作為研究陳維崧詞作的切入角度，我認為始終有一定的價值。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的意見中，主體性即強調人的能動性而非被動性，強調人的能力與主觀創造，文藝創作的主體性，是「把實踐的人看作歷史運動的軸心，看作歷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經濟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高度重視人的精神的主體性，這就是要重視人在歷史運動中的能動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劉氏言論固然有其特定的針對點，但這不妨礙他意見中的啟發，這提示了我們主體性是強調人的創造性，人並不一定完全接受歷史的制約。而自陳世驥、高友工、蔡英俊、張淑香、鄭毓瑜等學者一路以來的抒情傳統論中，也強調了抒情主體、抒情自我的重要性。有幾點是值得參考的：一、以向心式詮釋來透徹理解經驗在人的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強調反復的自省、向內的心

陳維崧的個案中，不少論者都對其性格、際遇有詳細的分析，但始終罕見有人直接指出陳維崧其人作為主體的意義，以及這種主體性是如何產生和呈現。

其二，錢仲聯、陳邦炎、葉嘉瑩等諸位前輩學者筆下的陳維崧研究，共同塑造了一種「陳維崧形象」，這種形象的內涵，在上文已有描述，在此不再贅述。這裡主要想指出的是，作家所處當代的讀者接受情況、當下我們閱讀陳維崧所得出的觀察，以及作家本身如何在作品中呈現和定義自己，是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但同樣重要。前兩者已有不少學者論及，但第三者，則往往少見學者指出。究竟接受視野與創作者和作品本體之間，有否出入和落差，是值得深究的。

其三，詞作，固然是我們視陳維崧為一代詞家大手筆時，重要的研究材料，但陳維崧除了是詞人，也是詩人，也是散文作家、駢文大家。後人研究往往因應不同的切入角度，而只選擇某一種文類作為材料。本研究相信，而同時所關注的，是如果要還原更立體的面目，發現更豐富的面向，陳維崧這一創作主體同時身兼詩、文、詞作家的特色，就不可忽略，因此創作的生命與文體考察並不能一刀切式斷裂研究。向來詩與詞的關係密不可分，不論是起源，論述語言也互為參照，而文章序跋又往往最直接記錄作者的論點，如果我們能夠同時關照詩文詞三種文類的素材，互為參照，即使我們最後依然判定陳維崧詞的成果最為豐碩，但對其

理運作；二、自我作為一種結構，強調自我的觀察意識，有明確地以「我覺得」、「我認為」作為呈現省思的模式；三、抒情經驗與自我詮釋的提出，經驗在省思之中，不斷地反復對話溝通，進而繼續又再塑造體驗中的自我，透過互為定義產生意義。本研究所關注的，正正十分接近以上的論點，本研究所討論陳維崧的主體性，是要關注他在外緣制約外的另一種內在面向，這種內在是心理性的，也是文本性的，我們要關注那些陳維崧如何談論自己，以及由他所判斷、主動作論述的部份，還有就是他怎樣在主客體反復的對話交流中，不斷修訂，從而再體驗自我的部份。以上論述參考自紅旗雜誌編輯部編：《文學主體性論爭集》（北京：紅旗出版，1986）；呂正惠：《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台北：里仁書局，2000）；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人文，2014）。

詞的理解，必更為立體，甚至有新的論證過程，可以補足陳維崧研究的框架。

研究方法及切入角度

基於以上的思路，本研究在考慮研究方法時，主要選取以下的切入方法及具體操作：

其一，在整個研究中，詞是論述的主軸和中心，但同時將對陳維崧詩歌的考察提高，以之作為一種經常與陳維崧詞作參照的對象，同時將詩詞兩體的比較，上升至接近方法論的高度，以之貫穿整個研究。第二章討論的陳維崧三年多「棄詩弗作」一事，固然同時涉及詩詞文本，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以詩歌為論述單位、對象，但其實際內涵是關於陳維崧詞學觀念的文學現象；第三章討論陳維崧詩詞本文中屢屢提及的「恨」意涵及主體性，詩體、詞體基於文體特質的界別分歧，在書寫相同內容的時候，也可能有不同的指向與落差，詩詞對照並讀，就可以發現這種意涵在不同文體中體現的張力；第四章則透過各種詩詞序文，直接分析陳維崧本人就詩體詞體界別的觀點，最終回應陳維崧詞學理論中以詞「存經存史」的實際目標。

其二，相對環境決定論、讀者接受批評，本研究更傾向於更重視作家和作品本體論，因此本研究題目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即為探討陳維崧專力填詞的創作動機。我們相信，在陳維崧研究的個案中，以歷史背景為切入角度的研究已經十分足夠，接受史的研究也已經展開，相對來說，作家和作品本體的討論似乎仍有可發掘的空間。陳維崧的全集已經編輯面世，年譜也有幾種，從這些資料看來，作家本體的研究似乎也達到一定的質量，但在眾多研究之中，切入方法基本上甚少考察作家本人作為創作主體之情況下，陳維崧自我詮釋、定義自己的情況，因此

本研究將有意填補於這塊空缺，在整個研究的設計中，將會往往帶着這種角度審視各種材料與文學現象。

第三節——研究範疇及研究價值

研究範疇

本研究的框架立足於陳維崧的各種文學書寫，集中於其在世時段和與此相關的一些文獻材料，包含一些具有詮釋價值，而較少討論的贈答酬唱作品、序跋文章，當中，尤其著眼陳維崧成就最高，也是書寫傳統中抒情性質最強的體裁文類：詞，以之作為本研究的論述核心，同時也會有意識地詮釋一些相關詩作，以之作為可以深化詮釋其詞的參照點。在論述中，或會引用他的散文與駢文，但散文、駢文自有其另外一套書寫傳統、事典系統、審美方式，而且陳維崧的散文、駢文又往往多以序、跋、書信形式出現，因此，本研究傾向將他的散文、駢文定位為論述性質較強的材料，並且會於第四章〈試論陳維崧創作理論中詩體詞體的界別〉集中討論。

年譜方面，現時流通的陳維崧年譜專著有馬祖熙、陸勇強、周絢隆三種版本。馬氏本相對精簡，可作速讀便覽之用，陸、周兩本相對詳備，更適用於學術研究，而周本後出(2012)，在編制和體例上更為方便和理想，而更重要的是，周本能後出轉精，在資料的收錄和考證上更加細緻，以康熙十五年正月為例，陸本只有條目兩條，周本有七條。陸本只記陳作何詞，周本除能錄有何詞外，對詞的繫年繫月也較為仔細，而且周本後文三月有條目「再用元旦韻和史可程」回應正月條目「正月初一，和史可程韻賦《五福中天降》」，⁴¹更能體現陳維崧生平的整全面目

⁴¹ 周絢隆：《陳維崧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頁493-494。

和人際往還。雖然周本附錄錄入的〈迦陵詞分類研究〉等篇與本研究的觀點不盡相同，但基於其資料考證仔細詳實，除非在文中特別提出，否則本研究將依周絢隆《陳維崧年譜》為準。

至於文獻選本方面，本研究選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的三冊《陳維崧集》。這套書是現在最齊全，也是唯一的標點排印本陳維崧作品合集，合收陳維崧詩、詞、散體、駢體。《陳維崧集》以康熙二十七年愚立堂《陳迦陵文集》本為底本，並校以《陳檢討集》、《古今詞選》、《倚聲初集》諸本，而且校對比較完備。比較《清詞序跋彙編》、《全清詞》等彙編選本，《陳維崧集》在校對上也比較清晰，修訂處亦有說明，因此，如非特別說明，本研究大抵以《陳維崧集》為準。

研究價值

就方法論而言，本研究採取的進路與前人在陳維崧課題上的處理不盡相同，相較定位於文學史研究，可能成果更有益於文學研究本身，在這角度上，這固然是一種補遺，但同時未嘗不可以視為一種嘗試，嘗試以新的視野，重新審視一位重要而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家。

就宏觀的清代文學、詞學研究方面而言，雲間、陽羨、浙西、常州是清代的最重要的四個詞派，陳維崧又是陽羨詞派的領軍和代表人物，如果本研究採取的切入點能得到相應的成果，那麼，將對日後理解陽羨詞派及詞人的整體格局，都會有所影響，然後再能作出更多更深入的挖掘，這對於整個清代流派史，也能有所推動。



就人物研究而言，如果本研究的論點成立，那麼陳維崧除了一向所展示的「霸悍」、「宗尚蘇辛」風格外，將有可能被發掘出其他面向，而這些面向可能更加貼近一位人性化而複雜的作家的真貌，這同時也能說明，研究詞人時，研究其詩、文、賦會帶來更大創獲，反之亦然。一方面這固然使到陳維崧的面貌更為立體，另一方面也為人物研究開拓出另一種研究路數，能重新開拓很多本來沉寂下來的領域。

第四節——章節說明

除第一章，即本章緒論，以及第五章結論外，第二至第四章為論述的主體部份。就主體部份章與章的論述關係而言，第二章〈試論陳維崧癸丑至丙辰「棄詩弗作」的原因〉透過「棄詩弗作」一事證成陳維崧有意識地專力倚聲填詞，並有一定的創作動機，作為論述基礎；第三章〈「僕本恨人」——試論陳維崧詩詞作品中「恨」的意涵及其主體性〉承接第二章的立論推進，論述陳維崧之所以專力填詞，是因為從作詞中能轉化出具體的意涵和主體性，體現他的性情面目，而理解這種自我詮釋是理解他倚聲填詞創作動機的重點；第四章〈「經」、「史」、「詩」、「詞」的分途與融通——從陳維崧〈詞選序〉試論其推尊詞體的根據〉則論述當這種創作動機由作品過渡到理論論述時的思路脈絡，並體現在詞這種體裁滿足了陳維崧心目中理想文學的存世價值。

第二章：〈試論陳維崧癸丑至丙辰「棄詩弗作」的原因〉

署名「同里蔣景祁京少謨」的〈陳檢討詞鈔序〉言陳維崧「向者詩與詞並行，迨倦遊廣陵歸，遂棄詩弗作」。從癸丑至丙辰秋(1673年-1676年)三年多的時間中，陳維崧自覺有意識地「棄詩弗作」，而專力倚聲填詞。這樣清晰地對不同體裁有



不同的反應，反映了作家心目中對詩詞兩體有一定的分工篩選，這對於理解陳維崧因何專事倚聲之道，是一筆重要的線索。

本章將討論陳維崧在詩詞兩體的角力中，因何在一六七三年有「棄詩弗作」，並投入「專力填詞」的決定。就此，本章以陳維崧的詩詞作品為資源，探討以下問題：他在「棄詩」前夕的人生遭遇如何；遭遇以及與此有關的自我審視如何影響他對詩詞兩體產生不同的態度；「棄詩」復出後，他怎樣回顧自己這段日子；政治因素在甚麼程度上對「棄詩」一事產生影響；以及更重要，透過詩詞兩體的角力，「棄詩弗作」一事，反映了他怎樣的創作觀念。

第三章：〈「僕本恨人」——試論陳維崧詩詞作品中「恨」的意涵以及主體性〉

文學創作除了介入客觀世界，陳述和描畫種種客觀環境和事物外，與此同時，在書寫的過程中，創作主體透過選擇不同的書寫方式，其實，也是一種自我詮釋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能從而建立起主體性。本章以「恨」和「僕本恨人」作為理解陳維崧這種複雜性的脈絡，是因為當中關係到陳維崧對書寫傳統的回應和自我詮釋。

陳維崧的創作中，屢有言「恨」，如〈念奴嬌·次夜韓樓燈火甚盛仍聽諸君弦管復填一闕〉有「僕本恨人，公皆健卒，不醉卿何苦？」、同調〈田兄散木皆有送予歸陽羨詞作此留別〉有「僕本恨人臣已老，怕聽將歸絲竹。」，此外有「僕本恨人」語者有〈沁園春·贈別芝鹿先生即用其題烏絲詞韻〉等。

「僕本恨人」固出自江淹〈恨賦〉，但本章傾向將「僕本恨人」視為一種能夠讓創作主體參與和回應，透過挪用轉化產生新意義的書寫傳統，而非單純的修

辭技法。「恨」是一種人類的普遍情緒，而在易代國變之際，更可以說是人皆有恨，本章關注的重點是創作主體如何在「恨」的語境中穿插，透過對其他文本中「恨」的回應與參與，建構作品中既能回應時代情緒，又能獨樹一幟、辨識性甚強的主體性。

第四章：〈「經」、「史」、「詩」、「詞」的分途與融通——從陳維崧〈詞選序〉試論其推尊詞體的根據〉

論及陳維崧的創作理論，論者往往舉出他在〈詞選序〉所言之「選詞之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作為維崧於詞學復興的有力貢獻。這固然是從本質肯定詞的藝術價值，將之上昇到與詩，甚至與經、史同等的地位。但在同篇序文中，另一重點「非徒文事，患在人心」卻罕見論及，而且如果將「存經存史」與「患在人心」合併起來一起詮釋，就更明顯並非單純推尊詞體，而是應該有更複雜的創作理念包含其中。

如何更好地詮釋〈詞選序〉和陳維崧的創作理念，至少我們應該考慮以下問題：相對於詞，陳維崧如何定義和詮釋「詩」；將詞抬升比附至詩、經、史的哪些面向；創作理論與創作行為之間有否落差。

而除了〈詞選序〉一文，陳維崧還有大量或駢或散的詩集詞集序跋文章，當中不少片段都為詩詞之別提供了更多前人所忽略的重要資源，因此，本章將會更廣泛地重新審視這些創作理論群，將〈詞選序〉納入這個更為龐大的詮釋體系中重新考察。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only.
Not for publica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第二章

試論陳維崧癸丑至丙辰「棄詩弗作」的原因

今日論及陳維崧，學術界多以「一代詞宗」、「陽羨詞人」等詞家身份目之，次者，也有人留意到其駢文成就。事實上，陳維崧屬於全能型作家，除詞與駢文，他早年稱詩里中，也留下大量富審美價值的散體文。向來詩與詞並行並論，我們討論和關注陳維崧的詞學成就時，實在應該一併留意和理解其詩作，這不論是站在人物研究，還是詞學研究的角度，也有其重要性和價值，而本章所論「棄詩弗作」一事，正是一件以詩為主要論述單位，但更重的是，這是影響我們理解陳維崧其人及其詞的重要事件，為陳維崧專力填詞的創作動機，提供重要的立論基礎。

署名「同里蔣景祁京少謨」的〈陳檢討詞鈔序〉言陳維崧「向者詩與詞並行，迨倦遊廣陵歸，遂棄詩弗作」。¹從癸丑至丙辰秋(1673年-1676年)三年多的時間中，陳維崧明確有意識地「棄詩弗作」，而專力倚聲填詞，這對於理解陳維崧如何看待創作、詩詞之別，以及他如何陳述自己，自我定位，都明顯是一筆重要的線索。

本章主要析論的是一系列與「棄詩弗作」有關的詩、詞，側重點是文學作品本身的分析，當中不能避免運用到外緣性的資料，但本章相對來說更傾向於內緣的分析。傾向歷史性、尋找詩詞本事的進路，固然有助我們正確理解文學作品的產生背景，不可摒棄，但過於向此傾側，就有可能忽略了作者透過作品寄託的情感，這無形中陷入了把文學——一種帶有豐富情感和審美體驗的藝術品——純粹當成一般史料的危機，又加上陳維崧本人對「棄詩弗作」有所隱諱，如果要勉強與某

¹ 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頁1831-1832。

人某地某事直接掛勾，或會有斷章取義之嫌。基於以上兩點，本文所取的切入角度，就有其合理性與一定的價值。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棄詩弗作」一事，歷來論者不多，當中可以嚴迪昌(1936 年-2003 年)為代表。他認為「之所以棄詩不作的的原因，除了為避禍外，主要是有意於廓清詞風，是意識性很強的、有明確追求的舉動」，²嚴氏留意到陳維崧對「詞」的肯定與貢獻，其後嚴迪昌舉出丙辰(1676)秋日陳維崧復出作詩後，所作組詩的第六首：詩律三年廢，長瘖學凍烏。倚聲差喜作，老興未全孤。辛柳門庭別，溫韋格調殊。煩君鐵綽板，一為洗綦蕪。³嚴氏拈出「長瘖學凍烏」句，認為陳維崧在其詩「益蒼辣奔放」之時毅然棄去，顯然是表示有政治上的原因。⁴

綜觀嚴氏《清詞史》，論述角度往往是以社會政治環境的發展與消長來說明清詞流派的遞變，而即使是藝術風格等屬於文學本身的元素，嚴氏也多以時代的要求來理解，所以，我們可以說嚴氏以政治因素來理解「長瘖學凍烏」是與全書格局一致的。這種研究取向的確顧及了清詞，尤其是清初詞壇的歷史現實，把作家鎖定在環環相扣的社會文化網絡來考察。

嚴氏之研究固然重要而不可忽視，但重複前人成果無助於學術前進，本文嘗試提出以另一種進路來考察「棄詩弗作」的原因。陳維崧乃名門之後，祖父陳于廷(1566年-1635年)、父親陳貞慧(1605年-1656年)，以至父執輩如冒襄(1611年-1694年)、陳子龍(1608年-1647年)、吳應箕(1594年-1645年)等，都活躍於明清易代史

² 嚴迪昌著：《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頁207。

³ 《陳維崧集》，頁798。

⁴ 《清詞史》，頁207-208。



的舞台，以出身、家世、歷史背景來將陳維崧定位，是符合一定的事實。然而，有兩點非常值得留意，也是本文嘗試在「棄詩弗作」一事中操作的思考進路：一、陳貞慧去後，陳維崧寄食他方，在長年四海作客的生活中，他個人的心路歷程，將如何影響他以詩詞轉化並呈現出觀看和陳述自我的眼光；二、在細讀具體作品的過程中，作家個人的創作意識，到底選擇了以怎樣的安排去陳述自身。

這兩種論述的安排，是歷來較少人論及和關注的，而本文認為以上提出的切入角度和思考進路，正是一種相對新穎而且能積極理解「棄詩弗作」的可行方法，這與以避禍角度考量，將產生不同的論述形態，從新角度切入理解陳維崧「棄詩弗作」，對我們理解其人及其詞會帶來新的啟示。

當詩人也自言「長瘖學凍鳥」時，所牽涉到的人事自然不會太明顯。秉承本文重視文學本身的分析，探討陳氏「棄詩弗作」事，具體上，下文將從兩個方向展開：

第一，如果我們相信這為期三年多棄詩不作的決定，並非一時衝動，而是作家長期創作實踐後的沉澱，同時呼應了陳維崧晚期創作狀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考察其前夕，即由康熙七年戊申(1668)至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四年間的詩詞作品，從中體認陳維崧當時的際遇，以及他對詩詞兩體的態度。

其二，陳維崧《湖海樓詩集》卷五丙辰(1676)年的唯一一組作品，全名為〈余不作詩已三年許矣，丙辰秋日柅園先生同小阮大年、令嗣天存過訪且示我明月詩筒一帙，不覺見獵心喜，因泚筆和荔棠先生韻亦得十有二首，辭旨拉雜，半屬譚語，先生第用覆瓿，慎勿出以示人也〉(下文簡稱〈和荔棠韻十二首〉)，這組詩是陳維崧復出作詩後的第一組作品，不少詩句字眼也有回顧意味，在理解了康熙

七年戊申(1668)至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四年間的情況為前提下，重新閱讀〈和荔棠韻十二首〉，是檢討陳維崧如何陳述和回顧「棄詩弗作」的重要文本。

第二節——戊申至壬子(1668-1672)

陳維崧棄詩前夕的自我審視與對詩歌的態度

清康熙七年戊申(1668)，是年陳維崧四十四歲。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陳維崧因家貧故，遭家人催促，持王士禛(1626年-1673年)書往延令(即延陵，今泰州)求告援助，不果，失意而還，此事有王士禛〈歲暮其年由延令來過寓園，因同宿，次晨即別，賦此送之〉作證。其後於清康熙六年丁未(1667)道經蘇、揚二地返鄉，曾與王士禛(1634年-1711年)、王士禛、吳偉業(1609年-1672年)、吳之紀(1629年-?)、吳兆寬(1614年-1680年)、徐崧(1617年-1690年)等名士於途中嬉遊飲宴，並曾遊楓橋、寒山寺、拙政園等名勝。至一六六七年秋返鄉依居城南。翌年春，陳維崧在鄉間多是與史惟圓(生卒未詳)、任繩隗(1621年-?)、徐喈鳳(1622年-1689年)、史豎宗(1623年-1674年)等賞花宴遊度日。然而留鄉日子並不長久。該年夏，北至燕，五月抵京，從龔鼎孳(1615年-1673年)遊，一時名流爭相邀筵拜訪。其後一直與京師名士權貴，如李天馥(1637年-1699年)、王士禛、魏學渠(生卒未詳，順治五年1648年舉人)等相與往還，其間陳維崧曾多番感慨風塵淪落，一事無成，曾上書李天馥求援(〈念奴嬌·八月初七夜對月，呈李湘北太史〉)，龔鼎孳對於無法相助也深感無奈。然而不久後，陳維崧得到了入河南學使史逸裘(生卒未詳，順治乙未1655年進士)幕的機會，這對於陳維崧來說可算是一件小喜事。冬日，龔鼎孳為其設宴餞行，此後至康熙十一年(1672)的四年間，雖陳維崧仍有遊歷江南，但總體而言也是以河南作為生活基地。



2.1 陳維崧戊申至壬子間(1668-1672)的自我審視

在這四年間，陳維崧有部份拜謁請託意味強烈的詩詞留下。在這些詩詞作品之中，陳維崧有不少陳情表志的描述，例如戊申(1668)八月七日，陳有詞呈李天馥，名為〈念奴嬌·八月初七夜對月呈李湘北太史〉：

帝城今夜，正萬家齊看，一鉤新月。照過龍樓和鳳苑，來照盈顛華髮。
冷露初零，清輝未滿，玉宇都清切。六街香霧，也知絲管難歇。最是
太液詞臣，金閨才子，對景偏軒豁。退直玉鞭搖闕下，鴛瓦一時堆雪。白
可騎鯨，廣能射虎，醉擊珊瑚折。料應相念，有人孤館愁絕。⁵

是時陳維崧已抵京，上片寫帝京之繁華景象，歌舞昇平。下片由上片過片處之「也知絲管難歇」，引出「太液詞臣，金閨才子」，以及後文的「白可騎鯨，廣能射虎，醉擊珊瑚折。」，這裡幾處用上與李姓有關的典故，推測是借此誇耀同是李姓的拜謁對象李天馥，而所言「太液」、「金閨」、「退直」也可與李天馥當時任翰林檢討並鄉試副考官的身份有所對應。結拍謂「料應相念，有人孤館愁絕。」明寫自己有才但未能致用而愁絕孤館，其實潛台詞就是拜託這位官在翰林並事涉科舉的李天馥「應相念」，照料陳維崧這顆滄海遺珠，使到不至於獨愁孤館之中。

同年陳維崧有詩〈贈吳默岩先生〉。吳默岩即吳國對(1616年-1680年)，其時吳任翰林編修。詩中除回顧二人交情，不少句子也有乞憐之意，如「我生偏側不稱意，角鷹失勢鳴飢腸。江淮連岩苦奔走，跳躍只如馬脫韁。南誰夫子今健者，與我相見平山堂。」、「今年燕市作傭保，三伏已退啼秋蟻。謁公恰值張弧節，興極不辭吞百觴。」、「如余飽飯窮亦得，坐看公等排天閭。」⁶

⁵ 《陳維崧集》，頁 1323。

⁶ 《陳維崧集》，頁 692-693。

兩首詩詞中，陳維崧寫來頗多奉承之語，請託、拜謁的意味明顯。然而，如果我們再一併對照陳維崧詩詞中，那些為數更多，並非寫來拜謁求售，而是寫給知己友好，甚至只是一己抒懷的作品，我們可以對照出兩者的不同，再藉此理解這對陳維崧產生的衝擊，以及當中的張力。

戊申年(1668)，陳維崧有〈短歌酬周聖濤兼呈立五先生〉，詩云：

多年冷屋賃不得，泥濘連朝衢巷塞。旦往城北暮城南，老大牽人腳無力。周子貽我一束詩，張燈曠黑疾讀之。惜我遲暮憐我窮，其中情緒如春絲。我今萬感無不有，姓名那足污君口。嚙人芻秣供人驅，我今不如轅下駒。餽人門戶與人見，我今不如梁上燕。我在泥塗莫歎嗟，人生知己良堪誇。感君父子與我好，醉即尋君同看花。⁷

這首歌行體是陳維崧寫給鄉里周啟騫父子的。周啟騫(生卒未詳，順治四年進士)，字立五，起家寒微，事見《宜興縣志》，周聖濤(生卒未詳)是其子。詩篇一開篇即言詩人居室之頹然，並述說周聖濤贈詩以顯二人情誼。雖然是朋友關係，詩篇也沒有反映任何拜謁引路的利害關係，但顯然陳維崧對二人身份地位的差距是敏感的，「姓名那足污君口」，陳氏自視個人形象之低落，甚至即使身處朋友之間，也覺得污辱對方，隨後他甚至以牛、馬、梁燕，牲口鳥獸自況，認為自己是食人禾草，供人驅役，寄人籬下。又如〈史雲臣宅看牡丹席上作歌兼憶去歲松陵同看花諸子〉，其時陳維崧歸鄉未久，春日過史惟圓宅看花，因而作此長歌，全詩頗長，而其中最關乎陳氏之形象者，如下：

⁷ 《陳維崧集》，頁 672。

君不見陳生老大心轉癡，作人僅免人奴答。村中有花鎖空宅，乞食春城空爾為。⁸

同樣地，陳維崧面對年華老去，他自覺沒有隨年歲閱歷越見深明世情，反而是越顯痴迷，願望也僅僅是免於受人勞役。凡此種種，詩例頗多，如：

我生江表若培塿，何異斥鷃棲樊籠。昨年驅車走燕趙，亦復羸馬經山東……前朝熹廟歲乙丑，余祖六袞孫得雄。含飴摩弄感神貺，嘉名肇錫云維崧。此行詎料涉山麓，禮合膜拜酬神功。何為過廟不敢入，爾與童羖將無同。嗚呼此亦大有故，貧賤自恨無終窮。短衣蔽骭泥沒踝，見此轉使山靈恫。依人奔走覓衣食，似爾豈得誇桑蓬。揮鞭掩面凌絕險，矯若驚鳥搏天風。趁人山勢似相捕，遮莫失腳愁虛空。——〈雪後從偃師至登封度少室山崿嶺〉（節錄）⁹

詩中陳維崧刻意鋪寫當年自己誕生世上，祖父陳于廷含飴酬神之隆重，然後再回到今日過廟之不入，所謂「貧賤自恨無終窮」，就抒發了詩人於心有愧，無法面對家族恩情的自責，當日家族隆盛，今日自己卻落得「依人奔走覓衣食」的處境，詩人是無法處理這種情緒與困局的，他在當下只能揮鞭掩面繼續登山，但這種情緒即使能夠轉移至人山相捕的登山過程，但最後也不免於失足跌墜的「愁虛空」之中。

陳維崧對這種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是自覺的。對比甲申國變(1644)，清人入主中原，陳維崧之恨不在清人。他真正的心結所在，是背負家族名聲，以及頗足自信的才華，但現實卻要寄食門下，類同牲口。庚戌年(1670)，陳氏有詩〈述懷寄

⁸ 《陳維崧集》，頁 682。

⁹ 《陳維崧集》，頁 709-710。

季滄葦侍御即次其見贈百五十一原韻》，詩中固然有「父老為我說，明季當崇禎。兩河煽蛾賊，穢濁不得清。倉庾受爬搔，藩溷被淘澄。焚燒延殿閣，酷虐踰秦嬴。」¹⁰等描寫易代戰爭慘況的詩句，這些景況固然觸動詩人，是詩人記憶中不可磨滅的部份，但詩題所言「述懷」之「懷抱」，卻不在於此。詩人真正的懷抱是：

在淵無魚鱉，在山無橘橙。斯世乏霸才，敦槃誇會盟。手揩金鏡淨，再使瑤樞貞。念此有餘悲，逝將凌八紘。¹¹

使陳維崧動容心悲的，表面是世間無才德之人匡濟天下，但其潛台詞卻是自己有才而不得志，其關注點依然是個人的才華如何在時代中實踐。詩句至此，陳維崧尚且可以維持一點雄心壯志，但隨着「念此有餘悲」之「念」越發深沉，詩人的懷抱以及由此而來痛苦一併引發出來：

快隨劍首快，擺落儒冠繡。高談狀嶽嶽，長嘯聲嚶嚶。何當鑽故紙，直欲磨新硯。入楚友石乞，過晉揖飴甥。何難學牧豕，亦可鬻犧牲。攝目三語掾，掉頭五鼎烹。此意雖詼諧，仍然困燕薈。朝朝溷輿隸，夜夜惜嫋姪。空留俠烈腸，不敢辱父兄。愧無嫵趨態，足以供使令。吁嗟生不諧，焉能免譏評。潛鱗遘密網，俊翮觸修紉。昨又過汝南，獠狂逐麕麋。今財返梁苑，短髮垂鬢鬢。昔為鵠與鴻，今成蟻與蝨。身名難苟立，門戶何由振。¹²

段落中的三「何」：「何當鑽故紙」、「何難學牧豕」、「門戶何由振」，圍繞都是家族名聲與個人名聲、如何實踐個人才學的問題，由家族父兄所繼承的「俠烈腸」，

¹⁰ 《陳維崧集》，頁 748。

¹¹ 《陳維崧集》，頁 749。

¹² 《陳維崧集》，頁 749。

卻與「輿隸」混同，使到詩人個人感到無比侮辱，昔日的鴻鵠，今日的小蟲，強烈的落差是陳維崧晚期生命中的鬱結所在。

以上詩歌除了個人的屈辱，同時，按文意(「吁嗟生不諧，焉能免譏評。潛鱗遭密網，俊翮觸修紉。」)，還有實際出於他人之口的侮辱，而且這種侮辱按文意順序，應該是及於家族的。遭人譏評相嘲，是除了自慚形穢、淪落不得志外，另一個使陳維崧無法面對自己的原因。己酉(1669)年，陳氏有〈短歌贈秦對巖〉詩：

故人幾載不相見，短裘掩髀塵滿面。來春乞食繁吹台，昨秋作客邯鄲縣。
歲云暮矣風颼颼，張帆仍作東吳游。旁人拍手笑不止，野夫掉頭歌不休。
品泉因訪陸桑苧，填詞為尋秦少游。得詞與泉意便足，此外紛紛非所求。¹³

故人相見，但自己卻情狀潦倒。所謂繁吹台，相傳是師曠吹樂之台，漢梁孝王也築繁台，常歌於此。乞食於此，無疑陳維崧已自視如文妓。因此在東吳遊歷，遭受到的是旁人拍手恥笑，野夫掉頭的輕蔑。

陳維崧遭受譏評，上文已帶出是來自他寄食他人門下，名宦之家淪落成自視文妓這一事實。除此以外，尚有另一種情況。戊申年(1668)陳氏有〈暮春皆山庭砌菊生〉詩，詩云：「芽菊當春暮，偏驚物態新。江城無老伴，霜雪認前身。違俗生何早，逢時氣不馴。寄言桃李輩，相傍莫相嗔。」¹⁴所謂「物態新」、「無老伴」、「認前身」都可以理解成易代以後，人物都非，新人得勢(即桃李輩)，對陳維崧有所責難。像陳維崧這種名宦後人，在易代之後，遭受歧視排擠是非常常見的，也無關於所謂政治問題，例如陳維崧有〈李延公詩序〉文一篇，當中記述「李

¹³ 《陳維崧集》，頁 722。

¹⁴ 《陳維崧集》，頁 684。

生既以名家子，一旦門戶僨裂，姓名為當世所諱，不肯錄之齒牙間。」¹⁵即是一例，而陳維崧父親陳貞慧身後，家中子弟遭人視為俎上肉，兄弟不得不各走他方，也可證明。

己酉(1669)年春，陳維崧客陳州使院，有詞〈沁園春·客陳州使院花朝作〉，詞云：

歸歟歸歟，我亦在陳，胡不歸兮？正伏羲陵畔，穀紋六幅；宛丘城外，柳線千絲。萬種溫謦，百般釘飮，甯得愁心早上眉。渾無計，只沈腰漸減，潘鬢都非。江南值此年時，記巷口花驄分外嘶。更舞衫歌扇，錫簫陣陣；倡條冶葉，裙幄離離。拋了濃春，陪人遠宦，俊侶相嘲甚意兒。真無賴，拚化為飛絮，繞盡天涯。¹⁶

當中陪人遠宦，俊侶相嘲，說得明白不過。陳氏在中州的這四年，雖然入幕有職，但文獻沒有留下陳維崧任內的貢獻，更多的記載是他於這時段始終不廢遊歷。而據文意推斷，入史逸裘幕也沒有得到重用，故此是「陪人遠宦」，而陳維崧以辭章入幕，又無所作為，加上上文所說的情況，結果引來「俊侶相嘲」這類排擠。

這四年間，在生活中反反覆覆困擾陳維崧的，主要不是政權更替的國族矛盾，而是家族命運的衰頹，自己無能為力拯救家聲，更甚者是只能以辭章末藝寄食他方，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旁人的嘲弄和自卑感。

2.2 陳維崧內心鬱結與棄詩的關係

¹⁵ 《陳維崧集》，頁24。

¹⁶ 《陳維崧集》，頁1497。



上文我們理清了陳維崧在棄詩前夕的鬱結所在，下文會嘗試解釋作家的生平際遇和個人情緒，與詩詞取捨之間有甚麼轉化關係。

在陳維崧棄詩前夕，即壬子(1672)年，陳有詩〈首春留宿恭士齋頭幾及十日，別後長歌奉懷用昌黎寒食日出遊韻，并柬荃伯、牧仲、景炎、介子諸君〉，後半云：

覓酒南街串不休，得句西堂走相慶。晚歸每增小婦恚，陽狂頗減里兒敬。昨宵放燈景益奇，數客開尊興尤賔。屏出陽阿惱藥王，琰瀉新豐中酒聖。灼灼花隨絳樹添，嘈嘈曲與哀絲併。共誚迂閑非世情，實怕沉酣滅天性。今早春城一騎出，瞥見寒花數枝橫。舊雨纔歡酒暈融，殘冰已怯霜蹄迸。我愁好會隔芳筵，便知貧女辭粧鏡。更執鞭弭僕尚能，重主敦槃子為政。抽毫渺渺腸詰曲，伸紙蒼蒼勢嚴勁。何日還傾一斛珠，相從再拍六么令。¹⁷

這首詩的前半篇幅都描述與宴眾人在入春仍寒的氛圍中，忘情對飲歌咏。而後半，即以上引錄段落，就從高歌之中轉出詩人的處境。首兩聯由宴會的極歡轉折出現實的境況，詩人的佯狂放蕩在一般婦人，以至鄉里小兒的眼中，原來是種失禮的行為，會招人怨懟。但詩人選擇的不是從此罷飲，相反，是更見狂態。「共誚迂閑非世情，實怕沉酣滅天性。」是道出一般人對陳維崧這類人的看法，就文意推敲，陳維崧對此是自覺的，他沒有立即與俗浮沉，但也不能反駁。他轉而描畫今早出城的春景，飲宴始終是美好，可以使人醉倒(舊雨纔歡酒暈融)，但殘冰已經害怕馬蹄的迸進，不堪再一次的震盪。「怯」是這幾句的句眼所在，陳維崧

¹⁷ 《陳維崧集》，頁782-783。

對於世情、人言是明白不過的，他表面沒有回應，但他透過詩句以「怯」來回應，時至壬子年(1672)，他並非沒有振作的能力，而是他怯懦於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幻滅，「怯」正好點出了他明知如此，但又不敢向前，選擇留停在宴饗之樂中麻醉自己。而即使後文有所謂「更執鞭弭僕尚能，重主敦槃子為政。」也只是一種並不認真，或者說並非詩人最終對生命寄予的希望，因為當日一切的正事，都是歸結於尾聯「何日還傾一斛珠，相從再拍六么令。」的狂歌中。

這首作品中尤其值得留意的是，詩中所伴隨着酒宴的已不是誦詩，而是狂歌：陽阿、嘈嘈曲與哀絲併、腸詰曲、六么令，而陽阿與六么令更十分清楚指向的是倚聲填詞。這些歌筵酒席是站在世情、天性的對立面所出現，就此看來，倚聲填詞除了審美的意義，人們對此還有社會性的褒貶價值判斷。

上詩沒有明言世情、天性是甚麼，但我們不難理解，應是指向求取功名，建立功業。對於當時一般人的看法，陳維崧〈歲暮客居自述倣渭南體柬知我數公〉詩中其三、其四可透露消息：

三寸毛錐百不成，白頭壁立笑浮名。姬愁臘盡催辭竈，鄰怪囊慳勸入城。著眼乾坤偏偏側，撐腸文籍漫膨膨。誰憐吳郡真男子。溷作中原賣餅儻。(其三)¹⁸

貸粟監河擬上書，封題纔濕又躊躇。叩門早信言辭拙，被褐深知禮法疎。豈有斯人工造請，從來吾道在樵漁。群兒錯料貧原憲，決計來年把短鋤。(其四)¹⁹

世道所言正常之事，應該就是指入城求職、叩門拜謁、造請引路。

¹⁸ 《陳維崧集》，頁 776-777。

¹⁹ 《陳維崧集》，頁 777。

對於倚聲填詞的妙處，早在己酉(1669)年，陳氏已有體會，〈短歌贈秦對巖〉詩：

故人幾載不相見，短裘掩髀塵滿面。來春乞食繁吹台，昨秋作客邯鄲縣。歲云暮矣風颼颼，張帆仍作東吳游。旁人拍手笑不止，野夫掉頭歌不休。品泉因訪陸桑苧，填詞為尋秦少游。得詞與泉意便足，此外紛紛非所求。²⁰

最後兩聯「品泉因訪陸桑苧，填詞為尋秦少游。得詞與泉意便足，此外紛紛非所求。」雖然未有「棄詩」二字拈出，但「得詞與泉意便足，此外紛紛非所求」明顯地就是確立了「詞」有一種獨特的地位，是寫詩也不能得其意，在自己潦倒、遭世人恥笑的時候，可以有慰解之用，可以說，這首在己酉(1669)年寫成的詩作已有「棄詩弗作」的先聲，而原因正是個人的失意淪落和遭人譏評致使陳維崧轉向在詞中尋求慰藉。

而同為壬子(1672)年所作的〈咏雪用昌黎韻〉，就更直接地表達陳維崧對詩體已生出的厭棄情緒：

楚豫三年旱，淮揚閩郡災。所憂關粟麥，誰免訴瓶罍。詩獻當塗子，時需變理才……我生寒到骨，欲語路無媒。襏績辭空費，艱難志未恢。詩成慚劇腎，聊以鬥嬰孩。²¹

世間的天災，對民生的關注，都可以寫成「詩」，而「詩」是用於獻給當權者，

²⁰ 《陳維崧集》，頁 722。

²¹ 《陳維崧集》，頁 784-785。

時代須要「變理之才」，而陳維崧所獻之「詩」，正正可以述明志向，但詩人以申訴式的轉向(我生寒到骨，欲語路無媒)，把詩歌這種體裁否定，「褻績」本指褶痕，這裡可引申為反覆多次，時至壬子(1672)年，陳維崧經歷了以上種種，他曾經試過入幕，但嚐盡嘲弄，以辭客身份寄人籬下，不單不能面對自己，更甚是無法面對家族聲譽，他已經對拜謁求路完全失去信心，多次的請託，結果也是「褻績辭空費」，這種在文學傳統中象徵了賦詩可以明志、往往帶有述懷言志期許的詩體，在此時的陳維崧看來，不單徒勞無功，反而成為自傷自慚的根源。如果說〈短歌贈秦對巖〉呈現了他棄詩的先聲，那麼〈咏雪用昌黎韻〉就更肯定了他不足一年後棄詩的決定。

當然，詩、詞的社會功能並不是完全對立，也不能以簡單的二元對立來區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以上例子中，陳維崧在棄詩前夕亦有以詞拜謁之舉。在宴會中，因應主人、友好的要求，詩或詞作為一種社交手段甚至是遊戲，兩者的區分就不那麼嚴謹，有時選詩或詞，可能是基於倡和、贈答者原題是詩還是詞，以及主人家的要求等等。

而且有時即使同是所謂獻予「權貴」之作，也不能單純以階級、地位來判斷該作品就是拜謁求售之作，還要綜合陳維崧與之往來對話的一系列作品來判斷分析。陳棄詩後，同樣有獻呈「權貴」之作，如甲寅(1674)〈沁園春·呈伯成先生，和仲震原韻〉、丙辰(1676)〈水龍吟·送梁溪明府吳伯成先生新任閩中臬憲〉、丁巳(1677)〈水龍吟·上觀察金長真先生〉等。但是如果仔細考察陳維崧與幾人的關係，以及在不同時期的作品呈現的情感，就會發現，李天馥與陳維崧首次結識於康熙七年(1668)八月，其時陳在京，初次見面已呈〈念奴嬌〉詞，李天馥歷國子監、翰林院等職，康熙七年(1668)任鄉試考官，陳之〈念奴嬌〉的乞憐干謁還是明顯的，其後與李天馥以詩詞交友亦少；陳維崧與吳興祚(字伯成，1632年-1698

年)則相識於康熙八年(1669)，吳興祚平生喜與寒士文人交，頗多庇護救濟，有人望，陳吳二人初識時陳有詩〈梁溪贈吳伯成明府〉贈，〈沁園春·呈伯成先生，和仲震原韻〉、〈水龍吟·送梁溪明府吳伯成先生新任閩中臬憲〉是後來持續交往之作，二人交遊多集中於康熙十三年(1674)，〈沁園春〉詞更是陳維崧將離無錫，吳主動設宴並贈以酒米等以資上路，陳維崧既惜別又感謝之詞；金鎮(字長真，1622年-1685年)與陳維崧初識於康熙十五年(1676)，金任江南驛鹽觀察，禮聘陳維崧入幕，即使維崧未有政績，於翌年歸里，但他與金鎮還是保持較好的關係，十五(1676)年七月於揚州便有〈水龍吟〉詞相贈，另金鎮有修平山堂寺、召飲滿山賓客之舉，為一時善長，頗有佳評，事見孫枝蔚(1620年-1687年)《溉堂續集》²²、汪懋麟(1640年-1688年)《百尺梧桐閣集》²³。

這方面單憑個別作品的確比較難看出端倪，更需要考察陳維崧多首作品中所呈現的情感與關係的前後變化，例如陳吳二人初識時陳有詩〈梁溪贈吳伯成明府〉，這詩也寫得有抬舉、拜謁意味如詩句「側聞隣縣有神君，治行吳公今第一」、「謁公一盡平生語，明日搖船載泉去」²⁴；後來康熙十三年(1674)吳興祚斥資送別陳維崧，陳的〈沁園春·留別伯成先生和澹心韻〉及同韻〈聽梧軒夜集仍疊前韻〉，就洗去大部份干謁意味，詞句「烏鵲驚飛，繞樹無枝，誰為故鄉。嘆十年失路，愁雲淅白；三秋伏枕，病葉刪黃。欲哭不能，欲歌不可，冷盡吳鉤一寸腸。」²⁵雖然仍是起於失路之悲，但沒有在詞句中表現拜謁求官，反而是轉化出抒情聲音。

就陳維崧與三人分別的作品往還來看，陳與吳關係最佳，金次之，李又次之，

²² 孫枝蔚：《溉堂續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康熙刻本)，集部第206冊，〈觀察金長真以丁巳八月十三日祀歐陽子於平山堂招客賦詩予亦與焉詩限體不拘韻〉，頁772上下。

²³ 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康熙刻本)，集部第241冊，〈平山堂記〉，頁724上下。

²⁴ 《陳維崧集》，頁721-722。

²⁵ 《陳維崧集》，頁1503。



陳維崧甚至有詩辯解康熙八年(1669)無意引車避李天馥一事，如此看來，即便三人同是所謂「當途權貴」，但陳維崧的態度也有不同，就正如陳維崧之於龔鼎孳、王士禎二人，二人也可算當途子，但一般而言都不會把陳與龔、王二人的詩詞往還看成憑依干謁之舉。

雖然詩、詞的社會功能並不是完全對立，有灰色地帶，但總的來說，陳維崧這種對詩、詞的自覺區分還是明顯的，陳維崧棄詩後亦有復出作詩，但就其作詩題材來看，復出後，以「送」、「贈」、「記」、「題」這些實用類型為題的詩作極常出現，佔復出後一個相當大的比重，相反，在棄詩前，陳維崧筆底屢有出現、一連多首的懷古、咏史、感舊，以及多首以「鄰」(如鄰鐘、鄰燈、鄰花、鄰笛等)和以「新」為題(如新桐、新暑、新綠、新荷等)的抒情組詩，都不大復見。

詩與詞，兩者也是文學的體裁，就表情達意和感染讀者這些藝術功能和審美功能來說，兩者也包含這些功能。就戊申(1668)至壬子(1672)的情況而言，陳維崧之所以棄詩，並非完全因兩者在抒情功能、審美功能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詩是可以獻予當塗權貴，是言志述懷的，而透過言志述懷可以達到的經世致用、為官的目標，這是合乎世情，更是與天性相呼應的行為。相反，倚聲填詞、歌詞，往往是與狂歌買醉一併出現，會引發旁人倫理道德上的批評，更與天性相悖。詩與詞，起碼在陳維崧描述底下，存在這樣的狀態與認知，矛盾不在於審美功能的差異，而是在於撇除贈答、遊戲的社交功能後，詩與詞還負擔另一部份不相同的社會意義，牽涉到的受眾反應與批評。

在戊申(1668)至壬子(1672)年間，陳維崧固然能認知到詞體特殊、撫慰失意者心靈的作用，〈短歌贈秦對巖〉言「品泉因訪陸桑苧，填詞為尋秦少游。得詞與泉意便足，此外紛紛非所求。」便是十分明確的例子，但配合陳維崧的生活處境

來看，這種詞體的吸引力應該並非唯一把陳氏引向主力填詞的力量，另一種力量應該是當他求路無門時，那種由反復質疑詩體求路造請之用，甚至是冷淡於言志述懷，對謀求功名已生出厭惡感所產生的排拒力，使他背棄詩歌。陳維崧始終是在充滿譏評與失意的生活環境中，對詩歌生厭為先，如果沒有這種種失意與嘲諷，他對詩歌社會功能的否定就不會如此堅決，如果沒有這種種失意與嘲諷，他也不能體驗到另一種文學體裁帶來的新趣。

第三節——重讀〈和荔棠韻十二首〉

在了解陳維崧棄詩前夕的心景、理解他對詩詞的態度這兩前提下，重讀〈和荔棠韻十二首〉這組具回顧性的組詩，就有重新理解陳氏「棄詩弗作」的空間。

組詩全名為〈余不作詩已三年許矣，丙辰秋日柅園先生同小阮大年、令嗣天存過訪且示我明月詩筒一帙，不覺見獵心喜，因泚筆和荔棠先生韻亦得十有二首，辭旨拉雜，半屬譚語，先生第用覆瓿，慎勿出以示人也〉，共十二首。每首四聯八句。

詩題本身包含了三項重要的資料：

一、 明確指示不作詩之時段乃由丙辰(1676)秋日上推三年許，即至癸丑(1673)。

二、成詩乃因侯柅園等來訪，並出示詩稿引起陳維崧和詩的興趣。侯柅園，即侯汧(1614年-1677年)，一字記原，侯岐曾(1594年-1646年)次子。小阮大年，指侯汧侄侯開國(字大年，一字鳳阿，生卒未詳)。侯天存(生卒未詳)，本為侯柅園母



弟侯涵(1620 年-1664 年)之子，名萊，因侯汭以子繼侯峒曾祀，無後，故以母弟之子為其嗣後，事見汪琬(1624 年-1691 年)〈侯記原墓誌銘〉。²⁶侯峒曾(1591 年-1645 年)、岐曾與陳維崧祖輩同為先朝名臣，甲申後同樣家道衰落，有相似的背景與生活經歷。

三、陳氏煞有介事言「半屬讎語」、「勿出示人」，可見詩歌本身帶有一種私密性，有別於一般公開的應答酬謝之作。時間上的吻合，再加上這種私密性，反而正正指向了詩歌「絕非讎語」，內容和情感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對過去三年日子的回應。

全詩共十二首，是一組很日常的生活組詩，時間點由詩人個人生活既貧且病(其一「秋霖兼腹疾，偃仰此西軒。」、其二「僕病已踰月，吾廬祇半間。」)開始，透過詩作展開與侯汭的回憶(其三「怕說君家事，令人作達妨。」、「更聲真歷歷，似為兩人長。」)，在二人的對話中，展開了各種各樣的話題，當中對文學體式與變化的討論(其五「新詩殊兀莽，百變任雕鐫。」、其六「辛柳門庭別，溫韋格調殊。」)、以及抒發人事遭際的感嘆(其八「屈指追朋好，同心抵向禽。捫時同故劍，撿罷半亡簪。」、其九「黃公壚在眼，濁酒可還賒？」)，都是骨節所在，最後組詩透過對未來的寄盼(其十「古來推大雅，期爾定扶輪。」、其十二「脫歸承見訊，鴻冥不須古。」)作結。

以下將重點析論組詩的第一、五、六、七、十一首，²⁷從律詩本身的章法結構出發，嘗試疏通陳維崧的心曲。

其一

²⁶ 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 1 月第 1 版)，頁 1607-1610。

²⁷ 《陳維崧集》，頁 796-800。

秋霖兼腹疾，偃仰此西軒。門外屐初響，簷端鵲亂言。顛狂拋藥裹，浩蕩撥吟魂。所愧蓬蒿巷，還憑破蘚痕。

其一主要描述陳維崧貧病交煎的生活。首聯正點節令、地點，描寫詩人病中情況。次聯承首聯之「西軒」展開，推演至寫軒外之景，門外與簷端之微小瑣碎聲響，既非喧囂，也非徹底的寂寥無聲，據詩句的描畫，所寫之景應是早晨時份，人們開始出門活動的生活實況，是一種平常不過的日常風貌。第三聯承次聯的日常情景，卻筆風一轉，轉出詩人直接抒發在疾病之中的困悶，雖然可以詩歌申訴靈魂中的情狀，但生活本身的平淡普通實在沒有甚麼值得抒寫。而詩人在〈其一〉的生活狀況之中歸結到的，是尾聯「所愧蓬蒿巷，還憑破蘚痕」的所願所想，詩人所「愧」、所無法面對的，始終是不為世所用，以及現實中的清貧境況，而「還憑破蘚痕」彷彿仍留有入世致用的希翼。

其五

新詩殊兀冪，百變任雕鐫。蝴蝶為莊叟，箏琶雜阮咸。酒盤頭判沒，石闕口休銜。物色兼生態，芭蕉漸啟函。

首聯開宗明義，總領全詩要旨：這是一首談文學理念的作品。兀冪既有高傲和不屈不從俗兩種意思，雕鐫即雕鑿之意。本詩與前四首語氣一大轉折，「所愧」之事情暫時撇開，首聯一開首即以一種頗有自信的語氣明示「新詩」的兀冪與千變萬化。次聯即承首聯之「兀冪」、「百變」鋪張開來，以莊周夢蝶及阮咸作樂兩事來具體表示「兀冪」、「百變」兩種意思。

第三聯從首兩聯的虛寫，轉入應為詩人眼下所見之實景。「酒盤」有可能是

因為侯氏三子到訪而對飲，故此跟前有酒盤，所謂「頭判沒」，語例罕見，配合上下文意推敲，整句的意思有可能是泛指酒醉，意思與韓維詩「佔盡人間麗與華，白頭判得醉流霞」接近。下句「石闕」即石碑，但同時「石闕」並非一般石碑，多指記載功勛業績的官家石建築，第三聯不妨理解為：朋友間互相勸酒，並表達了不要再把人間功業之事掛在口邊。

尾聯則是以呼應論詩開首的處理作結，提出作詩能透過「物色」，即對所描畫景物的仔細揣摩，而使物象「生態」——在作品中呈現生氣勃發的姿態，而尾聯下句即以芭蕉開花的情景來具體表達「物色兼生態」在創作上所達到的效果。

尾聯之「芭蕉」，可以是陳維崧眼下實景，也可以是詩人設想出來的比喻。而詩人特別描述「芭蕉」開花，不其然使人聯想到「芭蕉不展丁香結」，後者未嘗不可為前者補充，即透過文學作品的實踐以抒解愁緒鬱結。我們無法落實詩人作詩時的最初原意，但詩無達詁，我們雖不能判定尾聯化用「芭蕉不展丁香結」，但不妨存其名目，作一注腳。

其六

詩律三年廢，長瘡學凍烏。倚聲差喜作，老興未全孤。辛柳門庭別，溫韋格調殊。煩君鐵綽板，一為洗蓁蕪。

〈其六〉首聯以自述的語氣直接憶述三年廢詩，如同凍烏不語之事，並為頷聯、頸聯先開一筆。次聯則承首聯之「廢詩律」開拓而來，述說不作詩而選擇作詞，雖然廢詩生涯有如「凍烏」，但倚聲填聲卻能使興致「未全孤」。



第三聯承接次聯言倚聲填詞之事，反盪開一筆，不寫個人填詞的興趣，而是從次聯之話題轉化出對詞學領域中幾位大家的理解。辛棄疾與柳永固然門庭相異，代表兩種風格完全不同的審美與創作態度，而溫庭筠、韋莊即使門庭相近，同屬婉約一脈，但兩人的格調還是有微細的分別，嚴迪昌曾就此仔細推敲：細按其意，辛之雄健，柳的柔膩，「門庭」之別是在情意的「質」上面；溫的密麗，韋的疏秀，差異則是在抒情的外部特徵的格調上。初看，易認為陳維崧只是從藝術風格的層面上作辨析，其實他持論鑒別的核心是個「情」字。²⁸

然而，不論是雄健、柔膩、還是密麗、疏秀，詩人在尾聯承接第三聯而總結出以收合全詩的，是「煩君鐵綽板」，這聯明示了陳維崧所選擇的是學習蘇軾「大江東去」一路的作詞風格，而且結句「一為洗綦蕪」更是肯定了蘇軾風格的重要詞學價值，並欲以此洗去從前種種蕪雜不純的作法的風格，是對創作者審美和創作觀的宣言性確立。

其七

水榭論心切，秋城話舊宜。儻過燒澗笋，兼為剪園葵。老悔求名早，貧增見事遲。傷心吾共汝，流恨竟同時。

首聯正點節令、時地，由〈其六〉對文學理念、詞學風格的確立，回歸到詩人當下與侯氏三子於水榭論心的時空。陳維崧與侯汾二人論交早於順治十三年丙申(1656)，當時陳維崧三十二歲。頷聯、頸聯即承接首聯的時空而展開。次聯承首聯的宏觀遠景，進一步進入描寫「水榭」、「秋城」中的景物，詩人透過「燒澗笋」、「剪園葵」兩種農家雜務，象徵回憶，以及整理前塵舊事，同時回應首聯。「燒」與「剪」二字更頗有拋擲、棄去之意味。

²⁸ 《清詞史》，頁208。

頸聯由頷聯的寫景，轉而直接抒情，前一聯言燒笋、剪葵，頸聯更直接明言所燒所剪的是「老悔求名早，遲增見事遲」，整聯的意思是求名太早使人悔恨，貧困使到詩人遲疑了識別事勢的時機。種種前塵往事，詩人於尾聯以「傷心吾共汝，流恨竟同事」收結，舊事雖所悔，但事過境遷，無法挽回，詩人只能以感慨侯氏一族與自己遭遇相同的悲慘命運作結。

其十一

驥子真天馬，奇毛掩鸛鷖。揮毫偏渾脫，琢句必精良。薄俗輕彈鋏，吾徒老削漿。好攜雛鳳嘯，織月壓歸航。

首聯「驥子真天馬，奇毛掩鸛鷖」，開宗明義稱讚侯氏三人中的年輕後輩侯天存及侯大年。次聯承首聯的讚美，鋪寫侯天存、大年這兩位年輕一輩的詩才。

頸聯筆風一轉，由年輕後輩的詩才，轉入對自身不為世所用的悲哀，這聯所謂「彈鋏」用馮諼事，指寄食他人門下之意，雖自己像馮諼般有才能，但始終沒有功名，出身地位上有所缺憾，遭世間勢利小人嘲諷，也即是詩中所言的「薄俗」，更甚者是馮諼最後也能得其用處，但詩人只能削漿度日。詩中所言的「薄俗」，並非偶然，陳維崧的詩詞作品中，數次提及這種「薄俗」，例如在庚戌(1670)年，陳維崧〈汝南咏古·其二〉首聯即以「末流尚崖異，薄俗善抵牾。」²⁹開首，總領全詩要旨，即關於末流、薄俗、出身的思考感慨，次聯「寥寥千載間，我思黃叔度。」承首聯而直接點出東漢黃憲，這一出身卑下，父為牛醫，而最後憑才學始終受人敬重的人物；又〈水調歌頭·立秋前一日述懷柬許豈凡〉上片「將相寧有種，豎子半成名。虬蟬切莫撼樹，聽我短歌行。薄俗人奴笞罵，末路婦人醇酒，

²⁹ 《陳維崧集》，頁738。

一笑萬緣輕。夫子知我者，試與說生平。」³⁰。陳維崧詞中吐露的「薄俗」與「末路」，是陳維崧自身的反映，故此有「夫子知我者，試與說生平」之語。這些詩句、詞句都反映了陳維崧面對的是世俗澆薄，世俗之徒沒有眼光，又看不起陳氏以文士身份寄食他人門下，而陳氏又往往接近酒色，與倫理相悖，惹來閒言閒語。

尾聯按文意推斷，應該是送行之詩句，詩人暫時撇過頸聯自身的不幸，回到本詩主要讚美的對象——侯天存、侯大年，並以「雛鳳鳴」比二人，而侯汧將與他倆後輩離去，故此詩人在詩中寄語三人，並以「纖月壓歸航」這寫景作結。

就以上分析，陳維崧在這組富有回顧意味的組詩中，有不少詩句、意象，一方面圍繞的是「蓬蒿」、「求名」、「見事」、「薄俗」——這些指向了名與實的焦慮、謀求入仕、經世致用，但卻未能如願，甚至反遭譏嘲的處境；另一方面，對新創作理念和倚聲填詞的肯定，使到陳維崧獲得了喜悅。這組詩與戊申(1668)至壬子(1672)年間陳維崧的心境和想法都頗為吻合。

第四節——「棄詩弗作」原因的重新理解

嚴迪昌在《清詞史》以「長瘖學凍鳥」，和「正當其詩『益蒼辣奔放』之時，毅然棄去」兩點，判斷陳維崧「棄詩弗作」是由於政治上的避禍。雖然嚴氏未有明言陳氏牽涉在甚麼政治事件之中，但嚴氏的推論並非無的放矢。

清初文人因政治原因而受逼害的情況，屢見不鮮。情況有幾種，在易代戰爭之中，不少文人也有參與戰事，陳子龍、夏允彝(1596年-1645年)、夏完淳(1631年-1647年)即為當中例子，又例如抗清將領的子孫後人，遭逼害而投寺為僧，或

³⁰ 《陳維崧集》，頁1245。

者四處過着逃亡的生活，過訪陳維崧的侯柎園正吻合這種情況，侯柎曾守嘉定而終亡，侯柎園攜其遺子逃命，本來投水代死，幸而獲救，最終入寺為僧十多年，回家後已經家業凋亡。再者，即使戰爭過後，清廷也有海通案、奏銷案以及種種文字獄等高壓管治，限制文人言論，及削弱其文化家族的實力。凡此種種，已有大量著述，茲不贅述。

在此想特別提出的是，有時因政治原因而來的逼害，施行者不一定是清政府，有不少情況是庶民或族中鄉里之間的逼害。前文曾引述陳維崧的〈李延公詩序〉序文，當中就記述「李生既以名家子，一旦門戶僨裂，姓名為當世所諱，不肯錄之齒牙間。」的情況，那些前朝「名家子」，在易代以後即使不曾因文網下獄，但要處世，也是不容易，以上李生的遭遇，便是一例，而陳維崧本人在其父去後，也曾遭受鄉里惡徒的逼害，陳維崧弟宗石在《迦陵詞全集跋》中就提到「至丙申，先大人棄世，家益落，且有視予兄弟為釜中魚、几上肉者，各散而之四方。」而陳維崧之所以回歸田園生活，早於戊申(1668)年間，在其詩中已有明示，〈再搬寓示一二友人〉：

離城二十里，地勢莽奔赴。其名曰毫村，我昔此間住……一朝風俗異，白日遍霾霧。子弟喜剽掠，臧獲半嘯聚。其人游閑極，白手無所作。呼盧飲食聲，嚙嚙若風雨。又有族長者，託名急租賦。毀拆遍房舍，爪牙仗屠酤……昨秋假編築，頗亦協野趣……無何主人至，客屐不遑駐。躑躅向陌頭，屏當到家具。倉皇揖駟僮，曲折詢翁嫗……知己來咎予，此錯鐵難鑄。舍旁多老兵，連雞使人怖……邇時屋價賤，錙銖詎難措。矧子盛交游，緩急或可訴。何來牛馬皂，乃作鸞鳳笈……作詩示故人，幸為鑒情愫。我今詎移居，艱難再搬寓。³¹

³¹ 《陳維崧集》，頁 668-669。

陳維崧之所以搬寓歸鄉，是因為他歷年以來寄食他方卻老大無成，同時更遭鄉里惡徒逼迫，以至一搬再搬，歸於躬耕。

諸例旨在指出，雖然陳維崧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的博學鴻辭科才有功名，此前一直未有功名，而且屢試不第，實際功績上一無所有，曾入史逸裘幕，也只「陪人遠宦」，未見有所作為，他實在不同於李雯(1608年-1647年)、吳偉業、龔鼎孳等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來干涉時局，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這群遺民之後所遭遇的特殊情況，而歸根究底導致這些特殊情況的原因，也是屬於政治性的。以上為補充嚴迪昌說法之發揮。

至於本文所提出，左右陳維崧「棄詩弗作」的，是兩種力量，一種是詞體的拉力，一種是詩體的推力。詞體的拉力，即詞體的吸引力，把陳維崧拉向倚聲填詞的一方，如果我們配合陳氏於康熙十年(1671)前後，為《今詞苑》所撰的〈詞選序〉中觀察，當中所言：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³²這足以證明詞體具備一定的吸引力，使到陳維崧將其文學地位提升至與經、史、詩同等(第四章將再詳述)。

關於陳維崧如何推尊詞體，歷來講得很多，但凡論陳維崧以及陽羨詞派文學觀念的，都有提及。但論述詩體的推力，即作詩，以及作詩這行為所包含的文化意義對陳維崧選擇作詞的影響，則少見指出。陳維崧最大的文學成就，在於其詞，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我們能夠提出其他方面的切入角度，以達至更立體地理解陳維崧「棄詩弗作」的詞學背景及詩學意義的話，那麼這將會對陳維崧的專家研究，和清代詩詞的研究，都會起積極作用。

³² 《陳維崧集》，頁54-55。

第五節——結語

根據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棄詩弗作」指出陳維崧對文學體裁的選擇，並非率性隨意，而是他經歷「棄詩弗作」後，對於詩、詞的分野，有較明晰的傾向，這證成了本研究的前提，即他倚聲填詞是建基於一定的自覺。除倚聲填詞自身的吸引力外，另一種成就陳維崧靠攏詞體，專力填詞的要素，就是因着士途侘傺，使他對詩歌的所象徵的明志述懷功能極感失望，由此所轉化產生出的離心力，把陳維崧推向填詞一路。

第二，雖無法證明與那一特定政治事件有關係，但如果我們相信和理解清初時，文人所面對種種來自官方，同時來自民間的壓力，那麼嚴迪昌言「棄詩弗作」是政治上的避禍，是有可能發生的。

第三，除了社會文化歷史等外緣性的把握，作家如何陳述與看待自我，是陳維崧研究，以至其他專家研究也可以考慮的方向。當某位文學家進入論述之後，其形象或許與其原初自述的形象有所出入，這是經過批評家和讀者篩選過後的接受史形象，這也是十分重要，而如果我們能夠同時考察作家本人的心曲，發現作家如何理解自己，為自己定位，如何陳述和描畫自己等問題，那麼我們將能一邊補上其更完整的理解，同時更好地解釋自我定位與接受史之間的張力。這將於下一章有更詳細深入討論。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only.
Not for publica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第三章

「僕本恨人」——陳維崧詩詞中「恨」的意涵及其主體性

文學創作除了介入客觀世界，陳述和描畫種種客觀環境和事物外，與此同時，在書寫的過程中，創作主體透過選擇不同的書寫方式，其實，也是一種自我詮釋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能從而建立出主體性，使作品不單是純然反映、紀錄客觀事物，也不是一律主觀獨斷的呼號，而是在循環往復的、「閱讀—詮釋—書寫」的對話中，得到了自己的定位。

但在進行以上分析時，我們總會面對詮釋的困難：究竟如何準確地在上百成千的詩詞創作和書信序跋之中，讀出作者之心，並以精到而概括力強的概念和關鍵字去詮釋創作者的自我詮釋？大量閱讀，繼而歸納作品中反復大量歌咏的主題、意象，似乎是不不少人採取的分析策略，也是一種操作性高的方法。很多時，創作主體書寫最多，出現最繁的主題、意象，往往就是其創作的核心所在。但是，我們在文學史的長河中也不難發現，大量書寫某種主題、意象，可能是出於時代的潮流和風尚，這體現了從宏觀角度下出發，創作主體歸入於大時代繁音的一隅。但是，哪怕是數量上書寫最多、出現最繁的主題和意象，是否就完全等同作品群的核心？是否就能代表創作者所有的藝術形象和精神面貌？是否可以從中讀出其自我詮釋？又最能體現創作者的主體性？

當然，兩者也並非完全排斥，非此即彼。文學研究是人的研究，關涉書寫者的性情面目，情況往往十分複雜，呈現不同面向，有仔細進入特定語境脈絡的必要。一方面要注視創作者回應書寫傳統的方式，另一方面則要理解創作者的心路歷程。有時候在數量上未必呈壓倒性優勢的主題、意象，卻反而是在質量上，提供理解作者書寫活動的關鍵線索，或幽或明地指引我們創作者的核心所在，體現



了創作主體如何在書寫傳統中演繹其獨一無二的主體性。

就此而言，陳維崧身為明末四公子後人而身處明清易代的歷史舞台，各種客觀環境設定或許本身就使其增添了傳奇的史詩色彩，而陳維崧之同代人或後輩，如朱彝尊(1629年-1706年)或蔣景祈(1646年-1695年)等在詩詞、序跋所描述的陳維崧，往往是飛揚於詞壇，縱橫於史變，領導整整一代陽羨作家的一派宗主。然而只要進入陳維崧的心路歷程，細讀其詩詞，就會發現其作品其心態的曲折與多種面向。一方面陳維崧的確遊歷大江南北，結交天下人物，但同時這種遊歷本身卻又是出於家族的不幸，以一種類同流浪的方式完成，陳維崧的詩詞固然出入於歷史故實，氣象萬千，歌行體及其詞作尤其展現出一方文宗的氣度，但其人物性格與性情所向又多是對舊事耿耿於懷，往往難於振作，作品中充份展現了其複雜性。

本文選擇了「恨」，以及「僕本恨人」作為理解陳維崧這種複雜性的脈絡，正是因為當中關係到維崧對書寫傳統的回應和自我詮釋，這種自我詮釋是理解他倚聲填詞的創作動機的重點。在其詞作中，「恨」字出現一百二十多次，佔其詞作總數的一定比例，而在其詩、文、四六中也頗有出現。但正如上文所言，數量並非文學研究中，呈現創作主體心靈面貌的唯一路徑，「恨」與「僕本恨人」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詮釋角度，是因為當中陳維崧對於「僕本恨人」這書寫傳統呈現了某種特殊的關注，這種「恨」大都並不是單純作為背景式烘托之書寫，而是體現了陳維崧在作品中的自我詮釋和主體性。「恨」是一種人類的普遍情緒，而在易代國變之際，更可以說是人人有恨，本章的重點旨在討論陳維崧如何在「恨」的語境中穿插，透過對其他文本中「恨」的回應與參與，建構作品中既能回應時代情緒，又能獨樹一幟、辨識性甚強的主體性。

第一節——陳維崧作品中三種「恨」的意涵

在陳維崧詩詞作品中，如果就其所恨之事而言，有兩類主題的作品頗常出現，回應了明清易代的時代情緒。第一類，是追憶明亡恨事。陳維崧本是出身名宦世家，如果不是遭逢國破家亡的衰世，就算不是平步青雲，前途一片光明，也起碼不用落泊天涯，寄食他鄉。對於明亡的責任，陳維崧在易代的政治光譜之中，有其定位和立場，他基本上恨李自成(1606年-1645年)多於清人。〈念奴嬌·開元寺納涼聽客話闖賊破城舊事〉云：

夜凉水寺，有白頭閑話，傍蝸牛屋。說起黃巾初入洛，正值中原百六。萬馬俱瘡，孤城欲沒，殺氣騰原陸。鬼謀人社，啾啾市上歌哭。語久嗚咽難勝，向戎樓借取，四條絃續。不見女牆純鐵色，恨血至今猶綠。落日黃河，老鴉白項，啄盡賢豪肉。休論往事，碧天今夜新沐。¹

小題已經直呼李自成為「賊」，而李自成在詞中的比喻對象是「黃巾」，以之為「鬼謀人社」，評騭顯然易見。詞中下片「語久嗚咽難勝」說的雖是開元寺白頭翁，但也融匯了詞人自身的感情，借話舊人之口澆心中塊壘，而詞句「落日黃河，老鴉白項，啄盡賢豪肉。」透過老鴉起興，遙想、示現賢豪肉盡的畫面，更是隱然包含了陳維崧的切膚之恨。而在〈賀新郎·余與于皇作自嘲詞竟于皇復謂余曰忽憶一事大資嗚噓昔甲申闖賊之變迎降者之大司馬某亦與焉其人後官兩浙日開讌西湖召梨園侑酒即命演闖賊破都城故事數齣後闖賊入城一人執手皮蒲伏道旁自唱臣兵部尚書某迎接聖駕蓋某即坐上某也某悵然不懌良久曰嘻亦太甚矣某何至是遂罷酒去余與于皇撫掌之次同賦是詞仍用原韻〉²中，詞句固然有「嶺

¹ 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頁1351。

² 《陳維崧集》，頁1544。

對離宮繡。聽鼙鼓、漁陽遺恨，乾坤罕有。」這種書寫時不利兮的「遺恨」，但更值得留意的是一段頗長的序，序的諷刺對象當然是「記得黃巾初入洛，朝士馬都如狗。還自許、師臣賓友。」等背棄明室出迎的貳臣，但所諷所恨之人，又何嘗不包括李自成？當日高呼聖駕之貳臣，最後也背棄了闖賊，而闖賊當日破城，他日城又被破，這言外之音都在詞中一一讀到。

當然陳維崧亦有詞如〈賀新郎·縉夫詞〉、〈南鄉子·江南雜詠〉、〈賀新郎·五人之墓〉等斥責清人「真王拜印」式統治底下，民不聊生，賣屋賃縉的苦況，以此追悼前朝歲月。但總括而言，陳維崧沒有在詞中直接地質問清人政權的合理性，他只是旁敲側擊，透過對具體民生議題的關注、不滿里正團練的逼迫，來抒發其關心民瘼的社會性面向，而非直接否定清人治權的政治性面向，因此，就恨的對象而言，陳維崧是恨李自成尤烈於清人的。而陳維崧在清朝統治下屢應科舉，謀求入仕為官之途，也可作為旁證。

第二種恨的主題，是一種對時間瞬間流逝、人力在其中完全不起作用的恨意，這是深沉而歷史的恨意，在意思上有遺憾的意味。在〈賀新郎·伯成先生席上贈韓脩齡〉³中，詞人嘗試以書寫去訴說那「說不盡、殘唐西楚。話到英雄兒女恨，綠牙屏、驚醒紅鸚鵡。」、「家本在、扶風整屋，五陵佳處。漢闕唐陵回首望，渭水無情東去。」陳維崧以詞作為一種書寫心跡的方式，但詞中所表現的卻又是千般訴不盡的欲說還休；又如〈金明池·詠雁來紅〉「恨漢苑無花，唐陵少樹，只染晴莎烟色。」⁴〈滿庭芳·過虎牢〉：「今古興亡轉換，誰相問、剩水殘山。憑高望、漢陵魏殿，一樣土花斑。」⁵詞人經歷易代國變，人事都非，往往產生瞬間千年的感慨，莫論秦漢，還是魏唐，甚至明亡清興，在這種遺恨、面對

³ 《陳維崧集》，頁 1540-1541。

⁴ 《陳維崧集》，頁 1591。

⁵ 《陳維崧集》，頁 1239-1240。

時間的無力感底下，一切其實都沒有分別，因為諸政權、代表性的建築物，最後都是面對同一命運，灰飛煙滅，沒有甚麼可以留下來，哪怕是答客問，還是詞人的內心疑問，也沒有可能有答案，因為以渺小人力根本無法面對未來，但矛盾的是，命運又彷彿早已注定，除了歸於寂滅一途，就別無其他出路。

以上兩種「恨」的意涵，一種是實在而政治性強，對某人某事的怨恨、憎恨；另一種則是傾向人生感悟，面對蒼茫宇宙、人力渺渺的無奈與遺憾。這兩種「恨」的意涵在陳維崧詩詞中是頗常出現的主題，而且古典文學的讀者都不會陌生，因為這是明清之際，甚至但凡易代世變，古代文人、知識份子也共享着、傳承着的感情，是一種面對時空轉變的文學反應。這體現了陳維崧作為傳統文人，服膺與從屬於創作傳統主流的表現。

但究其實，以上兩種都未能表現維崧作品中最能體現其自我詮釋與主體性的書寫。主體性之於文學創作，不同於一般主題的歸納，一般主題的歸納，關注創作者的寫作生涯中曾經關注和觸及哪些題材。不過，我們都知道，即使是處理相同主題的手法也可以千差萬別，如果不期望總體化將創作主體簡單分類，同時不期望把創作者看待成某類主題的寫作機器的話，那麼，倒頭來還是要仔細進入創作者的主體生命，將創作者理解成書寫的主體，探聽他透過書寫來呈現對特定時空的觀看方法與參與態度。

最能體現陳維崧自我詮釋創作表現的，是他在詞的創作中，數次挪借了「僕本恨人」這種自我指稱意識十分明確的書寫傳統的資源。包括〈念奴嬌·次夜韓樓燈火甚盛仍聽諸君弦管復填一闋〉有「僕本恨人，公皆健卒，不醉卿何苦？」⁶；〈念奴嬌·曹顧庵王西樵鄧孝威沈方鄴汪舟次季希韓李雲田兄散木怕有送予歸陽

⁶ 《陳維崧集》，頁 1322。

羨詞作此留別〉有「僕本恨人臣已老，怕聽將歸絲竹。」，⁷和〈沁園春·贈別芝麓先生即用其題烏絲詞韻〉：「況僕本恨人，能無刺骨；公眞長者，未免霑裳。」⁸

明確地以「我是——」這種主體指稱十分明晰的陳述來詮釋自我的形象，在中國古典詩詞中，這種方式並非最常態的藝術表現方式。在中國古典詩詞中，作家即便不言「我」、「你」等人稱名詞，「我」、「你」所感所思往往透過比興、情景交融等手法，投射到意象、意境之中，有心人讀來，便知「我」、「你」在境、象、比興之中，不必明言而溫柔敦厚，有言外滋味。以上三條「僕本恨人」，不單道出了「我」之所感，而且是直接詮釋、定義了「我是怎樣的人」，維崧怎樣在詞作中為自己下定義、怎樣詮釋自我的形象，歷來較少論者提及，卻提示了陳維崧詞作及其主體性的重要線索。

如果單純視之為無意識的「用典」，或者一種純粹修辭性技巧操作，就可能忽略了「僕本恨人」本身所負載的書寫傳統及其意義。此處維崧筆底下的「僕本恨人」以及其相關恨意書寫系統的作品，應視之為一種「典律」更為適合。「典律或稱必讀經典不是因為值得保留的考古功用而具有重要性，而是在個別時空條件失去之後，仍能持續引發同情共感而顯得珍貴。」⁹，這固然道出了由創作主體回應書寫傳統的角度來解釋「典律」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回應的過程中，創作主體如何反應、如何轉化再詮釋，就關繫了創作者的身世際遭、性情面目。陳維崧把「僕本恨人」轉化成融通了書寫傳統與自我性情的橋樑。一方面，「恨」意書寫使他把自己歸入於書寫傳統與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透過言「恨」、自命「恨人」，他為自己性格上的懦弱與缺失，提供一種可憐可愛、同情的諒解，使到種種不自振作的言行，在文學書寫的過程中，有了被認許和接受的可能性，

⁷ 《陳維崧集》，頁 1330-1331。

⁸ 《陳維崧集》，頁 1495。

⁹ 鄭毓瑜著：《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台灣：麥田出版，2014 年 12 月)，頁 175。

能夠與文人傳統接軌。

第二節——「僕本恨人」的書寫傳統與詮釋面向

「僕本恨人」出於江淹(444年-505年)〈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¹⁰江淹憑弔荒原，追想自古以來之蕭條恨事，眼前幅幅觸目驚心之景，引發下文王侯將相、佳人才子之恨事。江淹在滿目恨景底下化身「恨」的代言人，為歷代伏恨而死者立言。〈恨賦〉後來成為千古名篇，表面看來，如果就其自我詮釋、自我形象的建構而言，〈恨賦〉中的「僕本恨人」只是有「我」之名而無「我」之實，以一代言者身份替人立言，並沒有太多關於自我形象的描述。但是，如果我們把〈恨賦〉放置在古典文學的書寫脈絡中閱讀，就會理解在代言體的書寫中，所擬代、所代為立言者，如〈恨賦〉中之「李君降北」、「明紀去時」，乃至孤臣孽子，每每實有着與創作主體一樣的同情共感。書寫活動既是代歷代恨者立言，同時也是為己立言。江淹「僕本恨人」的自我詮釋，就是把自己共置於一眾恨者之中，透過書寫，與筆下的恨者產生共鳴，引為隔代知音，使到自己面對相類的失時不遇、人生價值被動搖時，得以有一可溯源於書寫傳統的定位。

同時就實際的運用情況而言，江淹之「僕本恨人」在後來成了感慨良多、人生不得意和多愁善感的代名詞，清代不少文本都把這種意義底下的「僕本恨人」借用，例如吳綺(1619年-1694年)詞〈水調歌頭·聽丁翁彈南曲舊事〉有「重見白頭遺老，細數新亭舊事，此際黯消魂。僕本恨人耳，掩淚對青樽。」；¹¹謝章铤(1820年-1903年)評〈金縷曲(西湖懷古)〉一闕時言其「是則故壘西邊，竹西佳

¹⁰ 江淹著；胡之驥註；李長路、趙威點校：《江文通集彙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頁7。

¹¹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734-1735。



處，僕本恨人，其傷心當不讓東坡、白石也。」；¹²甚至醫學類著作《四聖心源·卷十·婦人解》之題解亦有「婦人之證，率與男子無殊。惟其經脈胎產三十六病，則與丈夫不同……乃使春華易萎，秋實難成。胎傷卵破，女德無終。玉折蘭摧，婦怨何極！僕本恨人，痛心在目，作婦人解。」語。¹³就以上情況而言，江淹「僕本恨人」的自我詮釋，在後代的引用挪借中，也積澱成一種書寫經驗，指向了書寫者或失時不遇、或感慨苦多時，其中一種常見態度：尋找相同的抒情聲音，把自己融入其中，以精神上的隔代知音來緩解現實當下的困頓。

除了以同質聲音作為自我詮釋的其中一種面向外，王士禎(1634年-1711年)則演繹了另一種可能性。在陳維崧寫下「僕本恨人」的十一年前，發生了一件清代文學大事，少年王士禎在大明湖畔寫下四首秋柳詩，舉秋柳社，一時和者甚眾，蔚為風潮，及後兩年，更有《秋柳詩話》圖卷的製成。圖卷除四首秋柳詩，還有詩序，諸家和作以及點評。其中詩序云：

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僕本恨人，性多感慨，情寄楊柳，同《小雅》之僕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遠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為我和之。丁酉秋日北渚亭書。¹⁴

序中王士禎也動用了〈恨賦〉的資源，但王士禎筆下所抒之情並非伏恨而死，他將江淹〈恨賦〉的「僕本恨人」帶到當下語境並作出轉化。江淹所代表的是一種極致的，必關生死的恨意書寫，在王士禎的演化之下，「僕本恨人」就淳厚得多。雖然小序以「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這組帶有易代情調的語句開首，但隨後承接「僕本恨人，性多感慨」的，卻是「情

¹²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六》，見「小西湖詞」條。引錄自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406。

¹³ 黃元御撰：《四聖心源·卷十·婦人解》，引錄自《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零二五·子部·醫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562。

¹⁴ 王士禎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188。

寄楊柳，同小雅之僕夫」，面對易代荒茫所興發的情緒，王士禎沒有呼天搶地，動輒言及生關死劫，他選擇的是透過感落葉、折長條、詠柳詩來寄託情感。而「小雅之僕夫」也提示了一筆重要線索，當時王士禎將任揚州推官，也就的確類同「僕夫」，雖然官位不高，但已經成為朝廷命官，所以在選擇上，王士禎將自己納入小雅的雅正系統，而非風騷的怨刺系統，再加上王士禎的詩學主張講求「神韻」，神韻在詩歌風格的具體呈現就是「清遠」、「清真雅正」，追求詩風沖淡而有神生動，並有言外之音，遠離雄放高亢的抒情聲音，傾向含蓄淳正一脈。

因此，王士禎之「僕本恨人」不同於江淹，也不同於其他同質意義底下的「僕本恨人」。秋柳詩四首、秋柳社及其唱和，以至《秋柳詩話》圖卷及為此增益的詩序，包含了王士禎建構自我形象的一系列過程。雖然秋柳詩之海內盛傳並非王士禎自己所能控制預料，但他透過各種唱和、結社、補序、製圖等文化交際的方式，積極建立自己在文化、政治、文學領域的形象。他對易代之悲感受苦多，但卻同時成為新政權的官員，秋柳意象符合山移谷變的時代情緒，但同時沒有觸動新政權的神經，可以說是在政治正確與文化身份之間取得微妙平衡，而王士禎以詩歌及其唱和活動作為這些意義的載體，又符合了他在文學理論上清遠平淡講究神韻的主張。結果，「僕本恨人」在王士禎的演繹下，充份體現王士禎在當下語境的自我形象和創造，但他的重點卻不在於傳統意義上的「恨」，他把「恨」轉化和收納在雅正底下，他既是恨的當代代言人，也同時是雅正淳厚的代言人。如果我們說江淹是體現了傳統文士在自我定位、自我詮釋上，採取以「同質」來尋找出路，那麼，王士禎便是透過標舉「相異」來另闢蹊徑。王士禎透過對「江南王子」、「金城司馬」、「僕本恨人」、「小雅僕夫」的重新詮釋與組合，樹立獨一無二的個人形象，以對傳統經典文獻的再詮釋，為自己開出種種新的可能性，展示了傳統文士面對世變的另一種處理。

一六六八年，陳維崧四十四歲，在京。這時他已三應鄉試失敗，但王士禎、龔鼎孳(1615年-1673年)等仍愛惜有加，陳維崧有詞〈沁園春·贈別芝麓先生即用其題烏絲詞韻〉三首：¹⁵

四十諸生，落拓長安，公乎念之。正戟門開日，呼余驚坐；燭花滅處，目我于思。古說感恩，不如知己，卮酒爲公安足辭。吾醉矣，纔一聲河滿，淚滴珠微。昨來夜雨霏霏，歎如此狂飈世所稀。恰山崩石裂，其窮已甚；獅騰象踏，此景尤奇。我賦將歸，公言小住，歸路銀濤百丈飛。艷觥煖，趁銅街似水，賡和無題。

雖則毋歸，對酒當歌，終難激揚。似孔家文舉，幼原了了；衛家叔寶，晚更茫茫。五劇金鞭，六街寶馬，誰數吾家老子昂。公眞誤，歎臣今已老，髮短心長。御溝偶過毬場，笑塗轍都爲若輩妨。更內家髻樣，巧如馬墜；小侯舞勢，快作鸞翔。酒則數行，食而三歎，斷盡西風烈士腸。登城望，有千群筆策，萬點牛羊。

歸去來兮，竟別公歸，輕帆早張。看秋方欲雨，詩爭人瘦；天其未老，身與名藏。禪榻吹簫，妓堂說劍，也算男兒意氣場。眞愁絕，卻心憂似月，鬢禿成霜。新詞填罷蒼涼，更暫緩臨歧入醉鄉。況僕本恨人，能無刺骨；公眞長者，未免霑裳。此去荆溪，舊名罨畫。擬繞蕭齋種白楊。從今後，莫逢人許我，宋艷班香。

詞作的重點固然是陳維崧「僕本恨人」的自我詮釋，這將於下文詳論。在此舉出此詞，是留意到作品數次出現「公」的稱謂，包括「公乎念之」、「卮酒爲公

¹⁵ 《陳維崧集》，頁1494-1495。

安足辭」、「公眞誤」、「竟別公歸」、「公眞長者」。就小題提供的訊息，這位「公」似乎就是龔鼎孳一人，詞作僅僅是龔陳二人間的贈答往還。但如果我們宏觀地考察陳維崧在該時段的交遊實況，就會明白到這組詞的閱讀和交流對象也應當包含王士禎。

早於一六六六年，王士禎兄弟為陳維崧點校《烏絲詞》，士禎尤其盛讚陳詞；¹⁶一六六八，陳五月抵京，從龔鼎孳遊，¹⁷在這年的大小宴遊中，龔、王二人因其人脈關係，往往為陳維崧打點安排各種招飲唱酬，他們二人對陳維崧愛惜有加，分別點校、題贈《烏絲詞》，而龔鼎孳的題詞〈沁園春·讀烏絲集次曹顧庵王西樵阮亭韻〉更明顯地把王士禎兄弟納入交流對象。龔、王當時同在京師活動，也的確是官職上的「長者」輩，因此，有理由推斷詞中的「公」也包含了王士禎在內。王士禎在《秋柳詩話》圖卷中有意識地動用和轉化「僕本恨人」，而往後陳維崧在若干首詞作中也展現對「恨人」的關注以及運用，當中就透露出一定的對話意味。

陳維崧以「僕本恨人」自居，但他又不同於王士禎的演繹。王士禎的自我宣示手段，主要是透過秋柳詩、秋柳社、唱和與秋柳圖等文化交際手段，以及詩歌中的比興寄託，詳細地描繪出王士禎的文化形象，建立自己鮮明而平衡於文化與政權兩端的「淳化恨人」形象。陳維崧自稱「恨人」，其筆下「四十諸生，落拓長安」、「雖則毋歸，對酒當歌，終難激揚。似孔家文舉，幼原了了；衛家叔寶，晚更茫茫。」的落拓公子形象，固然鮮明，但更重要的，也與王士禎不同的是，陳維崧透過將個人形象嫁接到與王士禎、龔鼎孳等「長者」、「健卒」的對話中，建構出其獨特的主體經驗。

¹⁶ 見王士禎著：《池北偶談·卷十一》，「龔陳詩」條。引自王士禎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3096。

¹⁷ 周絢隆：《陳維崧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324。

第三節——僕本恨人、公皆健卒——對話中的自我詮釋

透過江淹與王士禎兩種「僕本恨人」的詮釋與演繹，我們了解到「僕本恨人」成為一種傳統文士所共識的文化符號，透過種種的動用資取，自謂「僕本恨人」，將之內化，現實生活中是否有恨已經並非首要考慮要素，把自己與精神上的「恨人」、「賢士不遇」情志接軌，這才是屢屢言恨、自謂恨人的關節處。這種精神上的「恨人」、「賢士不遇」情懷，是古代知識份子透過書寫來錘煉意志的方法，同時也是人格之可以確立，抱負之所以堅持的立足點與定位方式。這是精神層面的而非實際層面的，在自稱恨人，回歸到士不遇的傳統中，傳統文士得到了心靈安居之所。透過「僕本恨人」的書寫傳統，回應歷代文人都必須面對的自我詮釋與定位問題。

「恨」的書寫傳統所帶出的是知識份子安身立命、自我詮釋的根據，陳維崧身為傳統文士的一員，也一樣面對定位與立足點的問題。遭逢鼎革，究竟是義不食周粟，抑或識時務者為俊傑，往往是易代的兩難，本身也就是一個身份的轉移問題。對一個傳統知識份子而言，身份定位的立足點，在精神層面固然很大部份來自或儒或道的思想體系，而在現實層面，要麼就是在家族倫理關係中得以確立，要麼就是個人事功上有所建樹。國變後，維崧父陳貞慧(1604年-1656年)「裹足窮鄉，誓墓不出，家日以促。」¹⁸諸子亦隨之棄諸生籍，父亡後家道中落的情況更形嚴重，「且有視予兄弟以為釜中魚、几上肉者」，¹⁹因而不得不兄弟各散東西謀生。以家散人亡來形容陳維崧的處境，也並不為過。

於此而言，兩種傳統知識份子賴以定位的途徑，陳維崧都失去了。隨後寄食並讀書於冒襄(1611年-1694年)水繪園的日子，雖然冒襄家人視維崧如子姪親人，

¹⁸ 陳宗石撰：〈迦陵詞全集跋〉，引自《陳維崧集》，頁1830。

¹⁹ 同上注。

陳在文友間又頗有文名，但隨着順治十七年(1660)及康熙二年(1662)兩次應試落第，陳維崧始終決意要離開水繪園，北上闖蕩，一六六三年〈將發如皋留別冒巢民先生〉言「我聞長安街，連雲矗扶荔，金張許史家，敝裾尚堪曳。逝將舍此游，願言一謁帝。」，²⁰但王士禎極力勸阻，終未成行，乃或復歸如皋，或倡和宴遊於江南。及後曾短暫入幕工作，但未見業績，欲歸返陽羨重建家園，卻又好事多磨，一波幾折。直到他晚年盡絕塵望時，卻諷刺地被逼迫上京應博學鴻辭科。終其一生七次應試全告落第，唯於死前數年有博鴻科功名。總的而言，如果就實際層面而論，倫理關係與人力事功也始終未能為陳維崧帶來可立足、可為自己身份作出定位的空間。

面對自我定位的焦慮，似乎陳維崧唯一可以憑藉依靠的手段，就只有透過其文學書寫來自我詮釋。這種對於身份的自我詮釋，既是一個知識份子說服自己，使生命與使命得以確立的根據，也是在茫茫世道，回應他人審視目光與種種對話的方法。

相同的典故、同源的書寫傳統，但經過不同的詮釋與再演繹，就會轉化出不同的效果，反映創作主體不同的抉擇取捨。陳維崧筆底的「僕本恨人」，也是如此，而他除了回應寫作傳統，更重要的是透過與其他文本的對話而得以確立。陳維崧〈沁園春·贈別芝麓先生即用其題烏絲詞韻〉²¹的對讀文本是龔鼎孳的〈沁園春·讀烏絲集次曹顧庵王西樵阮亭韻〉。²²兩組作品不論立意、內容也圍繞着陳維崧的《烏絲詞》。《烏絲詞》成書於一六六六年維崧第三次落榜後，孫默(1613年-1678年)《十五家詞》有宗元鼎(1620年-1698年)序：

²⁰ 《陳維崧集》，頁 562-564。

²¹ 《陳維崧集》，頁 1494-1495。

²² 龔鼎孳撰：《定山堂詩餘·卷三》。引錄自《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四零三·集部·別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292-293。

丙午之秋，余與陳子其年俱落第，後會黃山孫子無言，意欲以吾兩人詩餘梓以行世者。嗟乎！余與陳子少志觀光，許身稷契，意謂有神之筆。庶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誰知蕭條瓠落，而與鶯嘴啄紅，燕尾點綠，爭長於鉤簾借月，染雲為幌之間，豈吾兩人之志哉？陳子歎曰：是亦何傷！丈夫處不得志，正當如柳郎中使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拍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以陶寫性情，吾將以秦七、黃九作萱草忘憂耳。雖然昔裴休為相，李群玉能詩，薦授校書郎，而陳去非長於歌詞，亦為高宗所眷注。孰謂詩詞一道，何嘗不得知己于天子宰相哉。²³

序文開首已經點明宗、陳二人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主觀願望，與客觀情況「爭長於鉤簾借月，染雲為幌之間」的矛盾。序中引述維崧說話，以為填詞能「陶寫性情」，「作萱草忘憂」，但在這種文藝價值的背後，似乎也包含了「何嘗不得知己于天子宰相哉」的打算。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序中陳維崧自覺《烏絲詞》雖有實際的功利計較，但就其抒情面向而言，所效法的對象卻是柳永、黃庭、秦觀，這三位在主題內容上傳統歸入婉約一脈的宋代詞人，而非蘇辛一脈。這提示了我們維崧在抒情的路向上，也有選擇蘇軾的超邁、辛棄疾的雄放以外，柳、黃、秦三者在感情上的細膩而反復、哀怨而綿長。

由一六六六至一六六八年，時間雖然不長，但維崧透過《烏絲詞》「得知己于天子宰相」的願望並沒實現，相反在這兩年間維崧生計更加潦倒，例如一六六六年京口告貸不果，「家人書又到，家貧歲行除」；²⁴屢次遷居卻分別遭鄉里惡徒騷擾以及遭屋主逼遷。²⁵因此在一六六八年雖然龔、陳之作也是圍繞《烏絲詞》出發，但情態已非《烏絲詞》付梓成書之日時的抱有希望，有了頗大的變化，情

²³ 孫默編：《十五家詞》（《四部備要》本），卷三十二（台灣：中華書局，1965年），頁1-2。

²⁴ 王士禎有詩〈歲暮其年由延令來過寓園因同宿次晨即別賦此送之〉記之，見王士禎撰：《十笏草堂上浮集·卷四》。引錄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七十九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頁189。

²⁵ 周絢隆：《陳維崧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314。

緒更為複雜。龔、陳兩組〈沁園春〉固然是就相同詞牌作贈答往還，也用相同韻，同樣各有三首，在形式、立意上，也有明顯的對話性質。贈答詞本來就具有社會性功能，而龔、陳兩組一題贈一贈別的作品，除了基本社會性功能如酬謝、示好外，更透露了維崧面對身份定位的焦慮，以及透過作品所運作的自我詮釋。在此之前，理解龔鼎孳原作就有其作為前提的必要。〈沁園春·讀烏絲集次曹顧庵王西樵阮亭韻·其一〉：

煙月江東，文采風流，曠代遇之。恰臨春瓊樹，家稱叔寶；黃初金枕，人是陳思。如此才名，坐君床上，我拜低頭竟不辭。

作詞固為題贈陳維崧之詞集《烏絲詞》，因此起拍至第三句，無非褒揚陳維崧才華橫溢，並以衛玠、曹植譽之，同時以「坐君床上，我拜低頭竟不辭。」之姿，把創作主體龔鼎孳引介入作品與陳維崧的對話之中。上片末：

多情甚，倩花間錦筆，描畫崔徽。

則是龔鼎孳閱讀《烏絲集》後，對其內容的評價看法。《烏絲集》多寫軟玉溫香、兒女情長之事，王士禎亦曾讚譽此集「多瓌奇，閨房遊俠之詞尤妙。如『春陰簾外天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秦、李不能過也。」。²⁶下片：

餐露吐玉霏霏。任拍遍欄杆絕調稀。更雨鈴風笛，傷心綺麗；雲鬢霧鬢，過眼權奇。簾閣香濃，市樓酒罷，錯落明珠萬斛飛。須記取，有曲江紅袖，圍繞留題。

²⁶ 《池北偶談·卷十一》，「龔陳詩」條，頁3096。

基本上也是褒揚陳維崧詞作之舉世難得，也點出「傷心綺麗」為其風格，回應了序中陳維崧以柳、黃、秦三人風格來陶寫性情的說法。結拍兩句「簾閣香濃」、「市樓酒罷」、「曲江紅袖，圍繞留題」從字面上看來，固然是點出了陳維崧作品在歌樓酒市之受歡迎，但如果配合宗元鼎為《烏絲集》作序複述「陳子歎曰：是亦何傷！丈夫處不得志，正當如柳郎中使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拍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以陶寫性情」語，便知此處之種種閨情、兒女情長，都除了實指其內容主題，是包含着另一種意義：龔鼎孳作為維崧知己，讀出了《烏絲集》中藉兒女情長、閨情閣怨以抒不得志之愁情。

其二以「彼美何其，繡口檀心，婉變清揚。」譽辭起拍，其後：

怪鬚髯如戟，偏成嫵媚；文章似海，轉益蒼茫。玳瑁為簪，珊瑚作架，
十五城償價未昂。朱弦發，聽短歌日短，長恨情長。

由「嫵媚」以至於「轉益蒼茫」，長恨之所以情長，似乎在上片中交待得比較少，要把話題接續到下片才可得提示：

無端雪涕歡場。儘潦倒荒迷事不妨。勝流黃思婦，鴛機組織；從軍蕩子，馬槊騰翔。

「恨」之所以越趨綿長，由詞中看來，潦倒歡場是當中線索，這就回應了宗元鼎序言中「誰知蕭條瓠落，而與鶯嘴啄紅，燕尾點綠，爭長於鉤簾借月，染雲為幌之間，豈吾兩人(宗元鼎與陳維崧)之志哉？」。兩人當時似乎都對沉溺於歡場的生活有所不滿，但相反，龔鼎孳卻以為「事不妨」，總勝於「流黃思婦」、「從軍蕩子」。接着：

有托而逃，是鄉可老，粉黛英雄總斷腸。

龔氏就此給予「有托而逃，是鄉可老，粉黛英雄總斷腸。」的看法來勸慰陳維崧，龔氏的看法似乎是以「有托」作為前提底下，以一種帶有同情和體諒的眼光來看待「逃」於歡場這選擇，而在龔鼎孳眼下，他將維崧目為「粉黛英雄」，而且「總斷腸」的「總」字，則吐露了這種折中在龔鼎孳眼下是帶有命定的色彩，是「粉黛英雄」、詩人酒客所必經的歷程。結拍：

君試問，任癡人濟濟，誰似羚羊。

與悲劇式「粉黛英雄」相對的，是世上舉目「癡人濟濟」，「誰似羚羊」固然包含了反諷的色彩，但又未嘗不可作更深沉更辯證的解讀，這並非單向指責世人賢愚不分，似乎在「羚羊」這一喻象的指涉下，「誰似羚羊」也可解作是疑問句，即便抒情主體也無法落實判斷，以一明確的答案說服自己。

因此其三龔鼎孳就以勸飲留客起拍：

髯且無歸，縱飲新豐，歌呼拍張。記東都門第，賜書仍在；西州姓字，
複壁同藏。

既然答案無法落實，龔鼎孳只好以勸飲留客來轉移無法調解回應的人生思考。同時又以「東都門第」、「西州姓字」來勸勉陳維崧：當下的世道問題、人生問題無法回應過來，龔氏卻倒過來召回歷史上其他例子，說明在有限生命之內不可見的結果，卻會在百年身故後終得銘記平反，歷史自有公論。

萬事滄桑，五陵花月，闌入誰家俠少場。相憐處，是君袍未錦，我鬢先霜。

「萬事滄桑，五陵花月」都是以「闌入」這種無法抗拒，擅自闖入之歷史之姿誤闖維崧的生命中。對於陳維崧無法入仕，或者是以更宏大的實踐抱負來落實自古文士的人生定位，龔鼎孳感到同樣的難過。撇除他與陳維崧的交情，陳維崧處境其實是觸發了所有文人所共同面對的處境。

秋城鼓角悲涼。暫握手他鄉似故鄉。況竹林賓從，煙霞接軫；雲間伯仲，宛雒褰裳。暖玉燕姬，酒錢夜數，綰髻風能障綠楊。才人福，定清平絲管，爛醉沉香。

龔鼎孳在三首詞作似乎也沒能回應這個彷彿文人宿命的處境，引介出實際的，或精神層面的出路，但這並非他的缺失，畢竟文學書寫往往不是尋求答案，而是「陶寫性情」、「作萱草忘憂」，因此面對不能不叩問，但又無處排解的困局，很多時就是回到當下，龔鼎孳勸慰的方式是以人間的友情暫緩生活的不稱意，即使「鼓角悲涼」，也有「竹林賓從」、「雲間伯仲」，「握手他鄉似故鄉」，不能立德、立功，也自有「才人福」。

龔鼎孳作為維崧知友，也理解《烏絲詞》所寄託的情意，但似乎在龔氏詮釋底下，維崧的形象重點是「文采風流」、「家稱叔寶」、「人是陳思」、「粉黛英雄」的「才人」形象，雖有「我鬢先霜」之嘆，但倒沒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寄望。這就與維崧的自我詮釋與個人定位有一定的落差。

既然兩組作品在本質上明顯就帶有一種對話關係，以下再分析維崧之作時，如果個別以龔、陳二人為分類，各自討論，就會忽略了維崧既是龔鼎孳詞作的讀者、詮釋者，同是又成為詞作的創作主體這重要的環節，因此，以下的討論相對時序關係，更強調的是其中的對話關係。

煙月江東，文采風流，曠代遇之。(龔·其一)

四十諸生，落拓長安，公乎念之。(陳·其一)

在詞作開首的第一句，兩作也是就陳維崧其人物形象作出描畫。龔鼎孳筆下的「文采風流」與陳維崧自以為的落拓「諸生」形象，固然是強烈的反差，同時也應當留意龔氏稱之「曠代遇之」，但陳維崧卻以「公乎念之」來回應。

恰臨春瓊樹，家稱叔寶；黃初金枕，人是陳思。(龔·其一)

似孔家文舉，幼原了了；衛家叔寶，晚更茫茫。(陳·其二)

透過對事典的不同詮釋與解讀，可以更明顯比較兩者立意。龔氏以衛玠、曹植讚譽維崧，所指向的是維崧言行風流，文采非凡，為一時俊傑，維崧在解讀兩處用典時，卻別有聯想，他同樣想到衛玠，但指向的卻是其渺茫而早逝的身世，與上句所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之典故合併起來解讀，陳維崧對作品中用典的聯想，由龔作關於人物才情、才人的指向，延伸到思考個人才力與世道、身世、遭際的關係上來回應。表面看來是用典的正用或反用之別，但實際上在「閱讀—詮釋—創作」的轉換中，焦點已經轉移。

多情甚，倩花閒錦筆，描畫崔徽。(龔·其一)

吾醉矣，纔一聲河滿，淚滴珠徽。(陳·其一)

朱弦發，聽短歌日短，長恨情長。（龔·其二）

公眞誤，歎臣今已老，髮短心長。（陳·其二）

對於龔鼎孳嘉許《烏絲集》中內容透過「花閒錦筆」，寫活多情崔徽，陳維崧的回應卻是自文本內容跳出現實生活，剖開多情美人背後，作者醉酒填詞的失意模樣。龔作〈其二〉本身似乎沒有很明確地點出「短歌日短，長恨情長」的因由，至少要待詞中下片才有輔敘，而陳維崧在〈其二〉就明明白白吐露「臣今已老，髮短心長」，年歲越長，而功業越見難成的遺憾。維崧另有詞〈念奴嬌·曹顧庵王西樵鄧孝威沈方鄴汪舟次季希韓李雲田兄散木伯有送予歸陽羨詞作此留別〉²⁷云：「僕本恨人臣已老，怕聽將歸絲竹。」就更明顯地把「僕本恨人」與「臣今已老」聯繫起來。

無端雪涕歡場。儘潦倒荒迷事不妨。（龔·其二）

秋城鼓角悲涼。暫握手他鄉似故鄉。（龔·其三）

新詞填罷蒼涼，更暫緩臨歧入醉鄉。（陳·其三）

龔鼎孳以友情所在他鄉，能比擬故鄉之親切可居來安慰陳維崧，但陳維崧在現實的他鄉、故鄉外，另外標舉出精神上的「醉鄉」，雖然下文有「此去荆溪，舊名罨畫。擬繞蕭齋種白楊。」，但似乎現實中的他鄉、故鄉都非理想的選擇，他鄉固然是羈旅與飄泊的象徵，而故鄉一方面已經家散人亡，另一方面返鄉亦標誌着建功立業的失敗。所以必須填詞買醉，以使自己暫緩臨歧，逃出現實。因此接下來：

況竹林賓從，煙霞接軫；雲間伯仲，宛雒褰裳。（龔·其三）

況僕本恨人，能無刺骨；公眞長者，未免霑裳。（陳·其三）

²⁷ 《陳維崧集》，頁1330-1331。

如果說龔鼎孳希望以「竹林賓從」、「雲間伯仲」來加強「他鄉似故鄉」的說服力，那麼維崧當下新詞填罷的蒼涼感慨，則是自覺地以「僕本恨人，能無刺骨」作為說服自己的原因。維崧在此以「僕本恨人」來自我詮釋，固然有承接書寫傳統的部份，他把自己納入了自江淹以來的「僕本恨人」身份之中，來理解自己這種失意遭遇自古皆然，有其一定的命運；而維崧雖然沒有天時地利人和，使到自己可以如同王士禎一樣型塑新的文化地位，但維崧以「僕本恨人」這組秋柳詩序出現和挪用過的身份定位來再詮釋自己當下的處境，以應接「公眞長者，未免霑裳」之嘆，就加強了對話性質，而且是把這種詮釋引進到當代的文化話語之中。但是陳維崧此處的「僕本恨人」既沒有強調透過安放自己於書寫傳統之中，以援引隔代知音來排衍當下的的不得志，也沒有像王士禎把「僕本恨人」納入到新的身份定位底下，陳維崧之「僕本恨人」作為其自我詮釋與主體性建構的重要元素，他以「僕本恨人」作為連結書寫傳統與個人性情的接合點，維崧強調的是「僕本恨人」中無法變易的「恨」的命運遭遇，這種負面而個人化的詮釋方向，為其自絕自棄找到了一個可以追溯至書寫傳統的藉口，使其性情的軟弱彷彿得到合理的解釋，以此為自己的遭際與抉擇都找到可以說服自己，同時回應他人的詮釋。

暖玉燕姬，酒錢夜數，綰髻風能障綠楊。(龔·其三)

此去荆溪，舊名罨畫。擬繞蕭齋種白楊。(陳·其三)

才人福，定清平絲管，爛醉沉香。(龔·其三)

從今後，莫逢人許我，宋艷班香。(陳·其三)

最後，陳維崧幾乎完全否定才人之福，但他之對才人之福有所抗拒，並非出自於對現實的重新振作，重燃建功立業的希望，他之所以「種白楊」之思，乃是出於

因現實與理想的極大落差而產生自絕自棄的怨恨情緒。

古往今來的傳統知識份子，一但面對一己危厄而無從發力時，往往便是透過著述、書寫來體現生命的抱負，以之自我鞭策和昇華。陳維崧在其「貧賤自恨無終窮」之際，也如同歷代文人一樣，投向書寫發志的懷抱，但他卻沒有從中得磨礪，相反，陳維崧在性情之上的軟弱，使他不能往積極方向踐形徵色，在「恨」的書寫傳統中與他的人生經歷交織下，他體悟到的，卻是「僕本恨人」遭際的必然性，暗示了一種難以悖逆的文人命運，他選擇了服膺其中，率性任命，而這種率性之極的表現便是「僕本恨人」。在陳維崧筆下，恨的書寫轉出了異色變調的一途。

第四節——詩詞之別：「僕本恨人」在詩中的缺席

亡國易代，人人有恨，如果單純是抒發亡國恨、易代之悲的作品，實在比比皆是，但在〈沁園春·贈別芝麓先生即用其題烏絲詞韻〉中，我們可以讀到陳維崧並非抽身其外，泛寫山河故國，而是融鑄了書寫傳統和特定的個人性情，有特定的語境。除此以外，〈賀新郎·甲辰廣陵中秋小飲孫豹人溉堂歸歌示阮亭〉：「明月無情蟬鬢去，且五湖歸伴魚竿耳。知我者，阮亭子。」²⁸〈賀新郎·將至中州留別芝麓先生〉：「珊瑚十丈憑敲折。歎世上、非公知我，幾成怪物。此外半生誰鮑子，負此真非豪傑。」²⁹等等都是透過與王士禛、龔鼎孳等「長者」對話來呈現「我」的主體性的詞作，茲不贅述。

而在表現形式上，「僕本恨人」是人稱指向十分明確的自我詮釋方式，除此以外，還有體現在他在文本中屢屢有一種對「我」的關注，而這種「我」的出現

²⁸ 《陳維崧集》，頁1527。

²⁹ 《陳維崧集》，頁1533。

又多數連帶「恨」，是上文所言「恨」的感情所在。上文曾舉出〈念奴嬌·次夜韓樓燈火甚盛仍聽諸君弦管復填一闋〉，其中上片言：「紅燭如山，請四筵滿座，聽儂撾鼓。此日天涯謀作達，事更難于縛虎。僕本恨人，公皆健卒，不醉卿何苦？金元院本，月明今夜重作。」³⁰在短短上片中，已經有「儂」、「僕」、「公」、「卿」四者的轉換，當中人物的稱謂急速轉換，無疑也是重要的閱讀線索，呼應了「僕本恨人」的自我詮釋。

在上述詞作中，陳維崧呈現了這樣的一種主體性，然而，陳維崧詩詞並行於世，細讀其詩作，我們發現這種「我一恨人」的形式卻似乎又再一次缺席，罕見其出現。在陳維崧整體的詩歌作品中，律詩數量偏少，也比較拘謹，而以古風、歌行體長詩最能見其抒情色彩與個性，在詩作中，陳有不少明確指稱「我」作為行動主體的詩句，如〈哭故友周文夏侍御五言古一百韻〉³¹就有大量直接稱「我」或強調「我」的詩句：「倔強文士態，驚鈍經生學。而我同袍人，一半隱污濁。乃悔向時習，大足供嘔噓。」、「我詩常早成，吟聲振寥廓。」、「猶憶癸巳春，鄙人益落魄。讐家肉視我，張吻誓咀嚼。適君晝錦歸，切齒碎齟齬。挈我亡命游，俾我罕驚愕。」。其他詩作尚有「我生江表若培塿，何異斥鷃棲樊籠。」³²「憐我衰年轉貧賤，停杯不飲有所思。」³³等等。他也有不少詩句是抒寫「恨」的主題，例如「虞卿樓緩皆上客，惟恨未從毛薛游。」³⁴「不恨名花今又開，但恨人生不相待。」³⁵但不論言「我」或言「恨」，表達形式與詞有頗大分別，比較接近其詞作中「僕本恨人」的，可能已經是長詩〈雪後從偃師至登封度少室山嶧嶺〉中「何為過廟不敢入，爾與童羖將無同。嗚呼此亦大有故，貧賤自恨無終窮。短

³⁰ 《陳維崧集》，頁 1322。

³¹ 《陳維崧集》，頁 665-667。

³² 《陳維崧集》，頁 709-710。

³³ 《陳維崧集》，頁 714。

³⁴ 《陳維崧集》，頁 690-691。

³⁵ 《陳維崧集》，頁 709-710。

衣蔽肝泥沒踝，見此轉使山靈恫。依人奔走覓衣食，似爾豈得誇桑蓬。」³⁶以及〈為汪舟次題紅橋衰柳圖〉的「垂柳絲絲漾麴塵，吳船秋水碧粼粼。揚州風景原難畫，能畫揚州是恨人。」（原注：畫師江姓）。³⁷前者的歌行體選擇以直白的口吻來申訴心中「自恨」，這種恨意的內容是來自於「短衣蔽肝」、「依人奔走」這些客觀環境的遭遇，但基本上這首詩的恨意還沒有上昇到前文所言，一種透過挪用和回應書寫傳統而為自己的遭遇和性情找到合理性。〈雪後從偃師至登封度少室山嶧嶺〉的重點主要是「我生江表若培塿，何異斥鷃棲樊籠。」；後者這首七言絕詩，點出了「恨人」，就其字面意思所實指，這位能畫揚州的「恨人」當然是原注中所提及的江姓畫師。詩中首兩句所描寫的衰柳圖內容，就詩而論，並不精警，甚至是無法突出圖畫的特殊性，也因此第三句也坦白的說「揚州風景原難畫」，這可能是實話，也可能是為江姓畫師開脫，但重點是「揚州」在清代本來就有其特殊語境，詩句所寫之柳並不衰頹，客觀的揚州也未必帶恨，重點是持畫人、作畫人、賞畫人對揚州有主觀的投射，所以言柳之衰，而揚州有恨，也因此，能畫揚州者固然是恨人，而持畫者、賞畫者何嘗不也是把自身理解投射到畫中的「恨人」？但此處之「恨人」卻並不相同於上文所言，在維崧詞作中所體現的「僕本恨人」自我詮釋。就這詩的文意內容而言，我們很難把這首作品納入江淹至來的「僕本恨人」書寫傳統，而就抒情方式而言，這首詩回歸到傳統的抒情方式，即透過圖畫作為寄託情感的媒介，畫師作為喻體，將自我詮釋收藏在文本之後，要求讀者詮釋時理解其觀畫人同是有恨的含蓄的言外之音。就此而言，「僕本恨人」這種特殊的表達形式及其意涵，是陳維崧詞作的獨有而其詩作所無。

陳維崧長年在外浪遊，在他的羈旅生涯之中，冒襄、王士禎、龔鼎孳三人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往往左右陳維崧的行動取態。陳維崧與他們三位長者、健卒在詩詞中的對話，實有別於一般的拜謁請造，似乎不應視之為功利考量投機策

³⁶ 《陳維崧集》，頁 709。

³⁷ 《陳維崧集》，頁 609。

略，而應視之為陳維崧歷年以來飄泊在外，投注真實感情的所言所感。上文所言種種強調「我」的舉措，如果僅僅視之為「以文為詞」，或者是雄放不拘細節的表現，或許會失之粗疏，我們應該思考在傳統中國詩詞中「我」的往往缺席，而在陳維崧筆下重新「在席」的意義產生過程。

第五節——結語：恨人亦有可悲處

在詞的創作之中，陳維崧融匯自身性情體悟，連接自古以來「僕本恨人」、英雄失路之悲，但與此同時，在現實生活中，他不得不面對詩詞世界以外，種種客觀條件的壓逼與不如意。〈念奴嬌·次夜韓樓燈火甚盛仍聽諸君弦管復填一闕〉上片固然有「僕本恨人，公皆健卒，不醉卿何苦？」語，以呼應前句「此日天涯謀作達，事更難于縛虎。」，而「不醉卿何苦」則吐露詞人則始終以「醉鄉」作為精神上暫時逃避現實的出口。但轉入下片，現實的「狂受人憎，醉供人罵，老任雛姬侮。」，卻是使詞人耿耿於懷的心結。而結句「揚州燈火，明朝人定傳語。」固然可以理解成一種自負的口吻，展示現其依然故我，以競逐粉黛英雄而自豪，但同時也可以理解成詞人對生活的焦慮，以一種自絕自恨的口吻，時常營役於他人投放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關於陳維崧生活中的逼迫，前章已有述及，在此重提，是想點出其性情的不自振作。我們說「僕本恨人」是個連結點，將書寫傳統與個人性情，連繫其中，產生自我詮釋與主體性，而上文透過兩組〈沁園春〉也反映了維崧自恨自絕自棄的性格。除此以外，陳維崧其實一如很多失意文人，性格上並不圓滿偉大。在封建社會，人品、聲望往往是一個男子在社會的立足點。陳維崧屢次應考科舉落第，這可能包含多方面的原因，就維崧自己而言，當然會理解成懷才不遇，因此才会有如上文所言，自我詮釋為「僕本恨人」。但換個角度，陳維崧立身行世又是如



何呢？

陳維崧一生七應科舉而全數落第，在其四十三歲時，維崧讀書於蘇州范必英(1631年-1692年)芝蘭堂，有詩〈丁未春日范龍仙年叔相約讀書芝蘭堂〉，詩中有「四十男兒學干謁，朝游江淮暮吳越。漫將衣食累朱門，詎有文章動金闕。倦游屢歲賦歸歟，故人相值還唏噓。歡我莫作千里客，留我共讀三冬書。」³⁸末句明顯地是芝蘭堂主人范必英對陳維崧的規勸。即便是身份類近於友人的范必英，也對維崧長年浪遊，生活於酒席飲宴間似有微言。維崧一生曾於多位名公長輩處「讀書」，雖名為讀書，但就其留下的作品、今人整理的年譜來看，在所謂「讀書」備試的生活中，卻每多充斥着數之不盡的倡和宴遊。

在冒襄水繪園「讀書」期間，陳維崧在一六五八年除夕觀劇時，邂逅冒家樂班男童優徐紫雲(1644年-1675年)。³⁹冒襄愛惜、甚至可以以溺愛來形容他對陳維崧的態度，因適其意而把紫雲遣與維崧作伴讀書僮。然而紫雲之於維崧實在無益於讀書，反而二人狎遊之事人所共知，《觚賸》就記載一段小插曲：某日冒襄見維崧紫雲二人於內閣眉目傳情，忽佯裝大怒，命人縛去紫雲加以杖刑。維崧大驚，省起唯太母方可解救雲郎，即長跪太母門外，太母要維崧即夜完成咏梅絕句百首，維崧百韻既成，冒襄「讀之擊節，笑遣雲郎」。⁴⁰由冒襄與太母的態度可見基本上冒家視維崧與紫雲一事甚為輕可，甚至以之調笑捉弄維崧。

維崧一生中不少他人送贈的圖畫都與紫雲有關，如《九青圖》（「九青」即紫雲之字）、《雲郎出浴圖》、《迦陵填詞圖》。諸圖均有維崧諸友人為之題詠，尤以《迦陵填詞圖》為甚，其時雲郎已歿，維崧攜圖上京應博鴻試，一時文人題詠

³⁸ 《陳維崧集》，頁 643。

³⁹ 《陳維崧年譜》，頁 193。

⁴⁰ 事見《觚賸·卷二·吳觚中》「賦梅釋雲」條。引錄自《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一七七·子部·雜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25。

甚眾。文友間固然對二人之情視為一時佳話豔談，但事實上二人狎遊之事卻未必為世所容。一六六四年徐紫雲賜婦成婚，維崧有合巹詞贈之曰：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蕙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⁴¹極之哀怨動人。但即使配婦而歸，但在一六六八年維崧上京時，雲郎亦隨其左右，京師名流除爭訪維崧，亦爭訪雲郎聽其唱腔。但其實攜雲郎北上一事並沒有得到冒襄批准，而龔鼎孳也為此致書冒襄代為陳情。⁴²而友儕間曾為此規勸維崧，一六六九年維崧致書董以寧(1629年-1669年)請求為《九青圖》題詠，董氏〈答陳其年書〉有以下回應：

承諭題《九青圖》，知足下於小史（筆者按：即書僮雲郎）鍾情益甚，此固吾輩失意之人支離潦倒之所托也。僕向者亦常久溺於此，而溫豔之體，又平日所優為，遂不禁欣然為之……僕因念足下更長於僕五年，於少保公為冢孫，於處士為冢子，生子事大，雖支離潦倒，不宜更有此無益之好。遂終擱筆，不復為足下題《九青圖》。寧頓首覆。⁴³

此處固然可以看到董以寧以一種相對決絕的態度，以拒絕為其題詠來告戒維崧遠離男色，又以陳于廷(1566年-1635年)、陳貞慧(1605年-1656年)二人的血脈延存、名聲作說服維崧的理據。由龔鼎孳致書冒襄、董以寧拒絕題詠，可見維崧與雲郎之情已並非聊備一說以之調笑的小事，而是關係到維崧的聲名與立身處世。以上引文所謂「此固吾輩失意之人支離潦倒之所托也。僕向者亦常久溺於此」就更由旁觀者的眼光，道出維崧「僕本恨人」的文人姿態下，「支離潦倒」、自絕自溺的情態。

陳維崧並非犯下甚麼滔天大罪，他只是性格上有軟弱之處，面對功業的追

⁴¹ 《陳維崧集》，頁1526。

⁴² 《陳維崧年譜》，頁325。

⁴³ 《陳維崧年譜》，頁357。

求，往往不能振作，展現出無能的一面。他沒有透過撰述而言志，得到情志上的昇華與飛躍，也沒有與志向理想相應的魄力，始終不能成為歷史舞台上改變世界伸張抱負的英雄豪杰，但他的辭章才華和多愁善感卻使他成為「粉黛英雄」、酒國英雄。在〈滿江紅·咏雪(其八)〉⁴⁴中，面對「大雪江天，笑萬里、北風作惡。拚只向、屠門大嚼，磨刀霍霍。」的惡劣氣候，詞人固然聯想到「季布田中亡命客」，但身為酒國英雄的陳維崧也同時聯想到「盧家堂後消魂約」，上片結拍以「正雪深兀坐酒樓中，思量著。」展現一種議而未決的張力，牽引到下片。下片「車中婦，山頭雀。恨不了，愁難卻。總無如一醉，勝他行藥。」詞人在一番心理掙扎後，始終也選了及時行樂無如一醉，作為尤勝行藥的人生出路，結拍兩句「小婦且擎紅玉碗，金吾漫鎖春城鑰。拍糟床、極愛酒家郎，頻呼索。」之沉浸於婦人美酒之中，甚至以一種輕挑的口吻語調作結。〈一萼紅·癸丑除夕〉⁴⁵中，從前「記得當初，後堂弟妹，團團圍定紅簾。」的多年壓眉舊事，詞人是以「飲盡了、屠蘇千盞，撾畫鼓、憨笑賭黃柑。」作為思念的連結，直到後來「自後也逢除夕，歎此生長是，弟北兄南。第宅俱非，顛毛都換，每因令節生嫌。」詞人面對兄弟四散，人物都非「只萬點、官橋夜火，風吹零亂映疎簷。」，他始終也是歸結於「羨殺隣家歲酒，隔巷春衫。」以酒作為思情起點，但當這種情緒無法排解，卻又是以痛飲賣醉作為歸宿；〈賀新郎·將至中州留別芝麓先生〉⁴⁶中，詞人自覺「男兒事，有本末。」，也對龔鼎孳的痛愛十分感激，但詞人再一次以「今不醉，後何益。」作為整首抒情作品的終章。

錢鍾書(1910年-1998年)對「文質」與「人品」的洞見，正好可以作為陳維崧「僕本恨人」自我詮釋的總結：「立意行文與立身行世，通而不同」。⁴⁷要進入詩家詞人的創作心靈，諦聽其幽微心曲，但憑考究其「立身行世」之自我，或者

⁴⁴ 《陳維崧集》，頁1193。

⁴⁵ 《陳維崧集》，頁1466。

⁴⁶ 《陳維崧集》，頁1533。

⁴⁷ 錢鍾書：《管錐編》（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頁1389-1390。

會失之粗糙，「通而不同」，一併關顧「作者修詞成章之為人」，感受其在文學創作中所展示的「與我周旋之我」，了解其性情面目中可愛、可憎、可怨、可親、可成其人其個性之種種，這便是對陳維崧複雜又沉溺的一生，最好的詮釋方法。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only.
Not for publica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第四章

「經」、「史」、「詩」、「詞」的分途與融通 ——從陳維崧〈詞選序〉論其推尊詞體的根據

創作主體具備了一定的創作條件，展開書寫活動的時候，他「作者」的身份便得以確立；作品完成問世，這位「作者」就變成了作品在世上的第一位「讀者」；當「作者」、「讀者」的身份與過程反復交替，長時間浸淫在創作、閱讀、反思的氛圍底下，「批評家」和其評論眼光由是誕生。相同的主體，在書寫活動的不同環節中，身兼多個身份。陳維崧以詞作留名，他優秀作者的身份固然毋庸置疑，與此同時，細讀陳維崧存世的理論文字，進入他的評論視角，他又何嘗不是一位深得詞心的讀者和理論家。

雖然陳維崧主要並不以評論家的身份示人，也沒有鴻篇巨制的理論專著存世，但他為各種詩／文／詞集、文學作品選本，以至史論、經解、遊記所撰述的序、跋文章，卻構成陳維崧文學理論的重要體系。前一章透過聚焦陳維崧詞作本身，析論其主體性，理解他作品中不同筆法、典律下所包含的性情面目。如果這種深耕細讀、反復推敲品味其作品的詮釋方法，是一種發現與點照的向導，那麼，本章所論陳維崧的文學理論，便是一種與之互為呼應、互為表裡，貫通點明陳維崧整個理論體系的針線，詮釋了他倚聲填詞創作動機的理論面向。

在眾多理論性的論述中，陳維崧的〈詞選序〉往往為近人引述最多，也談及最多。就其明確的論詞意識和理論深度而言，〈詞選序〉一文確在陳維崧所有的評論著作中，佔一極重要的地位，專研陳維崧的學者嚴迪昌(1936年-2003年)認為〈詞選序〉中「陳維崧這段論述是在『才不盡』、『體格亦不盡』的宏觀論證



前提下，展開具體的專屬審美特性範疇的分辨解析」，¹當中「『才』人們不斷地創變着的『文章』不可能在這種論定中被限制着，『至所以為文，不在此間』是精到的流變觀念。這樣，就擯斥了傳統的一些觀點，否定了必須經典性的認可，才能列入『大雅』範疇，不然就是『小道』的習慣手眼。」，²這是「進一步指出，任何文體的創作都應以全部的才智、畢生的精力甚至整個生命去嚴肅地承擔起共同的使命。這使命其實就是社會功能……足以與『經』、與『史』相齊駕并驅而無愧色的功能」。³後來論者基本上大多承接這種看法，認為〈詞選序〉的「理論基石是：『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其理論結穴是：『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其理論宗旨是：從本體論角度推尊詞體」。⁴

從這一系列論調一脈相承的研究可以發現，普遍對〈詞選序〉的詮釋集中於整段序文的前半，以「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作為理解這篇理論著作的核心。這種分析的確正確地把握了陳維崧從書寫的本質上拉近「詩」、「詞」、「經」、「史」四者距離的貢獻，亦即有論者所謂的「從本體論角度推尊詞體」；但是這種詮釋方法似乎又冷落了同篇中其他重要的部份和關鍵字眼，⁵如果視〈詞選序〉為一篇有理論高度，而且結構整全的文學理論文章的話，這恐怕也未必是一種全面的解讀。與其反復重申往論者的已有創獲，不如展開對那些重要而罕見論及部份的分析會更為積極，至少我們應該要叩問：如何推尊？是不是現有討論已經完整地呈現整個論述脈絡？與詞對舉的詩、經、史的定位如何？這又如何反過來影響詞之可以存經存史的功能？回應這些問題，可能對陳維崧研究，會有更實在、更具前瞻性的益處。

¹ 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山東：齊魯書社，1993年2月），頁100。

² 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頁99。

³ 同上注

⁴ 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11月），頁233。

⁵ 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頁97-104；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頁194-196。嚴氏在相關論述中，似乎沒有明確地解釋「經」、「史」的實際意涵，傾向是一種泛指；也較少解釋最後一段「患在人心」的具體內容。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以陳維崧〈詞選序〉作為核心，以至於放眼陳維崧其他詮釋文學理論的文章，針對其中牽涉到「經」、「史」、「詩」、「詞」的語段，建構相對完整的論述範圍，並討論其中的分歧與合流，也就是說，呈現出〈詞選序〉之所以能集大成並得以如此論述的背後理路，同時呼應其他理論文章所組成的論述流。而透過這種詮釋方向，似乎發現了陳維崧除了對「經」、「史」、「詩」、「詞」有本質上的關注，「經」、「史」也並非泛指意義下的「經」、「史」，「經」、「史」、「詩」、「詞」四者之間的融通與嫁接，表現出陳維崧對詞之「用」——「患在人心」的獨特判斷。而最後這層面的轉化與融通，對於重新審視陳維崧專力填詞的因由，提供了新的觀點。

第一節——〈詞選序〉的論述脈絡

〈詞選序〉是陳維崧主編，吳本嵩(生卒未詳)、吳逢原(生卒未詳)、潘眉(康熙十八年湖南溆浦知縣，生卒未詳)同輯的《今詞苑》的其中一篇序文。除陳序以外，尚有徐喈鳳(1622年-1689年)、吳本嵩、吳逢原、潘眉等序。《今詞苑》選政始於康熙八年(1669)，終於康熙十年(1671)。〈詞選序〉可算是陳維崧生命晚期集大成、最能總結其詞學觀念的評論文本。全序如下：

客或見今才士所作文間類徐、庾儷體，輒曰：『此齊梁小兒語耳』，擲不視。是說也，予大怪之。又見世之作詩者，輒薄詞不為，曰：為輒致損詩格。或強之，頭目盡赤。是說也，則又大怪。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開府〈哀江南〉一賦，僕射在河北諸書，奴僕莊騷，出入左國，即前此史遷班掾諸史書未見禮先一飯；而東坡、稼軒諸長調，又駸駸乎如杜甫之歌行與西京之樂府也。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上下古今，如劉勰、阮孝緒以暨馬貴與、鄭夾漈諸家所臚載文體，厘部族其大略耳，

至所以為文，不在此間。鴻文鉅軸，固與造化相關，下而調語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

今之不屑為詞者，固亡論；其學為詞者，又復極意《花間》，學步《蘭畹》，矜香弱為當家，以清真為本色；神瞽審聲，斥為鄭衛。甚或釁弄俚詞，閨襜冶習，音如濕鼓，色若死灰。此則譎談隱度，恐為詞曲之濫觴；所慮杜夔左驥，將為師涓所不道，輾轉流失，長此安窮？勝國詞流，即伯溫、用修、元美、徵仲諸家，未離斯弊，餘可識矣。

余與里中兩吳子、潘子戚焉，用為是選。嗟乎！鴻都價賤，甲帳書亡，空讀西晉之陽秋，莫問蕭梁之文武。文章流極，巧曆難推。即如詞之一道，而餘分閏位，所在成編；義例凡將，闕如不作，僅效漆園馬非馬之談，遑恤宣尼觚不觚之歎。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則余與兩吳子、潘子僅僅選詞云爾乎？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⁶

首段陳維崧拈出以徐陵、庾信為代表的駢儷文章，作為與詞同一處境的參照項，點出詞與駢文同被世人目為小道的情況，但是，陳維崧對駢文與詞這兩種弱勢文類的歸類方向，卻是將徐、庾嫁接到《莊子》、《離騷》、《左傳》、《國語》；將蘇軾、辛棄疾的長調詞作，嫁接到杜甫詩與西漢樂府，這無疑是把一向被目為小道的駢文與小詞，納入屬於正典的文學傳統之中，就這階段而言，其實還沒有真正從本質上消弭文類貴賤的偏見，因為論述至此為止，駢文與詞依然是要透過依傍正典來提升地位，這就與後來張惠言(1761年-1802年)、周濟(1781年-1839年)之於常州詞派的詞學理論，屢屢以《詩》、《騷》的比興寄託作為釋詞策略，

⁶ 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頁54。

本質上是一樣的。⁷而真正能夠消弭文類間貴賤差異的，是陳維崧接着推出「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的論點，這論點承接上文論調，但卻並不是順承，而是以一種類近逆向思維的進路作出批評：並不是徐、庾、小詞諸體源自於詩、文正典，而是反過來是因為創作者的性情面目各有不同，所以才會有詩、詞、散體、儷體等不同體式的出現，這才是從本質上證明各種體裁自有其存在價值的最有力憑證，不必依賴所謂靠攏正典來取得合法地位。陳維崧認為歷代批評家，都只是「部族其大略」，真正行文調度創作時，情況遠為複雜。在第一段的末段，陳維崧更進一步，申論但凡是書寫行為，不論是詩、詞、經、史，都必須合符「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的條件，作為書寫行為的總原則。

論者指出這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推尊詞體，這固然不錯，「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即便是其核心，但大多論者只留意到本體論的部份，卻忽略了這篇詞序的其他層次。第一、所謂「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嚴格上來分析，這固然與「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這本體論的部份相關，但卻並不完全屬於本體論的範疇，而是論述創作者書寫時一切必要的心理、精神、品性條件，這是屬於「創作論」的環節，「至所以為文不在此間」就更明朗地直指這是關乎「為文」——即創作論本身的問題。而這樣理解，這篇理論文章的脈絡就更為清楚：即第一段是由本體論邁向創作論，來論述「經」、「史」、「詩」、「詞」四者的相同本質。

第二段即由創作時所須的條件，轉而論述作品本身。固然，「其學為詞者，又復極意《花間》，學步《蘭畹》」還是談「學為詞」，亦即創作論的問題，但下文所謂「纂弄俚詞，閨檐冶習，音如濕鼓，色若死灰」、「勝國詞流，即伯溫、用

⁷ 嚴迪昌：《清詞史》，頁 473-475。

修、元美、徵仲諸家，未離斯弊，餘可識矣。」中，俚詞、閨詞是作品的內容特色；音色比之「濕鼓」、「死灰」，即言其審美情趣與風格——即使這是陳維崧所否定的風格；到最後對數位明詞名作家的不滿，也是承接前文而來，這個第二段即已變成從作品的藝術效果來評騭高下，傾向屬於「作品論」的範疇。

雖然理解或許不同，或許有所偏差，但以上的語段歷來已多有論之，而最遭人嚴重忽視的，是整篇序文的最後一個段落，這個段落一改前文以散體句式為主的書寫策略，行文上有頗多用事與駢句，讀起來語義較前文婉轉曲折，而且以下的語句似乎流露了作者陳維崧撰序選詞的用心：

僅效漆園馬非馬之談，遑恤宣尼觚不觚之歎。非徒文事，患在人心。

然則余與兩吳子、潘子，僅僅選詞云爾乎？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

首先，論者往往將「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視為前段「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的延續而未加深解；其二，「非徒文事，患在人心」一句缺乏詮釋，但偏偏這句句子卻是在整篇序文收結處出現，而且是帶有總結意味的論述，不可不論，而且就句意而言，也不可視為上文語意的重複；其三，在這段落中，「存經存史」與前文「為經為史」，就相同處而言，固然是將詞的對照對象前後一致地以經和史比之，但「存經存史」與前文「為經為史」卻有着一明顯的差別，就是「為」——指向的是創作實踐，是創作論的問題；「存」所指向的，是目的、效用的問題。加上所謂「非徒文事，患在人心」，陳維崧期望透過詞作，能產生實際影響人心的功效，就更顯然易見，所以最尾一段，其實是承接文章一路沿本體論、創作論，以至於作品論，而最終收結於效果論，以探討「詞之用」作為〈詞選序〉的最終意旨。

積極介入現實，言志載道，期盼透過文學書寫來改良社會，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尤其在板蕩之世，詩人詞家往往持以行之。即使很多時並沒有實際的效益和成果，但文學書寫的象徵功能，和文化層面的建築，卻歷久不衰，〈詞選序〉最終所指的「非徒文事，患在人心」正是這種效果論的典型體現。但是相較討論詞的本體和創作條件，〈詞選序〉中解釋「詞之用」、以及「如何用」的篇幅，就顯得短小得多，但知其名目，而未能知其所以然。〈詞選序〉固然是陳維崧生命晚期集大成、極重要的一篇理論文章，帶有強烈總結性的宣言意味，但既然〈詞選序〉中所言未及足夠的闡釋，那麼，陳維崧寫作生命中其他論詩論詞序跋，未嘗不可以視為溝通〈詞選序〉的線索，提供補遺各種未詳論點的資源。

第二節——「詞一史」與「詩一經」：兩種不同的文學理論傾向

既然序文明言「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考察陳維崧在理論著作中對詞的態度，就不能單純考察他看待詞的態度，還應考量詞與經、史、詩之間的關係。在多篇序文的詮釋之中，詞與史的關係最明清晰，也關連最密切：

然則斯詞也，以為《金荃》之麗句也，抑亦《夢華》之別錄也已！（〈任植齋詞序〉）⁸

所謂「《金荃》麗句」，「《夢華》別錄」，也就是以文學書寫——尤其《金荃》指示了傾向柔美一的修辭藻采，來書寫歷史。值得追問的是，以「《夢華》別錄」所指的歷史書寫實際上呈現了一種怎的形態？又這種以「《金荃》麗句」來寫史的方式，與一般歷史書寫形式的差異。以上引文令人留意到的是，陳維崧以《夢

⁸ 《陳維崧集》，頁 53。

華》作為借代史傳的喻體，而不是以《史》、《漢》、《國》、《左》等屬於正典系統的史書。這就透露了其中線索。繫名於孟元老名下的《東京夢華錄》，有兩點判斷是大家相對肯定的：屬於南渡後之作；書中屢屢追憶汴京舊日盛況。這種民間自撰小史，甚至是隱名撰作的歷史書寫方式，配合富追憶意味的書寫語調、內容，與很多其他陳維崧論詞序文中，形容以詞存史方式的論點相當吻合：

念欲著金陀之史，姑俟諸地老而天荒；無如填蘭畹之詞，猶藉以娛年而送日……臧文仲書詞詰屈，讒語居多；鍾儀父音節蒼涼，土風不少。觀其見事生風，倚聲橫筆。（〈觀槿堂詞集序〉）⁹

或蝦蟆陵上，暮年紅袖所閑談；或鸛雀樓邊，故老白頭之夜話。或武擔過客，曾看石鏡於成都；或盤屋居民，偶得銅盤於渭水。苟非目擊，即屬親聞。（〈曹實庵咏物詞序〉）¹⁰

蜀人楊得意，夙直漢庭；鑿者夏無且，精知秦事。西風江上，有人善濕青衫；南國花前，此客解歌紅豆。舊時阿監，暮年恰值湖湘；昔日宮娥，寒夜偏談天寶。鬧蛾撲蝶，輦下新聞；消九咬春，官家瑣事。何況東京坊陌，未乏成書；南部笙簫，相沿故典。三聲玉樹，偶譜自擷擋線篋之餘；一卷金縷，半搜於狼籍牙郎之手。（〈黃編修庭表宮詞序〉）¹¹

這些詞序所呈現的觀點中，詞之可以記史，不是因為官家修撰，也不是納入了《史》、《漢》、《國》、《左》的史傳傳統。陳維崧「詞一史」中的主角和撰述者，往往是白頭翁、老宮娥、舊時民等非身任史官、也非官方論述包容納的角色，如

⁹ 《陳維崧集》，頁 367-368。

¹⁰ 《陳維崧集》，頁 364-366。

¹¹ 《陳維崧集》，頁 370-372。

果說官修正史所代表的是一種王朝正統的論述，以國家政權合理性和政治效益(正名、正朔)，或倫理效益(微言大義、春秋筆法)為著述大前提的話，那麼陳維崧希望以詞所存之「史」，便是一種傾向呈現不同民間小人物獨立個性的庶民歷史。雖然近於所謂「稗官野史」之流，沒有完整的系統、體例，或者所謂春秋筆法，但究其實，系統、體例並不是陳維崧眼底下這種庶民歷史的重點，這種庶民歷史的重點，不在於所謂「史實」的政權統一性和論述一致性，反而更重要的是尊重和顧念那些在歷史變動中，無法左右命運，默默承受又默默無聞的一群，即引文所言：暮年紅袖、故老白頭、武擔過客、鰥居居民、濕衫司馬、解歌之客等，這是一種情感的記載大於事實的記載。在這種書寫意識和取態底下的歷史書寫，所呈現的更多是帶有主觀色彩的片段，而非盡量講求客觀、強調先後次序和因果的實事。更甚者，是陳維崧對「史」的書寫，本身就有著更強烈而自覺的反思，對於這種不被收納於正史的庶民歷史，他毫不掩飾其虛構的本質：

豈非謔謔出出，〈諾臯〉之所未收；怪怪奇奇，《齊諧》之所不載者哉！（〈曹實庵咏物詞序〉）¹²

臙脂縱麗，無非北地之花；孔雀雖妍，不過南方之鳥。而乃濫相揶揄，姿用編排。越豔為吳娥而製恨，總涉虛無；嬴姬假趙娉以言情，差無事實。徒充漫錄，僅助叢談。（〈黃編修庭表宮詞序〉）¹³

子虛亡是，詎常真有其人；暮雨朝雲，要亦絕無之事。然而宋玉以寄其形容，相如以成其比興，固知情難摭實，事比鏤塵。託讖謎以言愁，借嘲諷以寫志。凡茲抹月批風之作，悉類詛神罵鬼之章。達者喻之空花，愚夫求之楮葉……狂時漫寫，定屬神來；醒後詳觀，不知誰作……《夢華》

¹² 《陳維崧集》，頁365。

¹³ 《陳維崧集》，頁371。

小錄，彷彿前生；花月新聞，依稀故事。（〈蒼梧詞序〉）¹⁴

前文所謂民間歷史，即使如何隱名、讖語，但總歸是各色庶民生活、感情的記述，但由以上引文的論述，可見在此陳維崧再推前一步，「詞一史」的對照對象，不單是民間小史，而是〈諾皋〉、《齊諧》、朝雲、子虛等志奇志怪，近於小說者流的歷史傳說。這些虛構之史，陳維崧清楚意識到當中「差無事實」、「徒充漫錄，僅助叢談」、「詎常真有其人」，「要亦絕無之事」的純粹虛構性質，但這並非要否定或推翻白頭翁、老宮娥的民間小史經驗，相反，應該說是陳維崧道破了但凡歷史書寫行為，即使是現實性較強的所謂正史系統，也必然有其創作、篩選和虛構性質，尤其是置身於國變易代，究竟甚麼才是可以定論的「事實」？是成王敗寇勝負使然？還是另有規律？在這種光譜的角力之中，陳維崧的取捨在當時來說是頗為先進和極致：他甚至是對傳統所謂的「史」不予信任，提出質疑，並把眼光由「史」，轉移到「詞一史」，在這種眼光底下，推論出所謂的「詞一史」不過是一種作者「僅助叢談」、「託讖謎」、「借嘲諷」的書寫策略，甚至寫作時本身就可能有一種「狂時漫寫，定屬神來；醒後詳觀，不知誰作」的狂迷狀態，甚至連作者自己本身也無法肯定其撰作的真確性。

當然，我們可以很容易立即舉出杜甫〈三吏〉、〈三別〉、白居易〈長恨歌〉等富有「詩史」性質的作品，作為淵源，但明顯陳維崧這種「詞一史」論，卻是與之不同的。傳統所謂的「詩史」，以白居易為例，很大程度是秉承了漢儒詩教說的傳統，以詩歌諷諫時事、關注民生疾苦為重建王道正朔的橋樑，而且自有其「史統」，有慕實慕信的倫理傾向。¹⁵但上述陳維崧的「詞一史」眼光和角度，甚至可以說是以「詞」來革「史」的命，並不慕實慕信，而是慕虛慕情。以史學的角度來說，他是解構了「史」之成立的可能性，這恐為撰史者所不齒，但是，他

¹⁴ 《陳維崧集》，頁 379-381。

¹⁵ 葛曉音：《唐詩宋詞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2 月），頁 134-135。

其實沒有完全地瓦解「史」的存在，應該說，當陳維崧認為文學與史學同樣是有一定的虛構性，分別可能是在於兩者對想像成份的輕重，和書寫對象的不同而產生差別，所以陳維崧始終道出了「《夢華》小錄，彷彿前生；花月新聞，依稀故事。」，他的策略不過是以詞寫史，透過填詞來寄託，「喻之空花」，觸動知音，他最終目標，實際上是「以彼流連小物之懷，無非淘洗前朝之恨。」¹⁶

相對於「詞—史」的重新詮釋，陳維崧對詩的詮釋比較傳統和保守，在論述詩這種體裁的功能時，陳維崧有以下的描述：

數十年來，陳黃門虎踞於前，吳祭酒鷹揚於後，詩學復興，天下駸駸乎盛言詩矣……求其涵咏乎性情，裨繫乎治術，纏綿婉篤，鼓動飛潛，何未之概見也！（〈許九日詩集序〉）¹⁷

然則格神祇，饗天祖，感頑豔，察貞淫，舍倫物，吾誰與歸！（〈杜輟耕哭弟詩序〉）¹⁸

又常涉歷於人情世故之間，因之浸淫於性命述作之事，益知詩者，先民所以致其忠厚，感君父而饗鬼神也。（〈與宋尚木論詩書〉）¹⁹

揲著繫象，理本元公；輯雅稱詩，義緣上相。莫不仰視天漢，俯察華蟲，舒慘協乎陰陽，清濁調乎律呂。麟麟炳炳，喬喬皇皇，文字之興，由來尚矣。且夫言以旌心，文原載道。（〈佳山堂詩集序〉）²⁰

¹⁶ 《陳維崧集》，頁 365。

¹⁷ 《陳維崧集》，頁 20。

¹⁸ 《陳維崧集》，頁 35。

¹⁹ 《陳維崧集》，頁 89-90。

²⁰ 《陳維崧集》，頁 276。

以上四條資料雖然背景有異，但都是陳維崧討論「詩」的論述文字，其中論述的方式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許九日詩集序〉雖然是對刻下詩壇風氣有所不滿而生出「何未見之概也」之感嘆，當中陳維崧透露了他對詩歌的要求，即所謂「涵咏乎性情，裨繫乎治術，纏綿婉篤，鼓動飛潛」，而其中前兩句論效果的文字「涵咏乎性情，裨繫乎治術」則將調暢個人性情與有益於國家治術相題並論；在〈杜輟耕哭弟詩序〉和〈與宋尚木論詩書〉中，似乎個人性情在詩中的表現，並非考量重點，「格神祇，饗天祖，感頑豔，察貞淫，舍倫物」、「致其忠厚，感君父而饗鬼神」基本上全都站立於政教立場出發，個人的性情在此缺席，與此相對的，是序文處處流露的感通家國、鬼神，求其中和方正的倫理之情，而非人生之七情六慾；在〈佳山堂詩集序〉這篇駢體序文中，詩道固然有關天道、陰陽，同時「麟麟炳炳，裔裔皇皇」的政教色彩也很明顯，甚至最終肯定了「文以載道」這種將詩歌收納於倫理道德之下的定位。

這種可以推源於漢儒詩教說，以王道政教作為指導原則的文學功能論，其本質就與「經」十分吻合，這裡所指的「經」，並非就哲學意義而言，而是更加傾向就「經」的政治功能而言。以上陳維崧論詩的策略，已可見苗頭，而更重要的是，在陳維崧心目中的分類中，「詩」往往是歸於「經」，是「經」的一部份：

客問於陳子曰：《詩》何以列於經也？陳子曰：先王之設詩也，將以宣美教化，扶進治術，倡導性情，疏解鬱閼，是以忠孝之旨，溫厚之思，莫尚於詩也……然則詩之列於學官也，非僅為摹繪牽綴，淹麗奧博，遂足以成名也。務使詞必稱意，格必稱理，舉凡悲歡愉戚、幽離蕩往之境，與夫鳥獸草木、詭奇變譎之狀，一切澤之以正大而規之以和平，天子採其聲可以定樂，君子聞其音可以觀化，孰謂今之制義，非延涓之能事，夔曠之

極致歟？（〈路進士詩經稿序〉）²¹

當然，陳維崧也並不是完全將「詩」與「經」劃上等號，單純提及其實用功能，因此陳維崧也指出「詩」之列於「經」，但又同時具有與「經」不同之處，並非以塑形細緻、飾辭華麗、語彙奧博為能事，詩始終是關顧人的感情，是處理人之「悲歡愉戚」，「幽離蕩往」之情，只不過處理的手段的規矩，都是要在正大和平的規矩之內，但究其最終想欲，也不出「天子採其聲可以定樂，君子聞其音可以觀化」的目的。

除了處理情感有其規矩外，詩似乎還是有特定的接受對象，在〈孫豹人詩集序〉中，陳維崧說：

夫聲音之際，抑揚抗墜之間，其關人性術者豈微渺哉！故余與都人士相見，則必稱詩；遇博徒賣漿屠狗販繒諸目不識五字七字、口不嫻平上去入者，亦必強之使歌。歌猶詩也，歌焉而其人之生平悲愉可喜、飲食格鬥、嬉笑怒罵、不平有概於中，一切於歌焉見之。²²

「都人士」是指儒生、文士、名流等能掌握詩學基本原理「五字七字」、「平上去入」又有會地位的知識份子，詩之所以能夠溝通，始終要建基於創作與接受雙方具有相同的知識基礎，而對於一般市井販夫走卒，則要咏「歌」作為另一種策略。此處所指的「歌」，應該是一種特別的頌詩技巧，所以即使市井之徒不懂案頭文字之美，卻可以透過「聲音之際」來作情感交流。但從本質上而言，同一首作品，既可以是詩，也同時可以是歌，亦即上文所謂「歌猶詩也」，「要而論之：七律之佳者，必其可歌者也；其不可歌者，必其音節有不安也……是以僕於七律，一忌

²¹ 《陳維崧集》，頁 57-58。

²² 《陳維崧集》，頁 9-11

拗韻，恐傷氣也；一忌和韻，恐傷格也；一忌七言排律，恐傷篇法也。」²³。

雖然陳維崧同意詩歌和歌詩都要考慮聲音、韻律的特殊效果，佳者不論文人雅士抑或市井匹夫，都可以得到感動，甚至乎他認為「自漢魏以來，器亡而聲亡。聲之所以今存者，則猶賴小夫匹婦之情。」，²⁴但是這並不表示陳維崧理論體系底下的由「詩」到「經」—「詩—經」—可以與上文論及的「詞—史」關係合流，相反，兩者顯見頗大的鴻溝。陳維崧有〈樂章議〉一文，根據其前文後理，基本上可以判斷受眾是清廷管治階級，而作議的目的除了抒發議論提出「審音協律，誠為今日之上務已」，並提出其對修訂禮樂的建議外，也可能包含了炫才拜謁的意味，但這並不影響〈樂章議〉內容帶出的訊息。〈樂章議〉的論調與陳維崧論詩、論經時的立場也十分一致，同樣以王道政教為出發點，以中和為盛世之徵，他在討論歷代樂章之缺失時，點出「俗詩之失」，雖然他的針對點是明末以來的「金元爨弄」、「〈迎神〉、〈望燎〉諸闕」和「民間報賽」，但其本質上是認為詩、樂之「煌煌鉅典，赫赫明神」是不能被「史巫紛若之辭」和「俚歌野諺」所污蔑，²⁵本質地反映了他的「詩—經」系統裡頭，上述「詞—史」的性質與之不相諧協的事實。

在〈王阮亭詩集序〉中，陳維崧更明言詩、史分途的情況：

昔者孟子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所謂《詩》亡何歟？說者曰：王室既東，文武道缺，一時懷文善誹之匹士，類不能雍容恬雅以悟其君王，蓋激烈之義多，而變風變雅出焉，《詩》之所以亡也。吾以為不然。子所以《詩》亡，非作《詩》者亡，而作《詩》

²³ 《陳維崧集》，頁90。

²⁴ 《陳維崧集》，頁15。

²⁵ 《陳維崧集》，頁135-137。

之教先亡也。溫柔敦厚，則《詩》之教也。〈關雎〉、〈葛覃〉、〈鹿鳴〉、〈天保〉諸章亡論已。平王以後，其民流而多思，悲愁儉嗇而不踰乎禮。身雖告哀乎豳岐、景亳之情，未嘗一日離於懷也，則猶未常一日離乎詩教也。板蕩之世，乃重傷之矣。山崩川竭，雷電燁燁，配天之業不祀，而明堂之位忽諸，君子謂此其世可以史而不可以詩。夫董狐、倚相、左丘明諸賢，彼其才非遽遜於雨雪之征夫，草蟲之戎婦也，詠歌而悼歎之，亦風人之致也。惟是身經喪亂，忍視為越人之關弓；而政教束濕，難託於春人之助相。不得已而以編年紀事之體，沒其出風入雅之才，而《詩》於是遂亡。²⁶

以上所描述的狀態，不一定反映對《詩經》和《左傳》等書的正確認識，但肯定反映了在陳維崧詮釋底下，詩、史分途的觀念。陳維崧論詩、經，往往追本溯源，上溯君父鬼神，王道政教，至於是篇言史，則是強調了板蕩之世、「身經喪亂，忍視為越人之關弓」的背景，而同時「政教束濕，難託於春人之助相」，才「不得已而以編年紀事之體，沒其出風入雅之才」，因此經、詩不論在時間上、本質上也有了優先的地位；史，以至於以詞寫史，都是基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板蕩之世、政教束濕)，而「不得已」為之。

第三節——比興寄託：「經」、「史」、「詩」、「詞」的融通樞紐

根據第二節的分析，陳維崧的理論體系中，詩歸於經，雖以聲音之際，關人性術，但總的而言，仍是要求中正平和，最終達到宣美忠孝教化的王道政教之旨；而另一方面陳維崧是透過非官方、不被認同、隨時面臨煙滅危機的庶民歷史，甚至是近於志怪叢談的虛構歷史，在人事流離、難以定位的板蕩之世，瓦解傳統所謂「史」的必然性，以詞寫史，淘洗前朝之恨。

²⁶ 《陳維崧集》，頁8-9。

這兩種「詩—經」、「詞—史」的路數，在思路上本來就有一定的分歧點，「詩—經」要求規範、集體意志、積極地梳理和收納情緒、帶有一定的政治正確的目的，相反，「詞—史」所書寫的子虛、雲雨，無疑就是非正統也不規範的創作；而不論是詞為萱蘇忘憂，還是楚客南囚之嘆，寫的也是負面情緒，而且還是一種淋漓放蕩的負面情緒，最後的目的是以詞言恨抒情。庶民的恨史，也同時是詞人筆底下的個人恨史。

回到本章原初提出的問題，我們雖然已經起碼釐清了經、史、詩、詞四者的定位，連繫出陳維崧理論體系中「詩—經」、「詞—史」的關係，就此而言，已經在罕見開拓的話題上，似乎帶動了一點新發現，但卻仍未能夠解答〈詞選序〉篇末最終的相的，就是彷彿對立的「詩—經」與「詞—史」，如何能夠產生溝通，甚至是融通的可能，達至存經存史，「患在人心」的效果。

正如本研究第二章所說，詞的吸力與詩的推力是存在的。陳維崧所處時代依然對「詩」與「經」有一定的社會預設和期許，「詩」與「經」在書寫傳統的詮釋中，很難想像能夠以「詞—史」這種來拆解；而另一方面，第三章也指出陳維崧性情上的偏狹，他並不是那種在創作之中能激發生命動力，砥礪奮發的作家，他更多的表現為以詞娛年送日，寄愁寫恨，要他將詞納入倫理範疇，似乎也並不可能。「詩—經」、「詞—史」之間似乎沒有能夠直接接通的橋樑。

陳維崧既然以〈詞選序〉成就了「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的理論建設，但他同時又在很多文章中顯現出「詩—經」與「詞—史」的分途，這種在統整中出現分途的情況，陳維崧其實並不是不自覺，起碼他除了在「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的論點外，還自覺地在〈今詞選序〉中就詩、詞沿流，提出見解：

蓋詩自皇娥而下，詞沿趙宋而前，歷代相仍，變本加厲，其間因革，可得而言。七絕平韻，即名為〈小秦王〉；七絕仄韻，遂命為〈雞叫子〉。〈瑞鷓鴣〉便是七言近體，〈生查子〉不過五古遺聲。以至三字九字，在樂府已引其端；及夫〈柳枝〉〈竹枝〉，彼唐人夙嫻其體。考其祖禰，俱為《騷》《雅》之華胄；咀其雋永，絕非典謨之剩馥也。²⁷

這裡基本的思路卻是祖述源頭，以為詞牌之創設乃是從諸近體、古體，以至古樂府而來，雖然在〈今詞選序〉的後文有「僕本恨人，詞非小道，遂撮名章於一卷，用存雅調於千年。諸家異曲同工，總製亦造車轍，聊存微尚，詎值前型。」²⁸之語，認為詩詞兩體異曲同工，但是這篇序文的背後思路卻並不如〈詞選序〉從不同角度論述諸體無異，相反，其骨子裡始終是要將詞之發仞，比附為詩之後人，雖無詩餘之目，但其實仍是把詞目為詩餘。

這段引文中最值得注目的未必是所謂「七絕平韻，即名為〈小秦王〉」等的詮釋，相反，「考其祖禰，俱為騷雅之華胄；咀其雋永，絕非典謨之剩馥也」可能更值得深思，提供了可以繼續探索的線索。在「華胄」與「剩馥」之間，似乎不是單純以歷史次序誰先誰後就可以理解得明白，至少這隱約吐露了陳維崧判斷「華胄」與「剩馥」似乎不是以外緣因素為標準，而是應該是以文學內部的因素來達至「患在人心」的終極效果。

中國古典文學中，屈原(前 352 年-前 281 年)及《離騷》是一特別的存在，大很程度是因為屈原呈現了一有怨有恨、擅寫纏綿憂怨的自覺的抒情形象，但同時他也確立了直諫傳統。²⁹當中包含了被詮釋為以男女之情書寫君臣忠愛，奠定了

²⁷ 《陳維崧集》，頁 397-398。

²⁸ 同上注

²⁹ 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 8 月)，頁 145-213。

繼《詩經》以後的比興傳統。屈原既是詩人祖宗，同時為辭賦家、詞家所崇拜，是一位越界的文學精神領袖。在陳維崧的文論之中，也論及了屈原，而屈原的存在，正正是融通「詩—經」和「詞—史」之間的樞紐。在〈董文友文集序〉中，面對「客曰：是又工倚聲。」的責難，陳維崧的回應是「今夫美人香草，屬於君王；比興閨襜，奚妨染指。彼夫以《香奩》《西崑》之體目文友者，是豈知吾文友者乎！離亂之人，聊寓意焉。君子可以觀矣。」，³⁰對於那名虛擬的「客」對工於倚聲填詞的責難，陳維崧的第一個回應，卻是以楚辭比興傳統的美人香草、閨襜忠愛來回答，顯然對於詞這一體裁的最高標準，是溯源於楚騷的比興精神，而非一般而言，所謂詞中本色的《香奩》與《西崑》。而最終比興精神所對應的是「亂離之人」，但同時這位「離亂之人」卻又能得到「君子謂可以觀」的認可。這種以屈原比興寄託作為君王—閨房—詞體—非詞體—離人—君子的微妙轉化和溝通，由是可見。而在陳維崧的〈蝶庵詞序〉中，雖然序中所敘的發言者是史惟圓(生卒未詳)，但不妨可以視為陳維崧所認許的文學理念：

今天下詞亦極盛矣。然其所為盛，正吾所謂衰也。家溫韋而戶周秦，抑亦《金荃》《蘭畹》之大憂也。夫作者非有國風美人；離騷香草之志意以優柔而涵濡之，則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³¹

雖然陳維崧有一定的創作實績，但卻不可與〈離騷〉相比，但也不妨礙他以屈原作為理想的楷模，而這裡除了〈離騷〉，也舉出了《詩經》，但舉證的是國風，而並非王教意識相對較重的雅、頌。須要注意的是，在〈黃編修庭表宮詞序〉中，陳維崧認為「屈原忠愛，聊寄興於處妃玉女之間；陶令清高，姑托言夫翠簾鴛幃之事。」，³²再如〈王良輔百首宮詞序〉中所謂「語皆寄托，夙工宋玉之微詞」，³³

³⁰ 《陳維崧集》，頁 43。

³¹ 《陳維崧集》，頁 49。

³² 《陳維崧集》，頁 370-373。

³³ 《陳維崧集》，頁 384。

〈楊聖期竹西詞序〉中「然而性本清狂，人尤放誕。樓頭扇底，頗多託興之篇；花下尊前，大有言情之製。」³⁴，即使屈原與陳維崧同是亂離之人，有「屈平之被放」³⁵之感概，但與其說他是以屈原來搭通詩、詞、經、史，不如說是屈原所奠定和代表的比興寄託書寫傳統在實際操作上，提供了綰合兩種路向的可能。

第四節——結語

陳維崧以文學傳統中的比興寄託精神來融通「詞—史」、「詩—經」間的間隔，就文學創作而言，不論詩、詞，以至於駢或賦，基本上在書寫傳統中，比興寄託從來都是歷史潮流中的一大主流，不論言志或緣情，也鮮有是反對比興寄託作為傳統、源頭或技法的存在，再者比興寄託對意象、題材統攝力強，美人閨怨比君臣之事就使到中國詩學審美傳統的產生；就文化思想而言，比興寄託象徵了傳統文士在人生不得志中處理情志的一大方向，那怕這種不得志有時是出於憂患意識的想像，但比興寄託卻真的無時無刻提醒了傳統文士以家國、以言志抒情作為最終目標的人生座標。

換言之，〈詞選序〉中所謂「患在人心」的文學效果論，是依靠比興寄託不單作為一種技法或表現方式，還是一種在志向上有引導的指示，作為「患在人心」的關鍵。陳維崧個別序文中所謂「為我告採風者曰：勞苦諸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³⁶也許不假，的確道出了清廷漸趨穩定的太平狀態，但其骨子裡，以及更多序文屢屢出現的高漸離擊缶、楚客之心、吳人之夢、萱蘇蠲忿就更強烈有力地告訴我們：歸根究柢，王道政教可能的確是傳統士人對詩與經的常態詮釋，但統攝陳維崧「選詞以存詞」、「即其所以存經存史」效果論中的核心，始

³⁴ 《陳維崧集》，頁394。

³⁵ 《陳維崧集》，頁300。

³⁶ 《陳維崧集》，頁9。



終是源自於國變易代，身世飄零的亂離愁恨。這樣回頭重讀〈詞選序〉最末一段，也許就有不一樣的詮釋：所謂「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當中所指的人，是板蕩之世，各種久經蒼桑之人；所謂患在人心，就是透過詞，以比興寄託為樞紐，提供既能符合「詩一經」於聲音文字之際，關顧人情性術的審美要求，又能滿足倫理需要的效果要求，同時又使讀詞者感受到詞中種種面對人事歷史的必然消亡下，喚醒其不忘舊事以志哀寫恨的時代情緒，作為〈詞選序〉的目標，這也是陳維崧專事詞道的重要創作動機。

當然，文學理論與創作實績往往出現滯後與落差，這種將詞以為「為經為史」、「存經存史」的觀點，是進步而值得推許的理想，但這種實踐似乎有待實現，至少就陳維崧的作品而言，他的一些詞作中確是流露了其寄託，但驅發這些寄託的，卻較多是他強烈而個性化的個人情緒演示，如果就民間情緒的集體歷史而言，也許陳維崧的作品和他參與選政的選本，可以達到一定的高度，但如果要上升到一種哲理性的高度，就應另作別論了。

第五章

結論

陳維崧身兼詩人、詞人、駢文家，但他最終以詞名世。詞體的選擇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反映了作家的文學理念。本研究就是要解決一個根本的問題：陳維崧專力倚聲填詞的創作動機。這個問題將引導其他更深入的討論，包括：選擇詞體的自覺意識；詞體如何能體現他的獨特性；詞體如何體現陳維崧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價值。創作動機強調內緣性和文本性，單純的外緣社會歷史角度，只能闡釋陳維崧與其他易代文人的共相，但無法解釋陳維崧之所以能成就其人其詞的獨特性。本研究傾向以創作動機的內緣角度理解問題，而分析對象並不限於詞作，詩詞往往並行並論，因此本研究不少部份也會以詩作為對照，藉此凸顯出陳維崧詞的主體性。與此同時，本研究也不排除外緣資料作輔證，以完成兼容並包，整全不偏廢的研究。

要論證陳維崧倚聲填詞的創作動機，前提是證明陳維崧專力填詞是有意識的選擇，而不是隨意搖擺於各種體裁之間。本研究的第二章，透過「棄詩弗作」一事，證明了陳維崧的專力填詞是具有文學的自覺性，為整個論述的主體部份立下基礎。前人論述「棄詩弗作」，多從社會歷史背景切入，認為陳維崧是因為政治壓力而廢言禁聲。本章並不反對這個見解，也補充了這種帶有政治性的施壓，不一定只限於來自清廷的管治階層，也可以包括在國變易代後，來自民間鄉里，勢利小人的涼薄與逼迫，但本章主要透過分析陳維崧棄詩前夕的遭遇如何轉化成他專力作詞的創作動機，以及透過重讀一組他棄詩復出後，富回顧意味的組詩〈和荔棠韻十二首〉，來作為論述的核心，以文學體裁本身的吸引力和排拒力來理解「棄詩」與作詞。棄詩弗作，代表了詩對陳維崧推離與排拒力；專力倚聲，代表了詞對陳維崧的吸引力。詩詞的社會功能不能簡化成二元

對立，但陳維崧選擇作詩還是作詞的傾向還是明顯的，他認為詩這種體裁本質上帶有一定的社會包袱、道德期許，非但徒勞無功，不能排解愁情，反而會引發內心的鬱結，相反地，詞卻使他重燃生活的興趣，帶來精神上的滿足。

承接前章談及陳維崧內心的鬱結與情趣，第三章更深入地，探討他詞作中最能代表陳維崧性情面目的意涵，這種意涵主要體現在「恨」的書寫。這並不是泛指言及國變易代或時代消亡的一般性的「恨」，而是表達一種透過詩體無法抒發的「僕本恨人」之「恨」。「僕本恨人」出自江淹(444年-505年)〈恨賦〉，後來成為書寫的傳統，不少文人透過各種對「僕本恨人」的回應和詮釋，塑造自身的形象，例如王士禎(1634年-1711年)便是透過「秋柳詩序」中的再詮釋，來確立自身「淳化恨人」的形象。陳維崧透過與龔鼎孳(1615年-1673年)、王士禎等「長者」、「健卒」對話贈答的詞作作為方式，塑造他「僕本恨人」的形象。陳維崧透過自我詮釋中的「僕本恨人」，把自己收納到書寫傳統之中，但他從中沒有煉取砥礪上進的積極生命力，相反，他感受到的是自古以來文士不遇的必然命運，同時又以此作為不自振作的藉口。本章透過以上論述，認為陳維崧之所以專力詞道，是因為填詞最能代表他的主體性，最能體現他面對無情生命時個性化的取捨抉擇。

陳維崧選擇倚聲填詞的創作動機還因為詞這種體裁體現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存世價值。前人分析〈詞選序〉時，往往只集中於本體論和創作論的部份，對當中「經」、「史」、「詩」、「詞」的概念也未有放置到陳維崧的語境中解讀。本研究透過深入分析，認為陳維崧在〈詞選序〉中，是明確有意識地，從本體論、創作論、作品論到效果論論述詞的重要價值。往論者多集中地討論「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以及「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本體論和創作論的部份，而效果論的部份卻缺乏討論，或簡單地將效果論「存

經存史」視為一種泛指和前文的重申。考察陳維崧一系列詩／文／詞集、文學作品選本，以至史論、經解、遊記所撰述的序、跋文章，可以發現「經」、「史」、「詩」、「詞」各有實指。「詞一史」在陳維崧詮釋下強調一種類同《東京夢華錄》的民間自撰小史性質，他甚至指出了文學作品與歷史同樣有著虛構性質，以詞寫史不過是「徒充漫錄，僅助叢談」的書寫策略，最終目的是「淘洗前朝之恨」，相反地，「詩一經」往往是以王道政教為最終目的，情感須統攝在中正和平的表達手法之下。「詞一史」與「詩一經」彷彿背離分途，但最終能夠融通以致「存經存史」的樞紐，是比興寄託精神。這種自屈原建立的比興寄託精神，一方面容許有所怨，但同時這種有所怨，能夠歸結到直諫傳統、不逾越。所謂患在人心，就是透過詞，以比興寄託為樞紐，提供既能符合「詩一經」於聲音文字之際，關顧人情性術的審美要求，又能滿足倫理需要的效果要求，同時又使讀詞者感受到詞中種種面對人事歷史的必然消亡下，喚醒其不忘舊事以志哀寫恨的時代情緒，作為〈詞選序〉的目標。

總括而言，陳維崧倚聲填詞創作動機的核心，是緣於他強烈又鮮明，不服膺王道政教，對舊事耿耿於懷但又不自振作，強調抒愁言恨的文學格調。就倫理道德和實際事功而言，也許他不過是個小人物，不值稱頌，但正因為他終生表達了與世情世道相異的愛和恨，使他的詞，在云云眾生中，令人難忘。

本研究所呈現的陳維崧形象，有別於以往論者所言追步蘇辛，馳騁詞場的雄豪宗主形象。陳維崧存詞約一千七百首，當中包含了創作者在不同人生景遇下的不同性情面目，實在不足為奇，甚至應該說，這種複雜不統一的存在與發現，才是更接近文學的常態，作家在各種身份中周旋糾纏，透過詩、詞、文等各式文字呈現的自己的不同面貌。但與此同時，這也是難點所在，因為在種種自覺不自覺的書寫行動和紀錄之中，有時往往呈現的是分裂與背離。

本研究深信陳維崧課題值得繼續推進，加深發掘。本研究提出由創作動機和內緣性來詮釋陳維崧，得出了與前人不盡相同的結論，日後如果再以此成果來重新審視以陳維崧為軸心的陽羨詞人群，以及與陳維崧有各種交際關係的清代文人，或許會發現新的詮釋可能，可以為清代詞學、文學研究帶來新的角度。



參考書目

古籍

史部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8月)

子部

[清]鈕琇：《觚剩》，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九十四輯。

集部

1. [南朝]江淹著；胡之驥註；李長路、趙威點校：《江文通集彙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
2. [清]冒襄輯：《同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385冊。
3.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清康熙十五年吳興祚刻本)
4. [清]孫默編：《十五家詞》(《四部備要》本)，卷三十二(台灣：中華書局，1965)
5. [清]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6. [清]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 [清]陳維崧：《烏絲詞》，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8. [清]陳維崧等著、[清]曹亮武編：《荊溪詞初集》(南圖藏清初刻本)
9. [清]王士禎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10. [清]王士禎、鄒祇謨編：《倚聲初集》(清順治大冶堂刻本)
11. [清]顧貞觀、納蘭性德輯：《今詞初集》(清康熙刻本)
12. [清]蔣景祁編：《瑤華集》(康熙天籟閣刻本)
13. [清]聶先、曾王孫1658進士編：《百名家詞鈔》(續修四庫叢書本)
14. [清]郭麐：《靈芬館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第2冊。
15.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16. [清]譚獻：《復堂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17.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



2005)

18. [清]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研究文獻

專書

1. 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學生書局，2008）
2. 王易：《詞曲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3. 方智范、鄧僑彬等：《中國詞學批評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4. 汪中：《清詞金荃》（臺北：文哲史，1965）
5. 李丹：《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 呂正惠：《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
7. 沙先一、張暉：《清詞的傳承與開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 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中華民國，1990）
9. 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10. 吳梅：《詞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 吳熊和：《吳熊和詞學論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12. 林玫儀主編：《詞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13. 周煥卿：《清初遺民詞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 姚蓉：《明清詞派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15. 紅旗雜誌編輯部編：《文學主體性論爭集》（北京：紅旗出版，1986）
16. 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
17.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8. 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武漢：學苑出版社，2005）
19. 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20. 張宏生：《清詞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1. 賀光中：《論清詞》（星加坡：東方學會，1958）
22. 葉嘉瑩、陳邦炎：《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23. 葉嘉瑩：《清代名家詞選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4. 葉嘉瑩：《清詞散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25. 葉嘉瑩：《詞學新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6.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人文，2014）
27. 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台北：里仁書局，2000）
28. 鄭騫著：《景午叢編》（臺北：中華書局，1972）



29. [日]澤田總清著，王鶴儀譯：《中國韻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0. 錢仲聯：《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山東：齊魯書社，1983)
31. 錢鍾書：《管錐編》(香港：中華書局，1979 年)
32. 龍榆生：《中國韻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3. 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禎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34. 嚴迪昌著：《陽羨詞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3)

期刊

1. 邢蕊杰：〈清代陽羨文化家族聯姻與詞文學集群生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3 期
2. 吳曉亮：〈論陳維崧詞對稼軒詞的繼承與創新〉，《文學遺產》，1998 年第 3 期
3. 馬祖熙：〈論《迦陵詞》——紀念陳維崧逝世三百周年〉，收入《詞學》第三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 2 月
4. 孫克強：〈清代詞學流派論〉，《文藝理論研究》，2002 第 1 期
5. 張宏生：〈王士禎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文學遺產》，2005 年第 5 期
6. 張宏生：〈文獻整理推動詞學研究〉，《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
7. 張宏生：〈清詞流派的發展狀況及其文化特性〉，《中國詩學》，第四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8. 張宏生：〈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7 號(2013 年 7 月)
9. 葉嘉瑩：〈陳維崧詞講稿之一從雲間到陽羨詞風的轉變〉，《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4 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

學位論文

1. 李睿：〈論陳維崧對蘇辛派的繼承和發展〉(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3)
2. 承劍芬：〈陳維崧詞風形成的文化生態考察〉(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2)
3. 許嘉瑋：〈清初廣陵詞人群體研究：以評點與唱和為主的考察〉(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8)

工具書、大型彙編及其他

1. 王兆鵬著：《詞學史料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
2. 王德毅編：《清人別名字號索引》(臺北：新文豐，1985)
3. 江慶柏編：《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 [清]李先榮原本；阮升基增修；寧楷等增纂：嘉慶《增修宜興縣舊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5. 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6.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7. 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
8. 林玫儀主編：《詞學論著總目（1901-1992）》（台灣：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史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9. 周絢隆：《陳維崧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11. 馬祖熙：《陳維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 柯愈春編：《清代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3. 張慧劍編著：《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 黃文吉主編：《詞學研究書目（1912-1992）》（台灣：文津出版社，1993）
15. 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6. 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17. 陸勇強：《陳維崧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18. [清]顧名等修；吳德旋纂：道光《重刊續纂宜荊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